



建制派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阻止民主討論

國歌法與國旗法在香港的實施

檢視習近平向中共十九大提出的工作報告

我的祖父里昂·托洛茨基

論 1917 年的俄國十月革命

什麼是托派？

墨西哥教師的長期鬥爭

生態社會主義不僅是戰略，還是文明規劃

建制派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阻止民主討論 振言



在立法會主席梁君彥的偏幫下，接受建制派議員的議案：修改一向沿用的議事規則，例如改為限制每一議員的發言時間，從不限制改為只限15分鐘便不再有發言權，也難有互相批駁的機會，使得議會外市民大眾也難有充分瞭解不同意見的機會。

但在經過近3天約36小時會議，建制派的修訂終於通過了，這令泛民議員日後可用的拉布機會大幅減少，只在全體委員會審議法案時容許隨意發言。立法會主席因而擁有更大的權力，加上有6位議員被褫奪去議席，使得民主派更無法阻止表決，擔心他日如23條等「惡法」重臨時，議會將可快刀斬亂麻地通過。民主派憤激於建制派的恃勢高壓，以後也會盡力還擊，不退縮罷休的。

特首林鄭月娥其後接受電台訪問時宣稱：「拉布浪費時間是次要的，最大問題是廣大市民都因而受害。」從而把廣大市民受害歸咎於民主派的拉布。但罪魁禍首是建制派提出要修改《議事規則》，阻止議事時的民主討論。不先經過民主討論便任由提出者獨斷獨行，廣大市民要承擔其造成的惡果，是不容置疑的。

在歷史上可能多少有相類似的例子：在列寧、托洛茨基們和中國的陳獨秀、彭述之們都主張先民主爭論，然後按照多數意見去執行，少數服從多數；斯大林們和毛澤東們則反對先民主討論，便依照領導人的意旨去執行。列寧們的意見被稱為民主集中制，斯大林們的意見則稱為官僚集中制。今天在香港出現的會有些相近吧。

26/12/2017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4卷第2/3期（總第243期）
2017年12月31日出版

出版/編輯/承印：《十月評論》編輯委員會

通訊處：香港郵政總局信箱10144 號

Address: GPO Box 10144, Hong Kong

E-mail: octoberreview@gmail.com

Website: <http://www.october-review.org>

〔本刊一切具名文章，不一定代表編輯部立場〕

國歌法與國旗法在香港的實施

劉山青

國歌法議員議案由於建制派反對，無法在立法會進行辯論，但黃碧雲議員提出口頭質詢，政府還是在立法會作答。國歌法中的所謂「愛國情懷、憂患意識」和「尊重」元素屬個人取態，沒有太大的討論意義。筆者認為社會的關注應是：一，本地立法會否削弱人權；二，收緊原有空間？問題所在是國歌法比國旗法更嚴厲，當中的主要元素更多，而聲音比實物的布置更抽象，因而更難保障上述兩點。筆者估計其對本地的直接影響主要是：一，在小中學推行愛國教育（認同大陸政權，包括其違反人權的作法）；二，對網絡自由的影響（即重提反網絡23）。

在《2014年版權（修訂）條例草案》建議中，政府議案的重要新增豁免為：

（a）為戲仿、諷刺、營造滑稽和模仿目的；（b）評論時事；（c）引用。

可惜版權條例原地踏步，未來的國歌法本地立法將限制了「為戲仿、諷刺、營造滑稽和模仿目的」範疇。

例如在版權條例修訂中，香港政府採納了「安全港」概念，減輕了網民的刑事責任。在大陸的《關於規範網路轉載版權秩序的通知》中，「互聯網媒體轉載他人作品，不得對作品內容進行實質性修改；對標題和內容做文字性修改和刪節的，不得歪曲篡改標題和作品的原意。」這等於完全拒絕戲仿。特區政府在2013年贊成採用「公平使用原則」。這些一國兩制的基本內在矛盾將在未來的國歌法本地立法中重現。（註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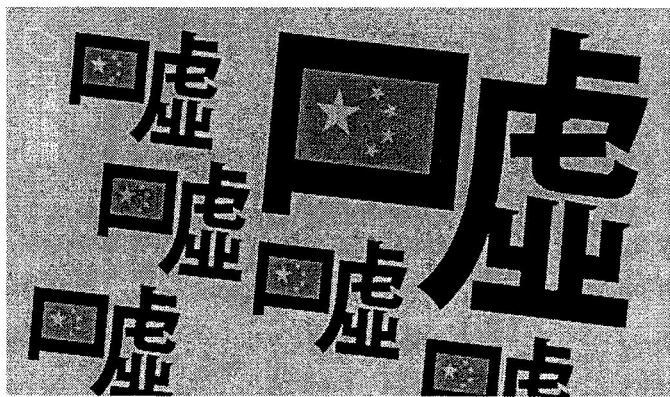
國旗法

國旗法在1997年7月1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六次會議通過及列入基本法附件三（註二）。行政長官根據《國旗及國徽條例》第3(2)條及《區旗及區徽條例》第3(1)條制訂「關於展示及使用國旗、國徽及區旗、區徽的規定」（註三），並以文件A401方式立法。但大陸的國旗法規定了中小學升國旗的做法沒有引入香港（註四）。當年，政府被建制派質詢有否抵觸「原意及精神」（註五）。

政府的答覆是：（一）「適當地作出適應化，以顧及內地與香港在制度和實際情況上的差異。」；（二）「不相符之處，本條例須解釋為該全國性法律的特別實施或改編本，並如此實施」。

但是，今天的有一重要分別。因為，人大特別說明，國歌法是針對近年的香港作為「說明還指出，近些年香港發生了一些不尊重國歌的事件，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和社會價值底線」。

這便成了立法原意，必會落實（註六）。香港國旗法的罰則為最高五萬元，及3年。其犯罪行為是，「焚燒、毀損、塗劃、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國旗」，「等方式」即只列出部份，其基本上應接觸到國旗，所以鄭松泰議員被定罪。這點與國歌法明顯不同，國歌法只要求被告在現場，便有機會入罪。未來的國歌法的罰規會否高於「最高五萬元，及3年」將是一個焦點。



國歌法

第十五條 在公共場合，故意篡改國歌歌詞、曲譜，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的，由公安機關處以警告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註七及註八）。

在原議案中，它只局限在15日拘留，在審議的第4段解釋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是後來加上去的，可能是有意針對香港。（註九）這裡所指的公共場合可能包括網上空間，它是真正的網絡23。

另一個關注點是，國歌法不單要求中小學教唱國歌，它還指明要順帶引入愛國教育。審議結果的報告第三段表明：

「學校不僅應當教唱國歌，還應當將國歌作為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內容」。大家不要忘記，香港的反國教是新一代運動的起點。它培養的骨幹正是後兩傘運動的核心。如果將2012年的反國教運動作為圓的起點，我們可否將國歌法本地立法看作其結論呢？

在香港，許多人，尤其是港獨份子，在升起國旗奏國歌時或者在球賽等場合，都發出噓聲，或者轉身背向國旗，以表達其不滿和獨立要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把國歌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之後，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譚惠珠即明確地回答：“播放國歌時坐著，行為上已觸犯國歌法。”這是非常籠統，可任意加罪，不患無詞的。

附註（本刊發表時從略）



醫生專業自主與專業專權

劉山青

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胎死腹中，2017年政府再向立法會提交修訂。方案的其中一個爭議論點是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下稱醫專）兩名代表由委任改為由醫專按其規定選舉產生。醫學界有人質疑醫專兩席並非直選，或令選舉產生的醫生委員未能佔半數。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主席在報章上撰文：“我們必須秉持的大原則為醫專必須確保各個分科學院可以平等參與。”他在文章模稜兩可，沒有表態。

1比1委任制

目前的醫委會有28名成員，當中的14位需要由行政長官委任。在2016年的建議下，醫委會增加4名業外成員，分別為3名來自病人權益組織以一票互選的和1名來自消委會推薦的，新增名成員都需要由行政長官委任。這一建議打破了1比1制，因此，政府建議將醫專的2名由醫專委員會內部選出的代表剔出委任之列，做成1比1的比例。醫生組織所說的1比1制是指在委員會中，若增至32人，則要有16名醫生代表不需行政長官委任，無論它是由醫生直選也好，間選也好，這就符合專業自主的方向。

2017年修訂

今年修訂最大的讓步是由約200個病人權益組織選出的3名代表不需由行政長官委任，他們成了最大的贏家，而有關醫專的改變維持不變。病人權益組織的代表則認為，政府的方案已經可以接受，要求醫生團體不要玩嘢。

醫生方案

醫專聯同其他醫生團體拋出一個新方案，要求醫專的委任不變，取而代之的是，署長和醫管局各讓出一屆，由業內選出代表入醫委會，這符合1比1制要求。他們的解釋是醫專很重要，改動可能影響了其專業代表性。政府回答了這問題，認為不會。

專業自主

要回答這問題，需要回顧醫委會和醫專的使命、2016年的討論。醫委會的主要功能是：醫生註

冊、處理投訴。第一點關於專業自主，第二點則不。但政府一向以來看不到其有意控制醫生註冊事宜，因為，其專業資格有一固定的考核程序。反而，政府希望看到多些外來醫生以解決醫生荒問題。正在這點上，醫委會令人覺得排擠外來醫生。

第二看看醫專功能。醫專的功能主要是代表15間專業學院，頒授院士名銜，而院士名銜又是專業註冊的必要條件。香港約有1萬4千名醫生，當中約8千為專科醫生，估計約1千名青年醫生正進修專科，因此普通科醫生只佔約全數的3分之1，在醫生選舉中沒有什麼地位。因此，無論醫生代表是否直選還是由醫專選出，最後的結果實際沒有分別，普通科或新晉醫生都沒有機會被選出。它充份反映出香港醫生的崇拜權威文化。現行醫委會組成有7人為由正式註冊醫生及有限度註冊醫生選出的註冊醫生作代表。其實情是，所選出的全為社會賢達。所謂專業自主實為高級醫生的圍威為遊戲。

醫委會功能與醫專功能

醫專的主要功能是頒發院士頭銜，而院士是註冊為專科醫生的必要條件。基本上醫生修讀完專科學院6年和通過其中期和終期試後，都會被接受為院士。醫專只會留難外來的專科醫生。而醫委會的主要功能是接受醫療失誤投訴，雖然它有負責為普通科和專科醫生註冊的功能，但看不到它有卡壓醫專的可能。因而，說有機會削弱醫專地位和發揮專科醫生協助處理醫療失誤投訴，完全無理。

後記：政府最後屈從於醫生組織的建議，保留醫專2名委任代表，並將署長提名和醫管局提名的各一名代表，交由醫專自行設立章程選出。它反映了林鄭與梁振英在管治哲學上的最大分別。梁振英在港大校委上不肯讓步，雖然被廣泛指責有干預校政之嫌，但還是不肯減少委任。相反，林鄭明白在醫委會上放權，不代表醫委會會不受控制，甚至不代表醫委會可以改變其專業霸權作風，多接受外地醫生，面對市民投訴，所以她樂於順水推舟。表面為放權醫專，骨子裏一點威脅都沒有。看來，市民仍然要受著專業霸權之苦。

不畏威權 繼續燃燒——致我的社民連黨友（轉載）

黃浩銘(社會民主連線外務副主席)

今年是社民連成立的第十一周年，亦相信是社民連有史以來最艱苦的一年。不但前主席長毛因被DQ而失去了立法會議席，我被判十三個月監禁，而其他黨友諸如主席吳文遠、秘書長陳寶瑩、副秘書長關兆宏、會友趙志深、劉國樑及梁曉陽等皆面對牢獄之災。在眾多民主派政團之中，社民連算是當權者最痛恨的眼中釘、肉中刺。然而，正如我在上年十周年所寫到，社民連是壓不倒的玫瑰，燒不盡的煤炭，在民主列車火車頭內，要燃燒自己，化作動力，推動民主運動。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濟弱扶傾，義無反顧！這就是社民連鐵錚錚的精神。

眾多成員被捕被控，關進監獄，我們都不曾向威權專政求饒。我們在法庭裏大膽說出自己的法理，在街頭上站在前線衝破一切無理的限制，在議會內明確清晰地反駁保皇黨的謬論，縱然過去多年都受到不同角度的指摘，不論誰罵我們激進衝動，誰罵我們軟弱左膠，我們在大時代的震蕩中仍然站立得住，沒有乞求憐憫，亦毋須博取同情，要做自己所相信的事情以行動代替口號，坦坦白白地與威權鬥爭，這就是社民連！

不少會友都經歷社民連分裂，由當時三位議員變得只剩下長毛，再經歷區議會選舉的慘敗，是難以忘記的低潮。記得那時在維園年宵，籌款數字大跌，更被人影相嘲笑我們檔口風涼水冷，水靜鵝飛。但我們並沒有放棄，透過連番的直接行動，追擊權貴，率先在港鐵站內抗命反對加價，更在議會拉布爭取全民退休保障，重拾動力，得到市民信任，成為民主派中籌款能力數一數二的政團。後來，無論是港鐵擱置加價，檢討機制，

又間接令政府推出新政策處理交通問題，抑或迫使梁振英為港人退休保障撥款五百億等，事實證明「沒有抗爭，哪有改變？」是一個定律，告訴我們別小看自己的影響力，告訴我們要繼續燃燒，努力奔跑！

誠然，不少人都以為社民連如今「一席都無」，甚至「呀銘來屆不能參選」，已呈敗象。但在獄中的我實實在在的鼓勵大家，議席並非社民連的力量泉源，我們強大的力量在於我們有堅毅不屈的精神和誓不低頭的意志！議席的確能為組織帶來資源與平台，我們不會放棄爭奪，但不應該成為我們推進民主運動的指標，甚至障礙。環觀世界各地成功的非暴力抗爭史，能夠凝聚力量推翻暴政，並非靠尊貴的議員，而是依賴嚴密的組織和堅定的意志。不是靠單一的民主派領袖英雄，而是靠廣闊且持續不斷的群眾抗命力量。社民連在香港民主運動中作為小齒輪，自有責任加強組織力量，積極與不同的民主力量連結，甚至建立一個聯合陣線，要用上五年，甚至十年的時間組織一個比雨傘運動更壯闊的非暴力抗爭運動，推動社會改革。

目前，由中共在2014年6月提出「全面管治權」，至8月31日的《人大決定》，再至選前確認書，選後司法覆核發動政變，乃至今日將民主抗爭者逐一以法律之名送入大牢，都確實可見香港已進入習近平君主集權威權主義新時代；林鄭政府硬推一地兩檢，《基本法》已成可比人大常委會搓圓揸扁的一紙空文；司法系統在中共全面管治權下漸趨保守，以為「明哲保身」；議會在威權下亦只是橡皮圖章，慘成中港財閥提款機，更要修改

規程唾面自乾。面對如斯困境，港人大不了可以移民走人，又或者被犬儒思想侵蝕，終日怨天尤人，漸成威權政府反民主的工具。但我們並不會退下火線，社民連不會在緊急關頭臨陣退縮，我們咬緊牙關，不需要同情，只需要同，與基層同行，與受壓逼的同行，不怕風，不怕雨，走過千個山頭，要對民主勝利和幸福將來懷有不可破滅的希望。

希望就是信念，能給予我們力量勇氣。希望是我們對將來的憧憬，當我們心裏擁有守護後輩的責任感，同樣就會有希望推使我們不能放棄當下的抗爭。我們今天從事的每個抗爭，也是承載着對後世的關懷愛護，不欲自己長大的地方沉淪，就要持守希望，努力奮鬥。每當我們面對一次又一次的挫敗，彷彿希望幻滅，自己無力改變一切。然而，我們事實上在每次挫敗中成長，令自己更加強壯。正如反高鐵那過萬群眾直接行動，雖然阻止不了撥款通過（正如今日阻止不了一地兩檢一樣），但卻啟發了年青一輩如我這般的人投入社會運動，開啟了以後反國教十二萬以及雨傘運動超過五十萬群眾抗爭。今天，我們雖然面對着雨傘清算行動（刑事藐視法庭案及佔中九子公眾妨擾案），但卻是一個更高更大的平台讓我們說話，我們要藉着案件向公眾揭示當權者「以法治港」，利用法律打壓異己的荒謬，也要引起社會對公民抗命爭取普選和法治的大辯論，更要以身作則，以我們在牢獄中的忍耐和堅持鼓勵已經放棄追尋理想的戰友重返對伍，繼續作戰。

當權者以威權法治，以圍牆鐵閘威嚇為民主自由而戰的鬥士，縱使我們都會有軟弱疲累，恐懼氣餒的時候，但我們追求公義的內心和對下一代的愛卻會給我們無比的勇氣抵抗壓迫。當權者以威權管治，以謊言治港（例如說檢控無政治考慮，一地兩檢無違反《基本法》，國民教育並非

洗腦）企圖蒙騙香港人，我們就有責任以真誠護港，拒絕和拆穿所有謊言，以實際行動，無論是藉着社區、工會還是家庭，都要將真實的資訊傳播開去。而作為行動派的社民連更要把握每次機會，無論在街頭、議會還是法庭，都要勇敢地把理念和事實說清楚，正如在獄中的我都會把握機會跟囚友討論，刺激大家的思考。

當權者最希望我們灰心喪志，懦弱膽怯，失去獨立和批判思考，終日受其威嚇和謊言支配，做個「循規蹈矩」，只管吃喝玩樂，三餐溫飽的順民，做個忠誠反對派，成為政治花瓶。我們卻要自主自強，無畏無懼，用各樣的積極行動粉碎威權的阻嚇與謊言，重奪人權和尊嚴。在獄中的我每天閱讀學習，亦不停鍛煉身體，思考民主運動的進路及修養心靈，期望可以更強壯地與大家並肩作戰，不知道諸位又會以甚麼行動來回應我這個獄中人呢？我對大家充滿信心和盼望，因為社民連上上下下都是全心為社會的一支勁旅，我們以愛承載希望，以真誠擊倒謊言，憑着那愚公移山，精衛填海的心志爭取公義與自由，即使未來有更艱苦的挑戰，打落門牙和血吞，都會繼續奮戰！

曼德拉曾寫道：「或許我們畢生都難以實現我們所懷抱的理想和最美麗的夢想，也達不到我們最熱切的期望。但是，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如果說一個人在有生之年，已經盡了他應盡的職責，而且不負朋友們對他的期望，那麼，這就是一種可貴的經歷，一種輝煌的成就。」各盡其力，各展所長，無懼抗爭，戰鬥到底，與諸位共勉！

你們在獄中的戰友

銘 頓首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二日 赤柱監獄書

雨傘三週年 聲援政治犯 袁國強下台（轉載）

黃之鋒(香港眾志秘書長)

各位香港人：

當香港面對前所未見的司法風暴，十六位抗爭者相繼被判入獄，我很感謝你們仍沒有放棄香港。律政司司長袁國強牽頭把異見者投進監獄後，有數以萬計的港人走上街頭，以腳步向威權時代說不，實在令人動容。原來，大家並沒有忘記雨傘運動的初衷。謝謝你們。

不再犬儒，是我們面對囚禁學到寶貴的一課。

隨著政治清算迫近，未來還有20位抗爭者因在傘運期間留守旺角而面臨判刑，相當可能判處監禁；另外中聯辦反釋法案和雨傘運動的審訊亦將在十月後開庭審理，情況實在不樂觀。當未來一年將有數十位同路人，因政權報復式檢控而入獄，「我們的民主運動應該如何走下去？」這是不少朋友寄信到監獄問我的問題。我的答案就是民主派必須團結一致，轉守為攻，把矛頭對準律政司司長：在傘運三週年，嚴正要求袁國強下台。

「政治問題，政治解決；法律問題，法律解決。」但袁國強作為政治問責官員，參與政改三人組推銷假普選方案，又主動提呈司法覆核取消民選議員資格，最近更推銷一地兩檢。民怨四起，袁司長不僅沒有回應訴求，平息民憤，反而想解決提出問題的異見者。他視司法系統為工具，以法庭作擋箭牌，袁國強不斷把反對他的人送上犯人欄，委派檢控人員在法庭提出不合比例的刑期，又狂

言「重奪公民廣場」的「奪」字是暴力，以及把雨傘運動與暴動相提並論。

這個日日嚷著「以法辦事」的政治官員，就是以法律除掉提出政治問題的改革者，把他們逐一送進監獄。但監禁顯然並非解決政治問題之道，更無法囚禁香港人三十年爭取民主的決心！袁國強的行為，反映律政司一直以政治表忠凌駕法律觀點，帶頭破壞法治。所以香港人務必追究律政司司長的政治責任，袁國強必須問責下台，成為傘運三週年的主要訴求！

我們一眾政治犯身處監獄，只能以紙筆與外界通訊，希望監獄外的香港人，能完成我們的心願，從現在開始把「聲援政治犯 袁國強下台」的訴求，以社區討論、街頭宣傳、不同形式的行動和大型示威傳揚開去。昔日你們將香港未來托付在我們身上，如今我們身處監獄，就是時候把延續民主運動的希望，交到在監獄外的你們身上，加油！

黃之鋒

壁屋懲教所

寫於入獄兩周日

檢視習近平向中共十九大提出的工作報告

張開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於十月十九日召開，由習近平代表中委會發表了工作報告，宣稱：這次大會「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關鍵時期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

「大會的主題是：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奮鬥。」

隨後的兩個多小時不間斷的報告，都出現許多次的「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名字，彷彿它是千真萬確的實際，要堅持下去。可是「社會主義制度，是以生產資料公有制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總稱」、「取代了私有制，消滅了人對人的剝削」。（引自許滌新主編的《簡明政治經濟學辭典》243頁），中國現時的實際卻與之無絲毫共同之點。

自從鄧小平提倡改革開放、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讓部份人先富起來以後，公有制和非公有經濟都同時蓬勃發展起來。結果，非公有制（即私有制）經濟的數字和吸引力都非常遠地拋離公有制經濟、顯示中共長期倡行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浮誇，但中共至今仍堅持不改，反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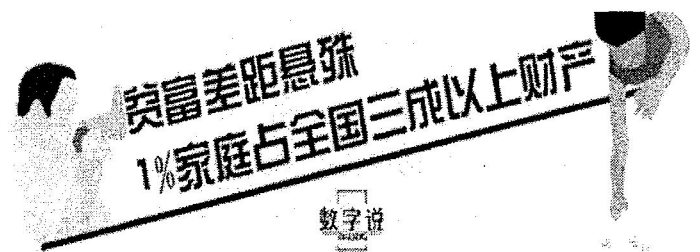
要堅持下去，即是要更加發展非公有制經濟。報告要「有效防止國有資產流失」，過去多年的實際證明是無法「有效防止」的。

五年間的工作

《報告》宣稱：五年間的經濟建設取得重大成就。國內生產總值從五十四萬億元增長到八十萬億元。這顯示經濟的突飛猛進，這些迅速發展包括國有制和非國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數字，也包括投入的資金數字，並非全部是生產出來的價值。

據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辭海》解釋：國民生產總值是資本主義國家綜合反映國民經濟活動的指標之一。通稱GNP（英文Gross National Product的縮寫）。一個國家所有部門在一定時期（季、年）內的貨幣表現的全部產品和服務的總價值。（引自《辭海》27頁）

這與中國的計算法不同，中國把投入生產的資金數字也作為生產出來的數字，這樣，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便增加很多，每年都保持在6.5%至7.8%之間，位居世界第二高國內生產總值了。這是好大喜功的心理反映！



近日，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报告指出，中国家庭财产不平等程度在迅速提高，顶端1%家庭占有全国三成以上的财产，低端25%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为1.2%。在中国家庭财产的构成中，房产占比超七成。房产不平等是我国财产不平等的主要贡献因素，2010年至2012年，房产增长量占总财富增长的一半以上。

顶端1%家庭占有全国三成以上财产

02 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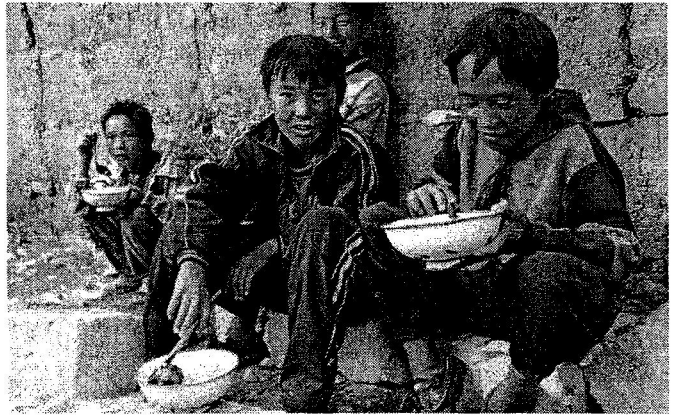
報告要「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黨的領導是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實際上反而是黨奪取了人民當家作主和依法治國的權力，而實行一黨專政。

報告力數中共領導造成的工作成績，特別誇耀的是經濟的蓬勃發展。但這是改變了社會主義的經濟發展路線，而改變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路線，但這仍比不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理想。報告宣稱：「民主法治建設邁出重大步伐。積極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的制度建設全面加強，黨的領導體制機制不斷完善，社會主義民主不斷發展，黨內民主更加廣泛，社會主義協商民主全面展開。」

但事實上，人民當家作主和上述宣稱的民主都是虛假的，所有人民應有的民主權利，都被中共統治者剝奪了，中共聲稱自己就是法律，依黨治國。就以香港來說，以前明文規定，香港人民享有高度自治權，民主治港，中共只管理外交，有需要才出動軍隊協助。但近年來，中央人員卻提出對香港有全面管治權，亦即收回以前的高度自治權。這次習近平的工作報告，也重申「港澳臺工作取得新進展，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牢牢掌握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中央對香港、澳門全面管治權。

堂堂大國的黨政要員，如此背信毀諾，中共竟然做得出！

為了企圖彌補人民的不滿，報告作出了建議：堅持在發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增進民生福祉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必須多謀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憂，在發展中補齊民生短板、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在幼有所育、學有所教、勞有所得、病有所醫、老有所養、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斷取得新進展，深入開展脫貧攻堅，保證全體人民在共建共用發展中有更多獲得感。



其實，人民貧窮的禍根正在於中共的政策措施：推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導致社會分化，貧者愈貧，窮人也愈多，一點救濟金只聊勝於無。國家積聚著非常龐大的財政盈餘，寧可贈予外國以數十億元計，而給予本國減貧卻只有數億元，有若杯水車薪。不久前報載有農村一家五口，因貧窮難以生活，要一齊自殺身亡，那只是報導出的冰山一角。

由此看來，上引報導工作成績有關增進民生福祉，也不過是官樣文章，敷衍塞責吧了。

為了建立習近平的個人崇拜，官方出動了大批善於歌功頌德的高手，花大量時間，堆砌出洋洋二萬多字的傑作，以最後達致個人獨裁的目的，直至能與毛澤東平起平坐。這是習近平工作報告的最終目的。佈置周密，可圈可點！

2017/12/20



習近平新時代開啟（轉載）

未普

十九大閉幕了。海外媒體的報導雖然角度不同，結論卻驚人的一致：習近平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權力基礎，習近平新時代開啟。

一些著名的西方媒體則進一步認為，中國已進入或正進入獨裁體制。《紐約時報》載文說，習近平將自己塑造成了鄧小平之後最有權勢的統治者，把中國推向了新的、可能會很危險的政治領域。德國媒體認為，中國已經進入獨裁體制2.0，習近平正在走一條通向獨裁的路，只不過手法更加現代化了。《金融時報》在中共十九大前夕發文表示，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越來越獨裁了。筆者以為，外媒的這些擔憂，並非杞人憂天。對中國走向獨裁的傾向，十九大實際上露出三大端倪：第一，習近平思想寫入黨章，這意味著，反習即是反黨。第二，正式廢棄集體領導體制，實施集中統一制，這意味著，自毛澤東之後實施近四十年的中共集體領導體制徹底破產，中共將回歸于高度集權的毛澤東式的強人體制。第三，毛澤東式的政治強人習近平——“習核心”將統領一切，即一切權力歸習近平。

習近平思想已經寫入新修改的黨章，其最大意義是，習近平由此而獲得了誰都不能批評的、神聖的、至高無上的黨內地位。現在我們知道，為了修改黨章，習近平親力親為，六次主持會議。他要求所有黨員忠誠，加強對習近平思想的學習。這表明，習近平在鼓勵全黨對他的忠誠與崇拜。在十九大上，許多中共官員對習近平使用了溢美之詞，包括稱他為“舵手”、“黨的核心，軍隊統帥，人民領袖”等。毫無疑問，十九大後，對習的歌頌將會越來越響亮。習近平鼓勵個人崇拜，個人崇拜將會變本加厲。

至於中共領導體制的變化，十九大實施的“集中統一領導體制”無疑是向獨裁體制邁進了一大步。中共在十九大上，正式告別了鄧小平在八十年代初主張並踐行的“集體領導體制”，全面擁抱“集中統一領導”。這表明習近平跨過了鄧小平，向毛澤東進一步靠攏。據新華社稱，十九大剛一閉幕，習近平即召開政治局會議，審議《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加強和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若干規定》和其他規定。政治局委員

們無一例外，一致同意加強集中統一領導的規定。這表明，黨內各派相互制衡的狀況，將不復存在，甚至不利於“團結統一的言行”，也將不復存在。

“集中統一領導”體制歸根結底，就是把權力集中於“黨中央的核心”習近平。習近平主持的會議強調，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是黨的領導的最高原則，這首先是中央領導層的政治責任。他要求中央政治局要帶頭樹立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自覺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下履行職責，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作為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可以肯定的是，習近平的核心地位在黨內得到進一步鞏固後，將在他的第二個任期內進一步集權。

有分析家認為，中國現在就像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的納粹德國。從納粹德國的體制特點看，現在的中國和當年的德國的確有不少相似之處。譬如，一個黨和一個領袖無所不在，無所不能；這個黨控制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嚴厲取締不同意見，清除政治異己，鼓吹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控制新聞文化藝術，鼓勵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謂“公共敵人”，統制工農商及金融各行各業等等。在一切權力歸黨的領袖方面，習近平亦頗像當年的希特勒。希特勒于1934年將總理和總統職權合一，成為德國獨裁者。一切權力都集中至希特勒手中，其辭令高於一切法律。納粹黨由此開始清除國內一切政治反對力量，鞏固自身權力。

從十九大露出的這三個端倪來看，習近平顯然有一種強烈的獨裁衝動。他或許認為，只有這樣，只有他，才能使中國真正崛起為世界第一號強國，站在世界舞臺中央，令其他國家仰視。習近平的獨裁衝動，無疑與他的全球野心——影響世界並領導世界，高度關聯。

可以預見的是，在十九大後，以一黨專制領導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相抗衡的歷史之役，正式拉開序幕。

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第222期，2017年11月10日—11月23日

知識界人士就近日北京大規模驅趕“外來人口”事件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信（轉載）

獨立評論（2017-11-25）

2017年11月18日，北京市大興區發生一起特大火災，19死8傷，其中8名兒童遇難。北京有關部門不是反思檢討自己的責任，不是第一時間前往現場慰問災民，反而以此為由，迅速下發通知，集中40天開展以主要是底層民眾的“外來人口”為對象的所謂安全隱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專項行動。通知下發後，大興等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大規模強力驅趕所謂“外來人口”，導致成千上萬底層民眾一夜間流離失所，預計還有數十萬底層民眾將被清理出北京，前景堪憂。

我們認為，這是一起違法違憲及嚴重踐踏人權的惡性事件，應予堅決制止和糾正：

在沒有任何過渡措施、救濟安排、安置方案的前提下，在零下幾度的寒冬天氣，驟然強令外地人口在幾天內無條件搬離租住地，甚至今天通知明天就必須走人，否則停水停電並隨意處置其財產和物品，這是對公民生存權、居住權、經營權、就業權、財產權和人格尊嚴等基本人權的極度蔑視與肆意侵犯，是公然的無法無天。這種執政行為極為粗暴和低端，任何文明社會、法治社會都不可能容忍，必須旗幟鮮明地譴責和反對。

早在2011年，大興就發生過導致18人喪生的4.25特大火災，如果政府真正為人民服務，真正以人為本，至少從那時起就該吸取慘痛教訓，加大在公共產品和服務的投入，也不至於再次發生最近的悲劇。最近悲劇的發生，顯然主要是政府責任，本來應該問責政府。北京有關部門卻反其道行之，遷怒于千千萬萬徙居北京的外地人，讓徙居北京的外地人來承擔悲劇的代價。這不僅是對底層民眾嚴重的次生災害，有違起碼的公平正

義；更大危害在於，它會遮蔽政府責任，掩蓋悲劇的真實原因，從而導致悲劇不斷重演。任何一個有公共關懷、有責任心的公民，都決無可能容忍，必須旗幟鮮明地抨擊和抵制。

有鑑於此，我們強烈呼籲中央政府基於依憲治國依法治國的莊嚴承諾，對北京強力驅趕主要是底層民眾的“外來人口”這一惡性事件進行緊急干預，以防止次生災害升級及蔓延全國：

（1）立即叫停北京強力驅趕“外來人口”的違法違憲行為，責令北京市有關部門及有關官員向受害者和全社會公開道歉，同時追究有關部門及有關官員的法律責任及政治責任，並向社會公開相關處理結果，以昭鏡鑒，以絕後患。

（2）對此次因火災及強力“清理”外地人口的違法違憲行為而流離失所的公民及商戶、企業進行緊急救助，依法補償他們所遭受的損失。

（3）對北京定位予以糾偏。必須清楚，北京不只集中了北京的資源，而且集中了全國的資源；北京的今天，北京的發展，不僅是北京市民奮鬥的結果，更離不開全國人民長期的犧牲和奉獻。因此北京有義務感恩全國人民，回饋全國人民，而不是忘恩負義，以傲慢、歧視和羞辱回報全國人民尤其底層民眾。強力驅趕主要是底層民眾的“外地人口”這種對自己同胞的歧視，比外族人的歧視更甚，不能讓其延續。北京的定位、北京的發展戰略必須考慮這一點，必須具有人性、包容性，為包括底層民眾在內的“外地人口”留出空間。

（4）舉一反三，全面改革城市產業結構和佈局以及相應的社會保障和社會治理機制，落實進城經商務工的外來人員和農民的公民權利和國民

待遇。在落實國家憲法的角度上，阻止一切對公民居住權的粗暴干預，並保障全體公民具有真正的遷徙自由。

2017年11月24日

簽名（以姓氏拼音為序）：

崔衛平 北京 學者
常 凱 北京 教授
程 卉 上海 大學教師
陳 更 北京 律師
陳 軍 成都 商人
陳 峰 香港 教授
陳偉祥 美國 在職研究生
蔡金剛 北京 媒體人
楚 些 河南 文學批評家
儲成仿 北京 政論作家
崔 健 西安 大學教師
朵 漁 天津 詩人
東 君 浙江 作家
丁甯甯 濟南 大學教師
丁朗父 加州 藝術家
段 毅 深圳 律師
馮崇義 悉尼 學者
郭于華 北京 教授
郭亦君 北京 牧師
郭學明 大連 企業人
顧文靜 廣州 大學教師
賀衛方 北京 教授
胡 偉 陝西 退伍軍人
黃海兮 西安 作家
黃漢中 北京 律師
韓桂君 武漢 教授
江 雪 西安 媒體人
洪振快 北京 獨立學者
范 曉 四川 學者
黃亞香 浙江 散文作家
黃以平 北京 學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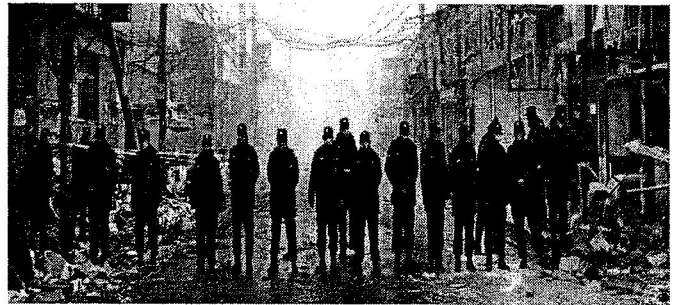
黃巧燕 廣州 中山大學教授
瓜爾佳 關燕山 河北詩人
高 毅 上海 公民
管一棟 北京 藝術家
金英傑 北京 教授
賈方舟 北京 藝術批評家
蔣稠媛 廣西 編輯
李 南 河北 詩人
李 文 北京 社會企業家
李 莊 山東 詩人
李 雄 重慶 教授
李春雲 北京 教授
李冬君 北京 歷史學者
李曉明 北京 律師
劉 虎 重慶 媒體人
劉 劍 深圳 教師
劉玉安 濟南 大學教師
劉仁寶 煙臺 大學教師
劉亞榮 河北 散文作家
劉蘇裡 北京 書商
劉書慶 山東 律師
劉建洲 上海 教師
藍 藍 北京 詩人
廖偉棠 香港 作家
雷 霆 北京 公民
黎雄兵 北京 律師
路 軍 濟南 教授
孟元新 北京 學者
邱 婕 上海 大學教師
錢葉芳 杭州 教授
秦旭東 北京 媒體人
榮 劍 北京 獨立學者
石辰陽 上海 律師
蘇 敏 浙江 散文作家
蘇小玲 北京 作家
帥 好 北京 藝術批評家
盛祥蘭 廣東 詩人、媒體人
仝宗錦 北京 學者

中國

田 輝	北京	教師
唐吉田	北京	律師
唐繼無	上海	學者
譚越森	甘肅	詩人
王 瑛	北京	企業家
王江松	北京	學者
王永生	北京	藝術家
王東成	北京	教授
王清營	廣州	公民
王浩林	蚌埠	大學教師
文東海	湖南	律師
吳 偉	北京	獨立學者
吳 強	北京	學者
笑 蜀	武漢	獨立學者
邢小群	北京	教授
謝玉華	湖南	教授
肖雪慧	成都	學者
玄 武	太原	作家、詩人
楊 海	西安	民間學者
楊 濤	北京	科技人員
楊東平	長沙	藝術家
玉 珍	湖南	詩人
殷龍龍	北京	詩人
喻術紅	湖北	武漢大學教授
雲 浩	北京	學者
鄒烈山	廣州	作家
章立凡	北京	獨立學者、時評人
張 炎	陝西	幼稚園教師
張 倫	法國	學者
張千帆	北京	學者
張士強	濟南	大學教師
張亞松	上海	教授
張守澤	北京	書法家
張純朱	北京	公民
查建英	紐約	作家
趙常青	北京	學者
展 江	北京	學者
周 濂	北京	學者

周為民	深圳	公益人士
周述榮	嘉興	大學教師
朱 農	江蘇	藝術家
翟繼滿	上海	企業管理顧問

來源：《中國人權雙週刊》第223期，2017年11月24日—12月9日



比特幣在中國

劉山青

中本聰先生在2008年寫了一篇只有九頁的論文為比特幣建立理論基礎。他在2009年建立比特幣的區塊鏈。比特幣從開始時的一個比特幣為6美仙，約在2013年開始升值至約100美元，並在2016年起急遽升值。

現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蒂娜·瑪德琳·奧德特·拉加德在今年10月13日對比特幣的發言引人注目。她認為：“比特幣將對世界金融起重大衝擊，而大家不要將比特幣看作龐茲騙局等的非法性質的層壓式推銷，大家需要正視其存在。”“比特幣技術可令到交易成本更有效和平宜。”“由於比特幣涉及廣泛的跨境行為，我們應該參與這過程。”

她也關注到比特幣的社會性質，她認為，在一些地區，婦女身懷鉅款並不安全，比特幣錢包較為安全。

比特幣的市場流通約為7300億港元，佔全球黃金市場資本的0.5%，中國GDP的0.53%，一個頗小的數目。由於它的價格的波動性太大，它不可能成為一貨幣，大多部國家將它定義為一種商品。比特幣符合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商品和貨幣的論述。

第一，它符合勞動創造論。比特幣的開發(或採礦)需要大量勞動，大量的電腦運算。現在的比特幣開採主要由大型企業投入。它稱之為交易所，因為除了開採比特幣外，它們還進行比特幣買賣(實為投機活動)，和在核實比特幣的貨幣功能中，收取交易費。交易費與當時交易是否繁忙相關。目前它的小金額交易的交易費約為7美元，比特幣不利小額交易。

第二，它所創造的勞動有利保存。比特幣是一種很強的商品，利用密碼方式，分佈在網絡上的約一萬部電腦(節點義工)，有點像黃金，而不像有期貨的商品如食物等，可永久存在。其擁有權、重複支付等問題有良好的解決方法。

第三，它符合資本論中的“從一般價值形式到貨幣形式的過渡”的論述。資本論表示：

“一般等價形式是價值的一種形式。因此，它可以屬於任何一種商品。另一方面，一種商品

處於一般等價形式(第三種形式)，是因為而且只是因為它被其他一切商品當作等價物排擠出來。這種排擠最終限制在一種特殊的商品上，從這個時候起，商品世界的統一的相對價值形式才獲得客觀的固定性和一般的社會效力。”

“等價形式同這種特殊商品的自然形式社會地結合在一起，這種特殊商品成了貨幣商品，或者執行貨幣的職能。在商品世界起一般等價物的作用就成了它特有的社會職能，從而成了它的社會獨佔權。在第二種形式中充當麻布的特殊等價物，而在第三種形式中把自己的相對價值共同用麻布來表現的各種商品中間，有一種商品在歷史過程中奪得了這個特權地位，這就是金。”

正是由於它十分適合流通，不受中央機構監管，它被指被利用來洗黑錢、支持恐怖主義。

比特幣的理論框架

中本聰先生在2008年的論文簡約為：

點對點的電子現金讓人們直接進行支付活動而無須經過金融機構。電子簽名方式可解決同一筆錢被多重支付的問題，但其缺點是仍然要經過第三方作保證。比特幣方案解決了這限制。

現代的電子支付(如支付寶等)雖然普遍被使用，但它仍然需要第三方作中介。但它仍然存有信託制度的既有問題，例如被第三方(甚至政權)的作弊等。

電子貨幣是一連串的電子簽署。收款人得到一條電子鑰匙，作一定數量的電子貨幣的持有人身份。收款人可在過往紀錄上查冊。問題是，收款人如何保證這批電子貨幣在同一時間沒有被支付多次呢？

比特幣不需要中央機構作中介，所有交易公開透明，參與者利用一條交易時間序列(區塊鏈)，保證交易成功，和他沒有收到偽幣。

每個區塊被打上時間戳，以證明該區聯塊何時產生。每一時間戳包括其之前的時間戳，連成一條鏈。

區塊鍵用了『工作量證明』技巧。『工作量證明』以數學方式(hash雜湊函數)將交易紀錄制

作成一串256位的數字。全球的採礦者爭相為全球約5至10分鐘的比特幣交易加密成一新區塊。加密最高的區塊將被認受和加上區塊鍵的最新一節。這是電腦資源的比併。若想改動一個區塊，其之前的工作必需重新運算。隨著區塊越堆越多，作弊越來越難。累積起來的龐大的已付出的電腦資源令偽幣鑄造者無利可圖。

比特幣網絡的運作方式如下：

- 1) 新的交易會通知所有節點義工(個人電腦)。
- 2) 每個節點將新的交易紀錄到一個區塊中。
- 3) 每個節點各自尋找一個複雜(即最可信的)「工作量證明」。
- 4) 當一個節點滿足於某個「工作量證明」時，它將這「驗證」廣播到所有節點。
- 5) 只當區塊中的所有交易都有效並且沒有重複支付時，節點才接受該區塊。
- 6) 當節點接受一個區塊後，它們會在它之上建立另一個區塊，連成一條鏈，並將之前的區塊的「指纹」紀錄在新區塊內。

按慣例，區塊中的第一個交易創造者可以得到一個新的硬幣。交易商若成功制作並被接納一個區塊時，可賺取12.5個比特幣(隨周期減半)和交易費。獎勵有助於鼓勵節點誠實。因為攻擊者很快會發覺，他要付出更多的CPU電源，用它來產生新的硬幣，比來竊取別人的硬幣更佳。區塊鍵用上了一種數學樹的算法減省其儲存所有交易所需的電腦空間。交易者不需要在其電腦上自行查冊交易詳情。由於區塊鍵的安全性是建基於大多數節點為誠實，當某個節點發現可疑區塊時，它會向其他節點發預警。

為了方便支付，比特幣可以整合和拆細。其方法是將交易分為多個輸入和輸出地址。比特幣可以解決複雜交易。它不需要知道完整的交易歷史。

傳統交易中會收集客人的私隱。在比特幣中，公眾獲悉每筆交易的流量、時間等，但不會知道交易者的身份。

就算盜幣者想攻擊區塊鍵，他的唯一的方法是運用詐騙手法，收回自己剛剛支付的比特幣，但在電腦競賽中，他的成功機會很低。

比特幣網絡簡單實用，節點共同協作但不用高度統一。節點作為義工，一節點一票，可以隨時加入或退出，保障了最好的區塊被加上區塊鍵，即分散式賬目上。

外國規管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在2010年成立的Financial Stability Oversight Council表示：“像大多數新技術一樣，分佈式分類帳系統也會帶來某些風險和不確定性，市場參與者和金融監管機構將需要監控。市場參與者在使用分佈式分類帳系統方面的經驗有限，並且與這些系統相關的操作漏洞有可能在規模部署之前就不會變得明顯。例如，近幾個月來，比特幣交易確認的延遲急劇增加，一些貿易失敗已經發生，因為提交新的比特幣交易的速度已經超過了可以加入到塊的速度。類似地，雖然分佈式分類帳系統旨在防止個別人士的錯誤報告或欺詐，但是其中一些系統可能容易受到通過系統中很大一部分參與者的串通而執行的欺詐的脆弱性。”

美國的 National Terrorist Financing Risk Assessment 2015列舉一個案例，Liberty Reserve在2013年被判觸犯了6項聯邦法律，當中涉及洗黑錢、非法金錢轉移。它在未被檢控前在全球有100萬個用戶，在美國有20萬用戶，每年的交易額超過14億美元。檢察官發現Liberty Reserve的交易涉及信用卡舞弊、盜用個人資料、金融投資舞弊、電腦黑客、毒品交易及兒童色情照片。

日本財務部在2015年的改革支付系統策略性報告建議比特幣交易所要有足夠資金、核數，在防止洗黑錢措施上要保存客戶資料等等。日本在今年6月容許零售業收取比特幣作支付工具。日本也多得中國政府干預國內的比特幣交易所接受交易服務，日本包辦了全球的最大比特幣交易所活動。

澳洲也準備步日本後塵，監管比特幣的支付功能。

俄國一向對比特幣採取強硬立場，其財政部長在訪問中表示，俄國計劃在2018年承認比特幣作為財務工具，以便更加有效地控制洗黑錢活動。

中國的法例

中國對比特幣的官方文件最早的有2013年的《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

2013年

《通知》明確了比特幣的性質，認為比特幣不是由貨幣當局發行，不具有法償性與強制性等貨幣屬性，並不是真正意義的貨幣。從性質上看，

比特幣是一種特定的虛擬商品，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地位，不能且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通使用。但是，比特幣交易作為一種互聯網上的商品買賣行為，普通民眾在自擔風險的前提下擁有參與的自由。

《通知》要求，現階段，各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不得以比特幣為產品或服務定價，不得買賣或作為中央對手買賣比特幣，不得承保與比特幣相關的保險業務或將比特幣納入保險責任範圍，不得直接或間接為客戶提供其他與比特幣相關的服務，包括：為客戶提供比特幣登記、交易、清算、結算等服務。

《通知》要求相關機構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反洗錢法》的要求，切實履行客戶身份識別、可疑交易報告等法定反洗錢義務，切實防範與比特幣相關的洗錢風險。

而在2013年12月，中國人民銀行、工業和資訊化部、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和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發表了《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附件。附件有五點，主要是，“各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不得開展與比特幣相關的業務”。

2015年

經黨中央、國務院同意，中國人民銀行、工業和資訊化部、公安部、財政部、國家工商總局、國務院法制辦、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日前聯合印發了《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銀發〔2015〕221號）

《意見》有20點，當中談及網絡借貸和股權眾籌融資。其意見為：“網絡小額貸款應遵守現有小額貸款公司監管規定”和“股權眾籌融資業務由證監會負責監管。”

2016年

2016年的《中國人民銀行公告第17號〔2016〕》表示，“中國人民銀行對27家非銀行支付機構（以下簡稱支付機構）《支付業務許可證》續展有效期為五年。”並“因部分支付機構存在業務嚴重違規、業務停滯萎縮或主動申請終止業務類型等情形。”

2017年

人行約談

比特幣市場如今都是由中國主導，約有98%的交易量都來自中國。人行在今年2月8日約談9家比特幣交易平台後，大陸三家最大的比特幣交易商9日緊急宣布暫停提現，其中比特幣中國(BTC China)暫停提現72小時，火幣網(Huobi)和幣行網(OKCoin)則將提現業務全面暫停。比特幣9日應聲重挫7.8%。

比特幣融資

2017年9月4日，中國人民銀行、中央網信辦、工業和資訊化部、工商總局、銀監會、證監會、保監會發表了《關於防範代幣發行融資風險的公告》。《公告》表示：“近期，國內通過發行代幣形式包括首次代幣發行(ICO)進行融資的活動大量湧現，投機炒作盛行，涉嫌從事非法金融活動，嚴重擾亂了經濟金融秩序。”，並表示：“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非法從事代幣發行融資活動。”

今年全球企業通過ICO融資總額為18億美元，只及其市場流通額952億的1.8%，但缺乏主流金融市場的監管。例如，澳門的黑幫老大“崩牙”尹國駒參與了澳門賭場的ICO計劃，預計融資5億美元。這件事引起了中國財經官員關注。中國對比特幣進行嚴格監管之後，中國的比特幣交易佔全球比重從90%下降到了10%左右。

9月風暴

中國財經部門在今年9月的干預，令比特幣價格從9月4日的4319美元，跌至9月14日的3226美元，下跌25%，之後回復上升，升至10月19日的5699美元，比9月4日的價格反升32%。

今次的災禍的引子是比特幣融資，而非比特幣採礦或比特幣交易本身，雖然它令到中國的比特幣交易被叫停。中國仍然守在2013年的“比特幣交易作為一種互聯網上的商品買賣行為，普通民眾在自擔風險的前提下擁有參與的自由”原則。比特幣經歷了今次打擊，很快地回復其社會角色，看來，各國政府，包括中國，將採納日本的做法，立法監管比特幣作為一種支付手段。

立即無條件釋放新疆維權人士張海濤(轉載) 忻霖

新疆維權人士張海濤近日被法院以“煽動顛覆國家罪”和“為境外提供情報罪”重判19年徒刑，並沒收個人財產12萬元人民幣。該案代理律師表示，判決之重出乎意料，相信與當局加強新疆維穩有關。張海濤的妻子表示，官方要沒收他們唯一的房產，沒有工作的她和剛滿月的孩子即將流離失所。據悉，張海濤已經提出上訴。

新疆維權人士張海濤的家人1月18日收到判決書，張海濤被以“煽動顛覆國家罪”判處有期徒刑15年、“為境外提供情報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合併執行19年，並沒收個人財產12萬元人民幣。

張海濤的妻子李愛傑接受本台採訪時稱，對丈夫遭重判感到震驚：“說句話難道就判19年的罪嗎？我很震驚，真沒想到他們怎麼會判處這樣的結果。他就說了一句話，難道就能把政府顛覆了？他就是在網上轉發了一些文章，就只有這樣的證據，還有就是接受一些媒體的採訪，當時還放了錄音。他們還說海濤是博訊網的記者，海濤說是系統自動把投稿人當成記者的。只有這些，再也沒有什麼東西。我說你們良心哪兒去了？你們就是把我們置於死地。律師說的那句話我感覺很好，他說只要一句話就能把這個政權顛覆了，這樣的政權不要也罷。說句話這麼有威力，比原子彈還有威力？”

記者：“你還記得是什麼錄音嗎？”

李愛傑：“涉及維穩方面的，說他透露國家資訊。海濤就在庭上辯護，這些資訊大家都知道的，怎麼會涉及國家情報方面的東西呢？說海濤刺探了，海濤說我也沒有接觸公職人員和國家機關人員，怎麼會屬於刺探呢？”

李愛傑透露，當天下午法院到看守所直接宣判，她得知丈夫已經提起上訴。

李愛傑：“他們根本就沒有通知我們，是昨天律師跟我們說今天下午四點判決結果會出來，我們就到了法院，法院說已經判決了，問他什麼時候判決的，對方說剛剛判決，我又問他，才說是到看守所直接宣判的。今天法官也說了你們不服可以上訴，他說我老公已經提出上訴了，而且在法庭上他也說要上訴的事。”

李愛傑表示，丈夫被捕後，家中銀行卡被警方扣押，生活無著。目前，官方的工作人員通知她要沒收財產，她和丈夫只擁有一間小房子，他們的兒子才剛滿月，她還不能出去工作，沒有收入和積蓄，面臨流離失所，感到前路迷茫。

李愛傑：“今天我的情緒也平復不下來，以後我都不敢想，我今天在家哭了很長時間，孩子才剛滿月，他們還說要把我們家的財產沒收了。我們只在這邊有一套小房子，他們要沒收的話，我都不知道跟孩子住到哪兒去。我感覺現在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他們就想把我們置於死地，我感覺很無助。

張海濤去年6月26日被以“涉嫌煽動民族仇恨、民族歧視罪”抄家刑拘，7月被變更罪名為“涉嫌尋釁滋事罪”逮捕，被關押近五個月後罪名又變更為“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

張海濤的律師李敦勇坦言，判決之重出乎意料，相信與當局加強新疆維穩有關。

記者：“判19年你有沒有心理準備？”

李敦勇：“沒有，我估計他判十一、二年。在新疆這個地方，很多事情估計不出來。控罪主要就是他在網上發的那些東西，其他也沒什麼為。”

記者：“境外提供情報罪這有什麼證據呢？”

李敦勇：“也沒有什麼證據，都是網上的東西。就是新疆這個地方好像是一個獨立王國一樣，很多方面跟內地不一樣。就像以前阿裡木江也是這樣的，重判，不分漢族或其他的民族。”

記者：“張海濤有沒有說過他想上訴？”

李敦勇：“他是要上訴的。我跟他講過，無論判什麼，都讓他上訴。”

記者：“判他為境外提供情報罪，他是怎麼得到情報的？”

李敦勇：“他只是普通老百姓。問題是跟文革一樣，大白菜多少錢一斤也是情報。”

據瞭解，張海濤上世紀九十年代從國企失業下崗後於1995年到新疆發展，從事電話卡零售業務。他長期關注新疆民族問題以及民生事務，曾協助訪民在網絡上發表他們遭遇的不公，也曾對社會問題發表獨立觀點。2009年，他被公安以“涉嫌詐騙”羈押，兩個月後獲釋。過去幾年，每到兩會或“六四”周年日等被當局認為敏感的日子，張海濤均會被當地派出所作為“維穩目標”加以監控。

2016-01-18

新疆維權人士張海濤妻兒 逃抵德州(轉載)

世界日報中國新聞組

新疆基督徒維權人士張海濤2016年遭中國當局以「煽動顛覆國家罪」、「為境外提供情報罪」判處19年有期徒刑。他的妻子李愛杰日前攜子逃離中國，經外界多方救援，已於23日抵達美國。

1971年出生的張海濤是一名居住在新疆的基督徒，過去曾積極關注新疆民族問題和民生事務，並經常在網路上發表評論文章、參與維權活動。他在2014年6月4日因參與紀念「六四」25周年活動而遭到當地警方拘禁，並在2016年1月被判刑。

美國自由亞洲電台中文網24日引述美國對華援助協會表示，張海濤入獄後，李愛杰上訪求援，卻受到地方官員施壓。當局逼迫李愛杰的親人，要求李與張海濤離婚，李愛杰拒絕後更遭到親人毆打。於是，她在10月時決定帶2歲的兒子逃離中國。

報導指出，李愛杰母子隨後輾轉到香港再赴泰國。這段期間，受到香港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等人協助。

李愛杰母子23日抵達美國德州後，負責逃離行動總協調的美國對華援助協會主席兼創始人傅希秋表示，美國國務院以及美國駐亞洲多國使領館非常積極參與援助，向李愛杰母子伸出救援之手，他們非常感謝。

對華援助協會並表示，將為李愛杰母子在德州的安頓提供必要的協助，並呼籲中國當局盡快釋放因言獲罪的張海濤，使他早日與家人團聚。

2017年12月26日

巨人之死 - 劉曉波

陳中禧

舉世悲鳴淚無力
光明被消失有年
死亡早呈現於被沈默者
能否「好好活下去」？
當財富不均公義不張
言論被禁
所有悲劇在發酵

故鄉在那裡？
戰火下的受苦者是追求和平者每天的淚
家庭離散
健康被消
盼望被絕
悲劇在發酵
「好好活下去」
情願淚慟流

15/7/2017 泣

後記：正義的不倒翁死了，臨終前放不下的是因他而失去自由的妻子親朋。巨人不怕死，只怕至親被牽連受苦。真的，但願劉霞活得好，所有在獨裁統治下或在戰火中的孤兒寡婦也活得好！

巨人之死 - 劉曉波(二)

曾預言必死
預言成灰仍擁抱愛人
良知憲章
故鄉本光輝在望
牢獄關不了意志
終身撲滅仇恨

人間有情縱使腳枷沉重
等待期滿自由
豈料七月飛霜成幻影
骨灰隨海下沉
心被捶動
中國在諳然
中國在悲傷
世界在悲傷

寫於17/7/2017

後記：巨人之死，觸動千萬人的神經。國內相信很害怕像胡耀邦之火，成為「陸肆」翻版。然真理之火焰卻難以撲熄。正如香港2014年尾發生「佔中」的起因，是源於社會貧富懸殊，百多萬人生活於貧窮線之下；也源於年青人及基層市民的價值觀，漸與擁抱中環價值(金融、地產、名牌為先)的市民不同。而回歸以來，不少香港的公共知識分子及年青一輩，崇尚自然、愛護山林，也希望保存傳統文物與文化等。他們希望在沒有出路的社會、教育及政制問題上，嘗試尋找生路，因而與建制派發生了相當嚴重的衝突，形成彼此撕裂的局面。

2014年至今，全球多國也有類似香港的問題。例如貧富懸殊；例如社會上不同階層或種族的人，彼此因宗教、文化、價值觀相異而日漸疏離，各走極端。再加上恐怖分子會忽然出來襲擊而惶惶終日。但曉波先生教我們，不要彼此仇恨，不要攪階級鬥爭。更不要以暴易暴，卻要擁抱愛，付出愛；因為只有愛、饒恕、包容、講道理、願犧牲的行為，才是真正值得我們擁抱的態度與生活。多謝您，曉波先生，我們不知您是否基督徒，但您所行的，活像主耶穌！但願您所愛的劉霞女士及親朋，盡快得平安，享自由！

編者按：本刊素來奉行唯物辯證的思想方法，而絕不同意唯心論說，有如文裏末段所說的，但我們尊重思想信仰自由，故予以發表。

十月評論 2017 第2/3期

殺人的問題(一) (轉載)

慕容雪村

中國近代史上，有過無數次人道主義災難，這些災難讓千萬人受損乃至慘死。

然而災難過後，人們對於災難的反思常常只著眼於體制，而不及於個人。

那些曾為體制效力的人會坦然地為自己辯護，說他們身不由己，他們只是螺絲釘而非機器的開動者，是被動而不是主動做惡。

應該指出的是，體制本身並不能獨自運行，正是因為有那些看似無辜的人的參與，罪惡才得以實現，也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災難才能如此深重。

1964年，漢娜·阿倫特發表了題為《專制下的個人責任》的著名演講，她尖銳地指出，不僅要反思體制，不僅要追究政治責任（政府必須對其前任的行為負責），也要追究個人責任。

第一種辯護會說：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僱員，只是機器上的一個齒輪，甚至連齒輪都不是，只是齒輪上的一個齒牙。

你看，我也是人，也要養家糊口，即使我不去做那些事，肯定也會有別的人替我去做。

對此阿倫特的回應是：請告訴我們，為什麼你會變成一個齒輪？

又在何種情況下，你才會繼續願意做一個齒輪？

如果從上到下的每個公職人員都是齒輪，難道就沒有人需要對罪惡負責任了嗎？

她繼續追問：難道我們每一個人不是具有獨立意志的個體嗎？

難道我們沒有主觀意志和選擇的自由嗎？

我覺得，她一定還有更嚴厲的質問沒有說出口：難道你是豬嗎？

還有一種說法是：如果我不去做那些事，可能會有比我更壞的人去做。

我們參與其中，事實上避免了更壞的事情發生。

還有些人會說，我們在體制中做了一些壞事，但也做了一些好事。

我們沒有加重災難，相反，我們使之減輕，瞧，我們甚至挽救了一些人。

阿倫特的回應是：這種辯護或許可以減輕法律上的責任，但並不構成道義上的合理性。

當人們辯稱自己在體制中做了一些好事，那就要問：這些好事是否最終改變、終止或推翻了邪惡的體制？

如果沒有，那麼與體制的妥協就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它還在繼續做惡，並將迫害更多的人。

事實上，一個小的罪惡通常會成為更大罪惡的前奏，人們會很快走向“道德的滑坡”，從一件壞事到多件壞事，從小的罪惡到大的罪惡。

如果你為保護一個村而交出一個人，也必然會為了保護一個鄉而交出一個村，更會為了一個縣而交出一個鄉。

在這種不間斷的“道德滑坡”中，最明智的辦法顯然只有一個：停止做惡，不管你有什麼樣的理由。

如果體制內的工作是邪惡的，就應該立即停止與體制合作。

第三種說法認為：服從命令、遵守法律是每一個公民、每一個公職人員的天然責任。

我雖然做了某些事，但我只是在履行職責。

阿倫特的回應是：上級的命令和“法律”並不能為

眾多的犯罪行為開脫，對成年人來說，“服從”就意味著“認可”，“認可”就意味著“贊同和支持”，所以，不應該問那些作惡的人“你為什麼服從”，而應該問：你為什麼支持？

——當上級命令你把猶太人押進毒氣室，你為什麼支持？

當上級命令你開動坦克，你為什麼支持？

當上級命令你囚禁一個盲人，你為什麼支持？

法學中有句話：惡法亦法。而事實上，如果你是一個有良知的人，就不應該把邪惡的法律再視為法律，更不應該支持。

第四種是所謂的“集體過錯理論”，每次災難過後，總會有人拿著完美的道德標準質問別人：

你說他做的不好，難道你就沒做過一點壞事？

在這種完美道德之下，誰都沒有資格質問別人，最終每個人都有罪，每個人也都無罪。

人們不再追究個體責任，轉而去拷問制度、拷問歷史、拷問文化，把全部罪惡歸諸集體，如果要懺悔，那就所有人一起懺悔，如果要受懲罰，那就所有人共同受罰。

阿倫特對此的回應是：這種集體認罪、集體悔過的理論，其實無助於認清真相，只能讓真正有罪的人順利脫罪，並最終將演化為“道德虛無主義”。

她說：“世上根本就沒有什麼集體愧疚或集體清白，愧疚和清白只有落實到每一個具體的人時才有意義。”

當真正有罪的人拒不懺悔，並以“集體過錯”為自己辯護，那其實是在逃避責任。

中國文化常常強調“寬容”而忽視“責任”，但我認為，只有在私人生活中“寬容”才有意義，而在公共生活中，在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中，主張寬容其實是一種智力低下的表現，至少也是糊塗，或者用孔夫子的話說，鄉愿，德之賊也。

在《專制下的個人責任》中，漢娜·阿倫特提出一個更加尖銳的問題，她認為，那些效力於體制的人，通常不是因為恐懼，也不是為生活所迫，而是因為他們抗拒不了誘惑，專制制度總是會給它的效力者提供各種優待：

鐵飯碗、顯赫的身份、滿足感以及可觀的物質利益。

當德國人紛紛加入納粹軍隊，實際上是為了追求自己的功成名就；

幾十年前的年輕人紛紛加入紅衛兵組織，其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受了虛榮心的驅使。

當數以百萬的人踴躍報考公務員，我相信，他們不僅是為了一份體面的工作，更是為了潛規則和巨大的灰色利益。

在這種情況下，再以“齒輪說”或“服從命令說”為自己辯護，其虛偽不言而喻。

邪惡制度是人間災難，更是對人類良知的考驗，換成更形象的說法，它其實是兩個問題：

一、給你很多錢，你會不會去殺人？

二、如果你不殺人，自己就會被殺，你將如何選擇？

許多體制內的人都會誇耀自己的道德水平，而事實上，正是因為有了這些道德高尚的人，邪惡的製度才得以運轉。

還是那句話：做幫兇還是不做幫兇，這是一個問題。



漢娜·阿倫特
平庸之惡

三六雜覽

我的祖父里昂·托洛茨基

採訪厄斯特班·瓦爾科夫 (ESTEBAN VOLKOV)

華德.法堅



這是對托洛茨基孫子的採訪，他曾與著名的革命家生活在一起。

當刺客試圖謀殺厄斯特班·瓦爾科夫時，他是十三歲。因為他的祖父是托洛茨基。現在，91歲的瓦爾科夫讓托洛茨基的記憶在墨西哥城的一座博物館裡保存下來。

該建築是科約阿坎 (Coyoacán) 無數別墅中的一個：在高高牆後的一棟房子。科約阿坎曾經是墨西哥城之外的鄉村小鎮，是藝術家們尋求安寧的地方。今天，這是一個大城市中心的時尚街區，離地鐵站幾步之遙。充滿仙人掌的花園可能是田園詩般的 --- 如果沒有高速公路的噪音和氣味。

當我們到達時，瓦爾科夫正在等著我們，他身穿灰色西裝，頭戴巴西工會聯合會中央工會 (Brazilian Trade Union Federation, CUT) 的紅色棒球帽。他深沉的眼神看起來很嚴肅 --- 但他很快就笑了起來。沒有任何明顯的困難，他引導我們走過這座房子 --- 托洛茨基度過了人生最後幾年的住所。我們看到了彈孔，牆磚堵塞

的窗戶，沉重的鋼門 --- 有點像監獄。現在，所有這些都是他家的博物館，他們大多數是政治謀殺的受害者。

1929年托洛茨基被迫離開蘇聯，在土耳其的普林基波島上找到了避難所。幾年後，他被驅逐出土耳其，然後又從法國和挪威被驅逐。1937年，他在墨西哥得到了庇護。

托洛茨基的女兒齊娜達·沃爾科娃 (Zinaida Volkova) 在1933年遭受了嚴重的抑鬱症，並被奪去了生命，留下了一個小兒子弗謝沃洛德·塞瓦·瓦爾科夫 (Vs瓦爾科夫olod “S瓦爾科夫a” Volkov)。在短暫地同他的叔叔 --- 他不得不逃到巴黎躲避納粹，後來被斯大林的特工殺死 --- 會合之後，年輕的塞瓦和祖父一起搬到了墨西哥。

他還記得那些歲月，當時，著名的革命者走在仙人掌叢中，蹣手蹣腳地避開暗殺企圖。後來，一九四〇年八月二十日，托洛茨基的運氣結束了。他被斯大林的特工殺害。

生活繼續下去。塞多夫成了墨西哥公民，並採用了他的西班牙語名字：厄斯特班。他學成後，成了一名化學家，併發明瞭避孕藥的工業化生產方法。

但是他沒有忘記他的祖父的遺產。自1989年以來，塞多夫一直擔任里昂·托洛茨基博物館主任。

你對里昂·托洛茨基的第一個記憶是什麼？

瓦爾科夫：當我剛從巴黎來到這個房子的時候，

我年齡是13歲半，同來的還有阿爾弗利德（Alfred）和馬格裡特·羅斯梅（Marguerite Rosmer）。對比鮮明。冬季的歐洲是灰色，灰色，灰色。我來自一個充滿悲傷的陰霾環境：我的叔叔列夫·塞多夫去世後，我的心情遭受破壞。塞多夫於1938年2月去世。他的遺孀想監護我，祖父不得不求助於律師。1939年8月，我終於來到了科約阿坎。

我的第一印象是：彩色！墨西哥是一個充滿色彩的國家。當時，這是一個完全與墨西哥城隔絕的村莊。你必須經過甜菜和玉米地到達城市。下雨時，土路成了河流。

在這裡對你更安全嗎？

瓦爾科夫：應該是。但斯大林的特工也在這裡活動。第一次暗殺企圖是發生在1940年5月24日。我藏在我的床下。刺客從三個不同的方向進入我的臥室，用手槍射擊床墊，把子彈打盡。開了七八槍，其中一槍擊中我的大腳趾。

他們射擊小孩？

瓦爾科夫：當然。他們殺害了許多托派人士，想要消滅他的整個家庭。托洛茨基的兒子謝爾蓋·塞多夫留在俄羅斯，他對政治不感興趣，但也遭到槍殺。

1940年5月，一位來自美國名叫謝爾敦·哈特（Sheldon Harte）的年輕保鏢，剛剛抵達。他是斯大林的特工，為刺客打開了大門。後來他們殺了他，把他的屍體埋在城外的一個公園裡。在斯大林檔案中，有記錄說，他批評了他的同志，他說，如果他知道他們也打算殺害這個孩子，他就不會參加這個行動。

所以他被烙上了叛徒印記。這就是斯大林制度的運行原則：當出現問題時，你必須找替罪羊擔責。在這種情況下，責怪美國人是很容易的：他們說哈特曾經警告過托洛茨基，後來托洛茨基就躲在地窖裡。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這個故事多次被這樣拍攝。但這是荒謬的。就好像爺爺會留下我孤獨一人一樣。



到底是怎麼回事？

瓦爾科夫：爺爺吃藥幫助他睡覺。射擊開始的時候，他首先以為是一些墨西哥宗教慶典的煙火。[笑] 他的伴侶娜塔莉婭（Natalia）跳了起來。她把他拖了起來，把他推到一個黑暗的角落，救了他的命。

攻擊後發生了什麼？

瓦爾科夫：斯大林份子試圖把它弄成托洛茨基自己組織的一場鬧劇。他們收買了一名員警和兩名在這裡工作的廚師，要他們提供虛假證詞。三人都說，那天晚上那些警衛緊張，一直在爺爺辦公室裡講話，直到很晚。開始，警方輕信了這個謊言。

但涉案者有二十多人——流氓和斯大林份子。不知何故，他們抓到一個在酒吧裡吹牛的人。共產黨領導人，著名畫家阿爾法羅·西凱羅斯（Alfaro Siqueiros）領導了這個陰謀。西凱羅斯短暫入獄，但隨後就移居智利。

那之後，住所裡的生活有了什麼改變？

瓦爾科夫：之前，我們經常和朋友一起去鄉村去收集仙人掌。祖父非常喜歡仙人掌。墨西哥仙人掌種類繁多，尋找新的品種是個挑戰。

我們會花幾個小時開車在碎石路上旅行。

在第一次暗殺企圖之後，這些旅行停止了。我每天去上學，但爺爺在家裡，實際上像個囚犯。

起先，一個義大利家庭租了這個房子。美國的托洛茨基黨籌集了錢並購買了它們，以便他們能夠築起防禦工事，用磚封起窗戶，並在屋頂上蓋上掩體。托洛茨基本人知道下一次暗殺不會是一個簡單的重複。

你不能逃到別的地方嗎？

瓦爾科夫：應該是一樣的。托洛茨基的秘書受到批評，說他沒有採取正確的預防措施。但托洛茨基知道他只得到一個短暫的喘息機會。也許可以延長幾個月壽命。但是，斯大林準備為除掉托洛茨基而做任何事情。三個月後，加泰羅尼亞人拉蒙·梅加德（Ramón Mercader）成功了。

1940年8月20日你在家嗎？

瓦爾科夫：我在謀殺案發後不久回到家。我看到一個人在拐角處，被警察拘留。梅加德（Mercader）被關進監獄二十年

你爺爺在日常生活中是怎麼樣的？

瓦爾科夫：深情，富有幽默感。他是一個生氣勃勃和活力無限的人。如果我們要找一個演員來演托洛茨基，唯一能扮演這個角色的人就是柯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笑）。道格拉斯有祖父那種典型的動力。

托洛茨基會講很多語言。他與美國衛兵講英語，同捷克斯洛伐克籍秘書揚·巴贊（Jan Bazan）講德語，同秘書吉恩·海耶諾特（Jean van Heijenoort）講法文。他也同我講法語。

不是俄語？

瓦爾科夫：不，我不再會講俄語了。在家裡，大多數秘書都是美國人。政府給托洛茨基流亡施加的一個條件是，他不干涉墨西哥的政治 -- 所以我們不能雇用墨西哥的助手。

但是托洛茨基有很多關於墨西哥政治的文章。

瓦爾科夫：他用化名寫了一些關於墨西哥的文章，但他沒有介入政治。

托洛茨基去世後，家裡發生了什麼事？

瓦爾科夫：我們繼續住在這裡。娜特莉婭於1962年去世，和托洛茨基一起被埋在花園裡。1965年，士兵佔領了這座房子 --- 政府對具有托洛茨基主義信念的學生進行報復。[笑] 但幾個月後，他們打電話給我們 --- 說他們不知道該拿房子怎麼辦，所以我們再次搬進來了。

我們又待了十五年，然後我們開了博物館。1990年擴大到包括一個庇護權利機構。一些空的壁球館被翻新成一個禮堂，一個展覽空間和一個圖書館。

我自己一直留在政治的邊緣。爺爺曾經對秘書說：如果你跟我的孫子說話，一點政治也不要涉及。

今天托洛茨基有什麼意義？

瓦爾科夫：他絕對相信社會主義將決定人類的未來。他毫不懷疑。但是歷史的時鐘移動得比想像的更慢。與歷史週期相比，人類的生命是非常短暫的。但是，不容置疑的是，如果要生存下來，人類需要一種不同形式的社會組織。因為，資本主義總是達到新的破壞程度。

改編自Der Freitag
譯自《雅各賓雜誌》。

2017年11月17日

論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

阿雷·巴蒂歐



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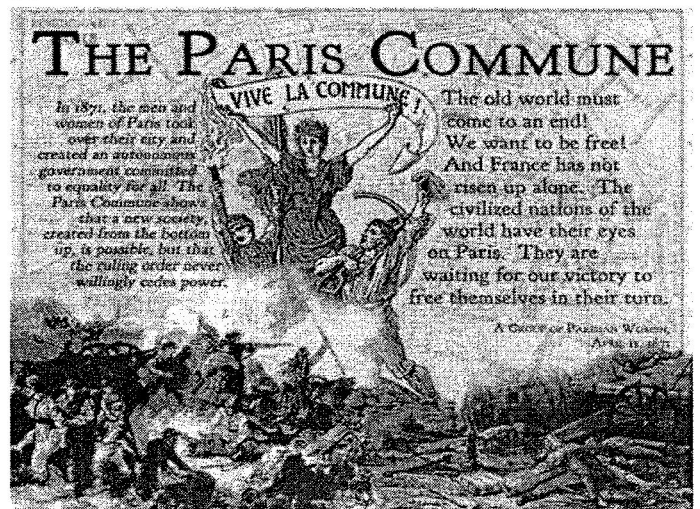
我想強調一下，在資本主義取得全球範圍內的顯然勝利之後，有一點似乎被忘記了：1917年的俄國革命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件。

在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整體而言，人類的歷史相當短暫。它相當於20萬年，同恐龍統治我們星球數百萬年的時間相比，並不算多。我們可以認為，在這個短暫的時間序列中，基本上只有一個根本的“革命”：新石器時代的革命。這場革命意味著更有效的工具，穩定不變的農業，穩定的土地所有權觀念，陶器，富餘的食物提供了可能性，允許悠閒的統治階級存在，由此產生了國家、文字、金錢、稅收、軍事裝備的完善（得益於青銅器），長途交易……。所有這一切都要追溯到幾千年前，我們仍然處在這個地步。即使現代科學支撐的工業生產加速了許多過程，事實上，我們的世界仍然是國家對立的，戰爭的世界，由一個非常狹窄的金

融寡頭統治，國際貿易具有決定的重要性，對原材料進行軍事化掠奪，有幾十億人口的龐大群眾，處於幾乎完全貧困的狀態，以及貧窮農民從各地不間斷地湧到擁擠的大都市，在那裡他們的地位次人一等。

只有在很晚，幾個世紀以前，這個國家的經濟基礎問題才成為政治討論的核心。從那時起，我們可以說，甚至表明，同樣的壓迫和歧視性社會組織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置身於任何國家形式（個人集權或民主制）之後。也就是說，一個組織，其中最重要的政府決定總是涉及私有財產的無限保護，通過家庭傳遞這種財產，最後維護巨大怪誕的不平等性，這種組織是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

於是出現了一些革命性行動，完全不同於那些只是質疑政治權力形式的行動。整個十九世紀的革命嘗試都是朝向這個方向來進行的，通常是血腥的失敗。巴黎公社在巴黎的鵝卵石上已經有三萬人死亡，這些災難仍然是最光榮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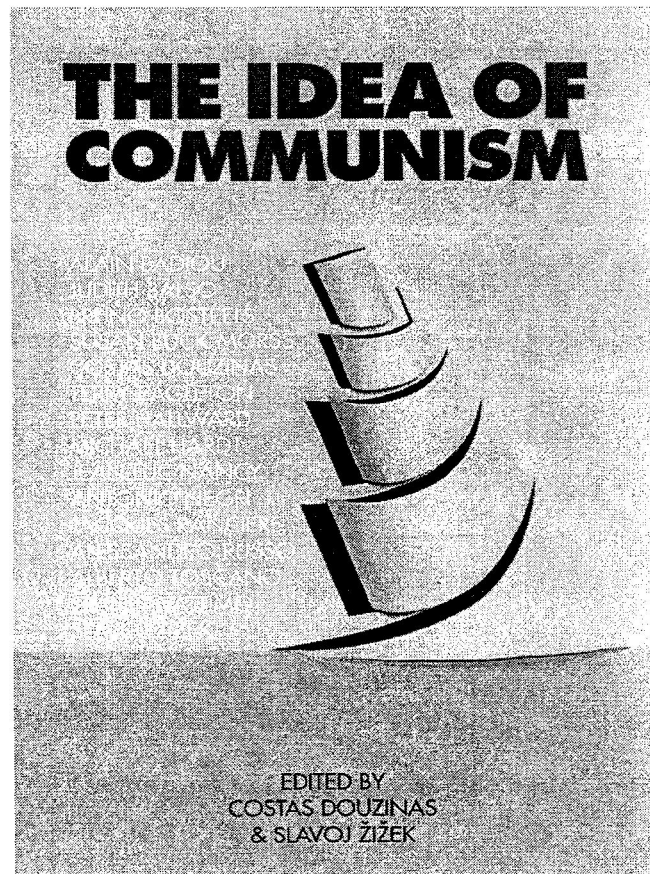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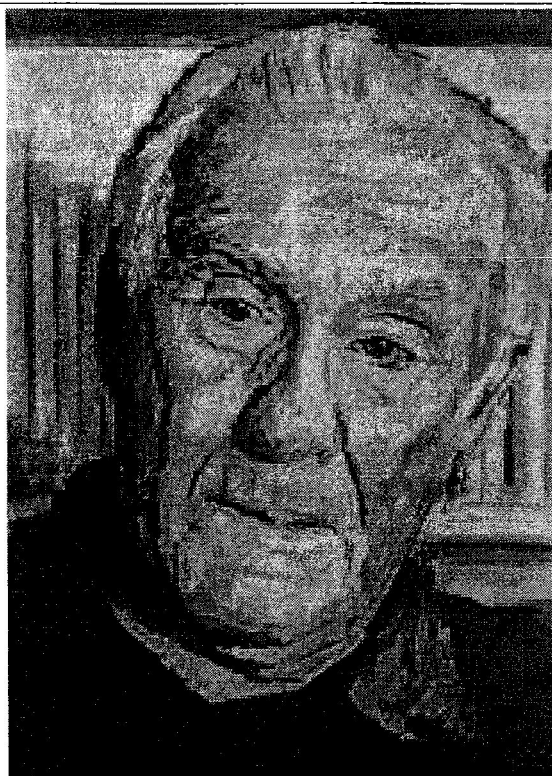
於是，讓我們這樣說吧：在俄國專制中央政府弱化的情況下，這個國家魯莽地參加了1914年到1918年的世界大戰，接踵而來的第一次民主革命（1917年2月）推翻了這個政府，形成了一個年輕的工人階級，這個階級非常勇於反抗，沒有任何保守的工會來把它框起來；領導它的是布爾什維克黨，這個黨組織在某種意義上是不可動搖的；還有列寧和托洛茨基，他們把強大的馬克思主義文化和根據巴黎公社教訓而來的長期戰鬥經驗結合起來；在1917年10月，這一切融合在一起，就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獲得的後新石器時代的革命勝利。

這意味著一場建立了政權的革命，其目標是徹底推翻所有“現代”社會的千年基礎：那些擁有生產和交換的金融控制權的人的隱性專政。這是一個為新的現代性奠定基礎的革命。而這個絕對新奇的共同名詞是 --- 而且在我看來，它仍然是 --- “共產主義”。世界各國人民，從工農群眾到知識份子和藝術家，都認識了這場“共產主義”名義下的革命，熱情地迎接它，其熱情同它對上個世紀慘敗之報復相稱。列寧現在可以宣告，革命勝利的時代已經到了。

無論這個前所未有的冒險的後期化身是什麼，無論當代新石器時代集團如何盡力在世界範圍內把事情倒回去，1917年10月的共產主義革命仍然是我們信念的基礎，因為知道，在人類轉化的短暫層面上，執政的資本主義是而且永遠是某種過去的東西。即便是短暫而過。

註腳

[1]該文第一次發行的是法文版，是“十月革命的人道主義（L'Humanité on the October Revolution）”特刊的一部分。



十月革命的遺產

大衛·曼德爾

一百年後，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處理十月革命的歷史遺產問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史達林主義在革命後不到十年內就已經紮根了，而七十年後資本主義的復辟卻遇到了很少的民眾抵制。當然，人們可以指出紅軍在反法西斯主義鬥爭中的主要作用，或者指出蘇聯與資本主義世界的對抗，擴大了反帝鬥爭的空間，或者指出在對付資本主義對一個主要國有化計劃經濟體的貪欲方面，它起到的控制作用。然而，即使在這些領域，遺產也遠非是不含混的。

但是，對於今天的左派來說，十月革命的主要遺產其實是最不含糊的。它可以用兩個詞來概括：“他們 敢做”，我這樣說的意思是，布爾什維克組織革命，從有產階級那裡奪取政治經濟權力並消除其反抗，作為一個工人階級政黨，是忠於其使命的：他們為工人和農民提供了他們需要和想要的領導。

因此，比較諷刺的是，許多歷史學家和跟隨他們的民眾輿論，都把十月革命視為一個可怕的罪行，是受到建立社會主義烏托邦計畫的意識形態啟發而推動的行為。根據這個觀點，十月革命是一個蠻橫的行為，將俄羅斯從正常發展的道路轉移到了資本主義民主的道路。此外，十月革命引發了蹂躪俄羅斯近三年的內戰。

關於這種觀點，有個修改版本，甚至獲得了一些左派人士的贊成，這些左派人士拒絕“列寧主義”（或者他們認為是列寧戰略的東西），因為其中有因革命奪權和內戰而爆發出來的獨裁動力。

然而，最令人震驚的是，當人們從下層研究這個革命的時候，實際上，很少有布爾什維克和支持他們的工人，是受“意識形態”鼓動的，這個“意識形態”是指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的某種千禧年運動。實際上，最重要的是，對普通大眾面臨的非常嚴重和具體的社會政治問題，十月革命是實際的回應。當然，這也是走向社會主義的馬克思恩格斯道路 --- 不是按照某種先入為主的設計來建構的烏托邦，而是改變資本主義制度下工人實際狀況的一套具體解決方案。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頑強地拒絕提供“未來的功能表”的原因。[2]

十月起義的直接和主要目的，是防止一場反革命，這場反革命受到資產階級經濟破壞政策的支持，要消滅二月革命的民主成果和承諾，使俄羅斯捲入帝國主義大屠殺的世界戰爭。勝利的反革命 --- 這是十月革命唯一真正要替代的物件 --- 可能會讓全世界第一次出現一個法西斯國家，比義大利和德國的資產階級對類似失敗革命高潮的有些遲的反應，還要早幾年。

當然，布爾什維克以及俄羅斯大多數都市化的工業工人是社會主義者。但是俄羅斯馬克思主義的所有派別都認為俄羅斯缺乏建成社會主義的政治經濟條件。可以肯定的是，存在這樣的希望，即奪取俄羅斯政權的革命，會鼓勵西方較發達國家的工人也起來反對戰爭和資本主義，為俄國革命開闢更廣闊的視野。這確實是一個希望，但這遠非確定的。沒有它，十月革命也發生了。

在我的歷史研究工作中，我提出了支持這種十月革命觀點的檔記載，以我的看法，這些檔是可信的，不過我不會在這裡羅列證據。我寧願解釋，布爾什維克和支持他們的工人 --- 這個黨由絕大多數工人階級組成 --- 害怕內戰的威脅；他們非常想避免這種情況，但避免不了，於是想要儘量減少其嚴重程度，意識到這些時，是多麼的痛苦。為了做解釋，作為十月革命的遺產，我想更加強調“他們敢做”的意思。

防止內戰的願望，是大多數布爾什維克和大多數工人在革命初期支持“雙重權力”的原因。在這種安排下，由一個臨時政府操控行政權力，這個政府最初只由代表有產階級的自由派政治家組成。與此同時，由工人和士兵選出的政治組織蘇維埃，要監督政府，確保其忠於革命的綱領。該綱領包括四個主要內容：民主共和國，土地改革，八小時工作日，以及旨在確保迅速民主地結束戰爭的活躍外交。在那個綱領中，沒有任何社會主義的東西。

黨長期拒絕資產階級作為反獨裁鬥爭的潛在盟友，而支持雙重權力，就標誌著與這個拒絕政策的根本性決裂。這種拒絕政策是布林什維主義作為工人黨的根基。這就是黨在戰前勞工高潮時期在工人運動中獲得至高威信地位的原因。拒絕資產階級（同時又是對孟什維主義的排斥），源于工人對資產階級與專制政府密切合作反對他們民主社會願望的長期而痛苦的經歷。

對雙重權力的最初支持，反映出給自由派一個機會的意願，因為有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憲政民主黨（Kadet）在1917年成為他們的主要政治代表）恢復了對革命的支持，雖然這種支持來得頗為遲緩，或者它似乎支持革命。他們堅持革命，極大地促進了在俄羅斯廣大領土

和前線的不流血勝利。二月蘇維埃掌權的假設會使有產階級疏遠革命，引起內戰的陰影。此外，工人並未準備好承擔管理國家和經濟的直接責任。

他們後來拒絕雙重權力，要求向蘇維埃轉移權力，絕不是對列寧回歸俄羅斯及其四月提綱發佈的自動回應。從根本上說，這些提綱是對黨傳統立場的回顧，不過是在世界大戰和勝利民主革命條件下的回顧。如果列寧的立場勝出，那是因為情況越來越清楚地顯示，有產階級和他們在政府中的自由派代表敵視革命目標，實際上想要扭轉革命。

早在四月中旬，自由政府就明確表示支援戰爭及其帝國主義目的。甚至在此之前，資產階級報刊就終止了民族團結的短暫蜜月，發起運動，反對所謂的工人利己主義，說工人以犧牲戰爭生產為代價謀求狹隘的經濟利益。其意圖顯然是破壞使革命成為可能的工人-士兵聯盟。

並非無關的是，在工人中間，對以供應困難為由而逐漸停工的懷疑越來越多，工廠主們堅決拒絕政府對不景氣經濟的監管，擴大加劇了這種懷疑。停工一直是工廠老闆們最喜用的武器。在戰爭爆發前的六個月裡，首都工廠老闆與國營工廠當局一起組織了不下三次的全面停工，在此期間，共有30萬工人被解雇。而在十年前的1905年十一月和十二月，首都的兩次大停工給俄國第一次革命造成了致命的打擊。

到了1917年的春末和夏初，“調查學會（census society）”（有產階級）的知名人士呼籲鎮壓蘇維埃，並獲得了他們階級的大會的持續讚賞。然後在6月中旬，在盟國的強大壓力下，臨時政府發動了軍事進攻，結束了自2月份以來在東線實行的事實上停火。

所以，到了六月份，首都的大部分工人已經接受了布爾什維克要求，要政府擺脫有產階級的影響。這實質上就是“一切權力歸蘇維埃”的意思：一個政府只對工人和農民負責。到了這樣的程度上，布爾什維克和首都的大部分工人已經接受了內戰的必然性。

但這本身並不是那麼可怕，因為工人和農民（士兵絕大多數是年輕的農民）是人口的絕大多數。更加令人擔憂的是，戰爭發生在普通大眾內部，在“革命民主派”範圍內。因為，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SRs）主宰了首都以外的大部分蘇維埃，以及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TsIK）和農民執行委員會。他們支援自由派，把領導權交給聯合政府，以支持後者的弱勢民眾權威。

7月初，革命民主派內部的內戰威脅被強行帶入，當時一些衛戍部隊和首都的工人一起大規模地示威，迫使中央執行委員會（TsIK）自己掌權。他們不僅在這個目標上失敗了，而且他們的示威活動標記了革命的第一次嚴重流血事件，隨後是一波政府對左派的壓制措施浪潮，而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原諒了政府的做法。

因此，七月危機（The July Days）使得布爾什維克及其工人支持者沒有一條明確的前行道路。黨正式地採取了列寧提出的一個新口號：權力歸於一個“工人和貧農的政府” --- 沒有提到蘇維埃，因為在首都之外他們受到溫和社會主義者的控制。列寧的意思是說，作為一個要準備起義的號召，一個可以繞開蘇維埃的起義，而且如果必要的話，甚至是轉而反對他們的。但實踐中，這個口號，不為黨和首都工人接受，因為這意味著反對仍然支持溫和派的人民群眾 --- 也就是意味著革命民主派的內戰。

特別要關注的是社會主義者的態度，即左傾知識份子的態度，其本身是受過教育的少數人。左派知識份子幾乎普遍支持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布爾什維克是一個下層人民據絕對多數的平民黨，左派社會革命黨人也是如此，他們於1917年9月從俄羅斯農民黨（SRs）脫離出來，並於11月與布爾什維克組成聯合蘇維埃政府。沒有受過教育者的支持，管理國家而且也許還有經濟，這個前景令人深感憂慮，而工廠委員會的積極分子，他們絕大多數是布爾什維克，對此尤其擔心。

8月底，科爾尼洛夫將軍的無端起事，得到了有產階級的熱烈支持，最初，似乎開闢了一條走出僵局的道路。面對明顯的情況，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似乎接受了同自由主義者決裂的必要性。（自由派部長在起事前夕辭職）。對科爾尼洛夫向彼得格勒進發的消息，工人做出的反應，奇異地混合著放鬆和警惕的情緒。他們感到放鬆的是，他們終於可以採取行動，反對進攻中的反革命了 --- 他們奮力這樣做了 --- 與其餘的革命民主派行動一致而不是反對他們。在科爾尼洛夫的失敗之後，列寧為中央執行委員會（TsIK）提供了其黨的支持，履行了一個忠誠反對派的責任，可能的話，它會取得政權。

但是，經過一些短暫的動搖之後，溫和派社會主義者拒絕同有產階級決裂。他們允許克倫斯基組建一個新的聯合政府，其中包括一些特別可惡的資產階級人物，例如實業家斯米爾諾夫（S.A. Smirnov），不久前他才解雇了他紡織廠的工人。

但到了9月底，布爾什維克在俄羅斯大部分蘇維埃已經佔有多數，於是，在中央執行委員會（TsIK）勉強決定於十月二十五日召開的蘇維埃會議上可能成為多數派。仍然躲在逮捕令

的列寧要求他的黨中央準備起義。但是中央的多數人猶豫了，寧願等待立憲會議。他們的猶豫可以理解。畢竟，一場起義將會釋放大部分尚是潛而待發的內戰。這是一個結果未知的可怕跳躍，它可能使黨在深刻的經濟政治危機條件下，擔起執政責任。另一方面，如果制憲會議能夠克服俄羅斯社會特色的深刻兩極分化，或者說有產階級會接受它的決定，這還是個希望，如果反對他們，那希望肯定就是一種幻想。而與此同時，產業崩潰和大規模饑餓也即將來臨。

如果布爾什維克領導層決定組織起義，那不是因為列寧的個人權威，而是受到黨內中下層的壓力，列寧曾經向後者發出呼籲。1917年10月，彼得格勒黨組織成員4.3萬人，其中工人2.8萬人（整個工業勞動力42萬左右），士兵6000人。這些工人已經準備好行動了。

然而，黨外工人群眾的情緒卻更為複雜。他們強烈支持向蘇維埃轉移權力的要求。但他們並不是要倡議本身而已。從革命的頭五個月起，當普通工人堅持這個倡議並強迫黨遵從時，這是一個明顯的逆轉。在‘二月革命’中，在四月份反對政府戰爭政策的抗議中，情形都是這樣，還有，在爭取工人控制，防止緩慢停工的運動中，以及在7月份旨在迫使中央執行委員會（TsIK）接掌政權的示威活動中，情形也是這樣的。

但七月危機（The July Days）的流血事件和隨後的鎮壓改變了事情。誠然，政治形勢已經演變，幾乎到處都是布爾什維克在帶領蘇維埃。但是在暴動之前的那幾天，整個非布爾什維克新聞界都自信地預測，工人會遭到比七月危機還要血腥的暴動失敗。

讓工人們猶豫的另一個來源是大量失業的

陰影。推進產業崩潰是支持立即行動的最有力論據。但這一個不安全因素，也造成工人的猶豫不決。

因此，這一倡議落到了黨的身上。而且，似乎布爾什維克工人們自己也不是沒有懷疑的。但是他們有一定的素質，是經過多年與專制和企業主的激烈鬥爭而形成的，使他們得以克服疑慮。其中一個特點就是他們要脫離資產階級而獲得階級獨立的願望，這也是布林什維主義工人運動的特徵。在革命前的幾年裡，這些工人堅持要求他們的組織，無論是政治的，經濟的還是文化的，都不受有產階級的影響。

與此密切相關的是這些工人強烈的尊嚴感，無論是作為個人還是作為工人階級的成員。在俄羅斯，一個“覺悟工人”的概念包含了整個世界觀和道德準則，後者同調查學會的觀點和道德規範不同，並且基本上是與之相反的。在其他方面，尊嚴感表現在“禮貌演講”的要求中，這個要求總是在工人的罷工要求清單中出現。管理層有禮貌的用第二人稱複數提出要求，而不是非正式的單數，那是為親近朋友，孩子和下屬保留的。在編制罷工統計資料時，沙皇內政部在政治要求欄中列出了“禮貌待人”，可能是因為這意味著拒絕了工人在社會上的從屬地位。1917年的工廠會議決議經常把臨時政府的政策稱為對工人階級的“嘲弄”。而在十月，當時工人赤衛隊跑步不肯彎腰或拒絕打得倒下，因為他們認為對革命工人來說，這是怯懦和恥辱，所以士兵不得不向他們解釋，把腦袋送給敵人是不光榮的。但是，如果階級榮譽感是一種鬥爭責任，那麼沒有它的十月革命是不太可能的。

儘管在十月這項倡議主要落在了黨員身上，但幾乎所有工人，甚至大多數印刷人員，孟什維克的傳統支持者，也都歡迎起義。但是新政

府組成的問題立刻就出現了。所有由布爾什維克為首的工人組織和布爾什維克的黨組織本身都呼籲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各黨派的聯合政府。

這又一次表達了對革命民主派的團結和避免其裡面出現內戰的關切。在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中，列寧和托洛茨基反對納入溫和的社會主義者（但不包括左翼俄羅斯農民黨(SRs)和孟什維克-國際主義者），認為他們會癱瘓政府的行動。但在談判進行時，他們卻站在一邊。

然而，這個聯盟未成。在談到蘇維埃權力問題上，談判很快就破裂了：布爾什維克和絕大多數工人都希望政府對蘇維埃負責，也即那是一個不受有產階級影響的大眾政府。然而溫和的社會主義者認為，要建立一個可行的政府，蘇維埃是過於狹隘的基礎。雖然有點掩蓋，他們繼續堅持，要包括有產階級的代表，或者至少是在蘇維埃沒有代表的“中間階層”。但是，俄羅斯社會是深深分裂的，包括大部分知識份子以內的後者與有產階級是一致的。更重要的是，儘管布爾什維克在蘇維埃代表大會上占多數，但是溫和派拒絕任何擁有布爾什維克多數的政府。實質上，溫和派要求取消十月革命。

一旦事情變得清楚了，工人對廣泛聯盟的支持就消失了。不久之後，與工人達成了相同結論的左翼俄羅斯農民黨(SRs)與布爾什維克組成了聯合政府。到十一月底，一個由左翼俄羅斯農民黨(SRs)主導的全國農民代表大會，決定將其執行委員會同工人和士兵代表的中央執行委員會(TsIK)合併，這一決定讓布爾什維克黨松了口氣並受到歡迎，也受到工人的普遍歡迎：至少從下面實現了團結，雖然沒有左翼的知識份子，但與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大多數取得了一致。（但是，應該指出的是，孟什維克與俄羅斯農民黨(SRs)不同，並沒有採取武力反對蘇維埃政府。）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那麼，作為十月的遺產，這就是“他們敢做”的含義。布爾什維克作為一個真正的工人黨，按照格言“盡人事，聽天命”（“Fais ce que dois, advienne que pourra”）行動，托洛茨基認為這個格言應該在一切偉大門爭中引導革命者。[3]但我試圖表明，這個挑戰並不被輕易接受。布爾什維克不是冒險主義者。他們擔心內戰，試圖避免內戰，如果不可能，至少要限制其嚴重性，並提高勝算。

在1923年寫的一篇文章中，孟什維克領導人費多爾·丹(Fedor Dan)解釋說，即使在科爾尼洛夫起事之後，他的黨拒絕與有產階級決裂。那是因為“中間階層”，在蘇維埃沒有代表的那部分“民主派”（丹提到教師，一個合著者，莫斯科市長...）不會同意與有產階級的分裂---他們相信，沒有他們，國家就不能得以管理。他們甚至不會考慮參加布爾什維克的政府。丹繼續說道：

然後--- 理論上！--- 與聯盟（與有產階級的代表）決裂只有一條路徑：與布爾什維克組成一個政府 --- 一個不與“非蘇維埃”民主派（“中間階層”）聯合，而是反對它的政府。鑒於布爾什維克當時的立場，我們認為這條道路是不可能接受的。我們清楚地瞭解，走上這條道路就是要走上恐怖和內戰的道路，去做一切布爾什維克事實上後來被迫做的事情。我們誰都不覺得有可能為這個非聯合政府的政策負責。[4]

丹的立場可以和另一個溫和的社會主義者，斯坦科維奇(V.B. Stankevich)形成對比，後者是其黨內罕見的人物（曾經是臨時政府的前線政治委員）。他在1918年2月致同黨的一封信中寫道：

我們必須看到，到那個時候，人民運動的力量在新政權的一邊…。

有兩條路向他們[溫和的社會主義者]開放：進行與政府不可調和的鬥爭，或者作為忠誠的反對派，進行和平的創造性的工作…。

前執政黨可以這樣說嗎？說他們現在已經變得如此有經驗，可以擔當治國的任務，這個變得不容易而且更難的任務？實質上，因為他們沒有反布爾什維克的綱領。而沒有一個綱領的鬥爭就是墨西哥將軍的冒險。即使存在創建綱領的可能性，你也必須明白，你沒有力量來執行它。要推翻布林什維主義，即使不是正式的話，事實上，至少也需要從俄羅斯農民黨(SRs)到極右派的各方聯合努力，。但即使在這樣的條件下，布爾什維克也是更強大的…。

只有一條道路：統一的人民陣線，團結的全民工作，共同的創造力…。

那麼明天呢？繼續毫無意義，實質上是冒險主義的奪權企圖？或者與人民共同努力，幫助它處理俄羅斯面臨的問題，為永恆的政治原則，治國的真正民主基礎進行和平鬥爭的有關問題！[5]

我會讓讀者自己決定，丹或還是斯坦科維奇的看法更優。但是可以有一個令人信服的論點，即溫和的社會主義者對“敢做”的拒絕，有助於他們所說的讓他們害怕的結果。

自1917年10月以來的歷史充滿了左翼黨派不敢做的例子，即使他們應該做的時候也不敢。其中包括1918年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German Social Democrats)，1920年的義大利社會主義者(Italian Socialists)，1936年的西班牙左派，1945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年和1968年至1968年的法國和義大利共產黨人，1970-73年的智利民眾團結(Chilean Unidad Popular)，最近的希臘左派聯線(Syriza)。當然，這並不是說他們沒有在某個特定的時刻組織起義，而是說他們從一開始就拒絕採取一個戰略，目標是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取經濟和政治權力，在某種程度上，這一戰略必然要求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革命性的決裂。

今天，人類面臨的另一些挑戰是如此的兩極分化，前所未有，唯一真正的選擇是社會主義或野蠻主義，當文明社會的未來本身受到威脅時，左派應該從十月革命獲取靈感。這意味著，儘管過去幾十年來，工人階級和聯合的社會力量遭受了歷史性的失敗，但為了像拒絕幻想一樣，拒絕恢復凱恩斯主義福利國家的目標，要回到“真正的社會民主”。這樣一個當代資本主義的綱領必然失敗，進一步失效。今天，‘敢做’，就是要制定一個最終目標是社會主義的戰略，接受這個目標，必然會同資產階級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和政治權力實行革命性的決裂。

註腳

[1] 這篇文章大部分基於我的“俄國革命期間的彼得格勒工人”一文，布里爾赫馬基特，萊頓和波士頓，2017年。

[2] K.馬克思，“第二版資本論後記”。第一卷。國際出版社，紐約，1967年，p17。

[3] 托洛茨基，“我的生活”，1930年，紐約，斯克裡布納，p418。

[4] 費多爾·丹(Fedor Dan)“臨時政府最近的歷史”，

第一卷，柏林 (<https://www.litres.ru/static/trials...>)。

[5] IB.奧洛夫(Orlov)，“Dva puti stoyat pered nimi...” 伊斯托利切斯基 文件，4，1997，p.79。

1917年要做什麼？

久林·薩林古採訪奧利弗·比散森諾特



在“反資本主義新黨”(NPA)發言人奧利弗·比散森諾特(Olivier Besancenot)的最新著作《1917年要做什麼？俄國革命的一段有爭議的歷史》(Que faire de 1917? Une contre-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russe)發表之際，我們採訪了他。

關於這個“有爭議的俄羅斯革命的歷史”，你採取批判性的觀點。作為革命者，我們怎能批判一個革命，而這個革命還是統治階級有計劃地尋求埋葬的呢？

我試圖做的，受到丹尼爾·本薩德(Daniel Bensaïd)某些說法的啟發，他寫過“共產主義反對斯大林主義”，這個對我來說非常重要，我要做的，就是要拿起一個遺產，捍衛一個記憶，這個記憶反對的，是主流意識形態之黨徒，這個主流意識形態希望為俄國革命舉行理論上的葬禮，特別是通過“殺人思想”過程實施它，就像共產主義在其內部實行了斯大林主義和極權主義一樣。

所以這是一個捍衛正統而且理直氣壯地捍衛它的問題：把我們同1917年連接的線索，就是把我們與1917年起源聯繫起來的線索，因此也是同那些進行了一場特定類型革命的人們聯繫起來的線索，那些人以不復再有的無與倫比的時空自我管理經驗製造了一場革命。與這個創始事件相聯繫，使我們能夠採取批判的態度，因為斯大林主義的第一個受害者就是革命本身，也是革命者...

因此，我試圖向廣大民眾解釋說，我們把自己置於革命發動者的重要遺產之中，他們反抗白色的反革命，後來又是斯大林主義反革命的受害者。

你不僅要把自己置於1917年革命黨人的連續性中，而且還要把自己置於那些較早“從內部”對官僚蛻化和斯大林主義進行批評者的位置。他們也是革命者，但是他們的批評幾乎沒有得到回應，例如，不像1973年出版索爾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島”那樣有反響。

絕對是這樣。事實上，我同克利斯提安·薩門(Christian Salmon)和厄裡克·哈贊(Éric Hazan)在斯特拉斯堡召開一次的會議上討論過這個問題。‘古拉格群島’是造成審查的一個契機，也包括審查批判馬克思主義派。從那時起，禁止回顧1917年的經驗，我們看到一些被稱為“新哲學家”的人的思想選擇的真實過程，他們假裝不知道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正是來自革命者：我們可以想到的批判者，有維克托·塞

爾(Victor Serge)，帕納伊特·伊斯特拉蒂(anat Istrati)，伯里斯·蘇瓦林(Boris Souvarine)，當然，還有托洛茨基及其1936年寫的“被背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Betrayed)”。

還有一個意識形態的線索要再次被採納，它也是我喜歡這種連續性想法的原因，即：這是一場戰鬥，一場我們再次進行的鬥爭，我們永遠堅持的鬥爭。

其他人，比如你引用的丹尼爾·本塞德(Daniel Bensaïd)，在紀念俄國革命的時候，也回過頭來看它。你是否只是重複這個做法來延續傳統？因為即使你沒有說要寫歷史，實際上，你現在會發現自己在談論過去，你必定知道，引起過去改變的，是我們現在所說的原因。

我認為有兩件事。

我們必須重新開始，重新開始是一個永久性的過程，而且這也是這本書的想法產生的原因：歐特蒙出版社(Autrement)的編輯對我說：“俄國革命一百周年即將到來，如果你在這個場合無話可說，那會很是奇怪的事”。確實，我們下意識地不想太多為紀念活動而努力，但是我們必須繼續進行一場關於真相記憶的戰鬥。

但是，事實上，也有這樣的想法，例如，我們在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中發現了過去和現在的潛在共軛連接：不要以為過去是完全關閉的一章，而是相反，它對我們自己說，即使在過去也有永遠開放的歷史章節，可以供人討論不同的選擇，今天仍然是這樣，可以讓我們看到“別的東西”。

所以我們試圖回顧過去，再次想到恩斯特·布

洛赫(Ernst Bloch)，作為一個未發生的未來，並試圖把它與現在相提並論。這意味著既要清理那些失敗者的記憶，清理被白匪或斯大林主義反革命殺害的革命者的記憶，還要質疑發生的過程，以便在將來防範如1917年革命經歷的蛻化。



你能否給我們一個這樣的現在結合過去的例子？

沒有疑問的是，再次檢查歷史以貼上好壞標記，那是浮誇輕易的做法，但是要理解當時革命者沒有想到的某些議題，因為他們無法想到這些議題，看到未來。

比如，列寧在1917年夏天寫了“國家與革命”一書，這本卓越的著作，在很多方面仍然與今天有很大關係，特別是關於國家機器的結構，除了口號“一切權力蘇維埃”以外，書中沒有一句，說到蘇維埃的權力究竟是什麼，仿佛它是一個神奇的公式... 而這是今天在一些人中仍然存在的東西，無論是最革命左派還是最改良左派，都有這個想法，即一旦事情開始發生變化，所有的事情都會通過下面的力量或上面的力量整理而出。

然而，政治是眾人事物的行政管理，而革命不是政治的死亡：恰恰相反，革命是一種對討論，對抗，分歧的進行管理的新方式...因而，批判性地看待在蘇維埃權力層面上所做的事情，在真正的現代議題的層面上可以是非常有意義的。

你不需要通過簡單地增加政治和民主的權利來抵抗官僚主義的現象，然而那些普通人可能想要。官僚主義的根源在於許多現象：勞動分工，體力工作與腦力工作的分工，權力的專業化，統治與異化的多重過程，這不僅是出現在市場領域內，所有這一切也需要再次思考。



你說斯大林主義的反革命不是來自共產主義的思想本身，也不是來自革命的思想，因為恰恰相反，它是一個對革命的否定和破壞的過程。

但這並不意味著，它不是鼓勵促成它的背境的一部分：在此，我想特別談談20世紀初俄羅斯民主文化的缺乏，而且還要談談革命過程的軍事化。

你認為，現在有什麼現象可以成為21世紀的反革命基礎呢？

實際上，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最大的斷層線可能不是民主問題。時代和背景發生了變化，也沒有對資產階級民主的幻想，顯然，它與20世紀初的沙皇和俄羅斯社會全無關係，這是非常不同的。

另外一個不同點是，我們面臨著一個與資本主義國家機器捆綁在一起的官僚機構，這個機構是非常有組織的，它不是多數，可以由幾十萬人，甚至幾百萬人組成，我們不打算僅僅是在理論層面打擊它：我們必須找到設計和組織新社會模式的方法，考慮到這個對手的存在，因此，研究這些能夠存在於強大和不可避免的社會現實中，而不是一個抽象想法的斷層線。

所以我們不得不提出這些問題，公開討論，而且我承認，令我非常擔心的是與反官僚及反官僚主義化相關的問題。而不是宣稱我們是在反對官僚主義，使政治問題消失，傑克·蘭斯爾（Jacques Rancière）對此的看法絕對正確。

我們還沒有擺脫困擾共產主義計畫的官僚主義幽靈：它並不是天生的，但它纏繞不去，而大多數改革主義派別和最激進的派別，都難以接受我們有要再次討論的戰略觀點，特別是在這個問題上。

這次訪談發表在新反資本主義黨（NPA）週刊《反資本主義（L' Anticapitaliste）》，397期，2017年9月21日

伊拉克庫爾德獨立面臨外部威脅與內部矛盾

約瑟夫·達荷

92%的選票選“是”，贊成獨立，投票率達到72%，這樣的勝利顯示，公投的結果是明確的，證實了投票前幾個星期所看到的大多數庫爾德人的熱情。

在鄰國的庫爾德人中，也出現了歡慶場面，慶祝公民投票的結果。在伊朗西北部一些大多數居民是庫爾德人的城市，包括馬里萬（Marivan）和班呢（Baneh），都向伊朗當局的鎮壓威脅提出挑戰，在街頭跳舞，呼喊口號，慶祝贊成獨立的“是”獲得勝利，歌頌庫爾德民族主義運動。在馬哈巴德市（Mahabad）和薩南達吉（Sanandaj）市，示威者和安全部隊之間發生衝突。在薩南達傑（Sanandaj），人們揮舞著在伊朗被禁的庫爾德斯坦旗幟。值得提醒的是，過去十年來庫爾德人口密集地區受到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嚴重壓制，許多庫爾德活動人士在監獄中遭受摧殘，經常被判處長期徒刑或死刑。

同樣，在敘利亞，在庫爾德工人黨（PKK）的敘利亞分支民主聯盟黨（PYD）控制的領土上，在卡米什利（Qamishli），阿穆達（Amouda）和德里克（Derik）等幾個城市，許多民眾示威紀念贊成獨立的“是”獲得勝利。

針對庫爾德地區政府的威脅和敵對行為

然而，由馬蘇德·巴爾紮尼（Massoud Barzani）領導的庫爾德地區政府（KRG）當局遭受到的地區和國際壓力及威脅已經升級。為了哄騙伊拉克政府和鄰國，平息庫爾德自治區身上的壓力，巴爾紮尼寫信給巴格達當局說，公民投票

並不意味著立即宣佈獨立或對任何人施加這個狀態。他補充說：“我們準備等待兩年，這期間我們可以通過深入和建設性的對話進行溝通，討論所有問題和主題，讓我們成為兩個夥伴，為我們兩國建立一個未來，而不需要在任何地區實行事實上的強迫行動”。這仍不足以讓巴格達當局和鄰國放心。

自從公投中贊成獨立的“是”獲勝以來，伊拉克政府多次對庫爾德自治當局施加威脅和敵對行為。伊拉克總理哈代爾·阿巴迪（Haider al-Abadi）將取消公投結果作為舉行任何談判的先決條件。大阿亞圖拉·阿裡·西斯塔尼（Grand Ayatollah Ali al-Sistani）也宣佈反對伊拉克庫爾德斯坦分裂出去。

伊拉克議會議員投票贊成關閉伊拉克國家管理之外的邊界哨所，並要求作為武裝部隊首腦的總理，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維持伊拉克的統一。他們還重申，要求在“有爭議的地區”，包括多民族的和富油的基爾庫克市（Kirkuk），派出安全部隊。這些有爭議的地區，包括基爾庫克省（北部），還有部分尼尼微省（北部）（Nineveh），迪亞拉（Dyala）和薩拉赫丁（Salaheddin）（巴格達北部）。由於伊斯蘭國（IS）聖戰運動進攻後造成的混亂，這些領土中的大部分在2014年被庫爾德族民兵組織征服。我已經寫了有關背景的文章，[見此](#)。

在基爾庫克市（Kirkuk），緊張局勢繼續上升。據稱，大眾動員力量的什葉派原教旨主義武裝分子哈什德·沙伊比（Hashd al-Sha'bi）將他們自己定位為“平民”，但卻是全副武裝。他們

也出現在尼尼微省（Nineveh）的一些地方。9月29日，巴格達當局對庫爾德自治地區進行了空中封鎖，迫使庫爾德地區政府（KRG）放棄對機場的控制，取消獨立公投的結果，但遭到庫爾德地區政府（KRG）的拒絕。因此，伊拉克庫爾德斯坦與外國之間的航班已經停止。

土耳其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反應激烈

土耳其，敘利亞和伊朗三個庫爾德少數民族的鄰國紛紛譴責公投，並呼籲伊拉克團結反對分裂計畫。

在反對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獨立方面，土耳其和伊朗是最強烈的國家，這些國家政府對埃爾比勒（Erbil）的威脅已經加倍。土耳其議會延長了授權，允許在9月23日公民投票之前在伊拉克和敘利亞部署土耳其軍隊。這對埃爾比勒（Erbil）的庫爾德當局是一個明顯的威脅。安卡拉已經威脅採取軍事和經濟措施，報復公民投票的舉行。

在宣佈全民公決中贊成獨立的“是”取得了巨大勝利之後，土耳其政府又重申了其對庫爾德地區政府（KRG）的威脅，同時宣佈停止在伊拉克北部的民兵組織（Peshmerga）的軍事訓練。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還表示，伊拉克庫爾德人“將為此付出代價”，如果他的國家關閉邊界，卡車和石油運輸，他們很快就會缺乏一切，包括“導致饑餓”的糧食。每天有數十萬桶石油通過伊拉克北部到土耳其的管道銷售，將該地區與世界石油市場連接起來。

德黑蘭承諾同巴格達和安卡拉站在一起，反對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獨立公投的結果。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的首席顧問阿裡·阿克巴爾·維拉亞蒂（Ali Akbar Velayati）宣稱：“穆斯林國家不允許建立第二個以色列”。伊朗的保守新聞界將公民投票描述為“猶太復國主義陰謀”，破壞該地區的穩定。

同樣，黎巴嫩什葉派原教旨主義伊斯蘭運動真主黨通過其領導人哈桑·納斯魯拉（Hassan Nasrallah）說，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的獨立公投，標誌著分裂中東的第一步，將導致內戰，有必要反對它。他形容公民投票是美國和以色列在該地區製造混亂的陰謀。

近日來，巴格達，安卡拉和德黑蘭之間已加強了反對庫爾德地區政府（KRG）的合作。

一個伊拉克軍事代表團訪問了在伊朗一側的庫爾德斯坦邊界，然後10月2日，伊朗在伊拉克庫爾德自治地區的邊界部署了大炮支援的十幾輛坦克。在帕爾維斯汗（Parviz Khan）邊境點的部署，是伊朗和伊拉克武裝部隊針對公投進行的聯合軍事演習的一部分。在公民投票舉行的幾天，土耳其和伊拉克軍隊之間的聯合軍事演習已經在土耳其一側的伊拉克庫爾德斯坦邊界進行。作為與土耳其軍隊聯合演習的一部分，一支小型伊拉克部隊仍然部署在邊界的土耳其一側。

9月29日，伊拉克國防部長說，伊拉克當局還計畫同伊朗和土耳其合作，控制庫爾德斯坦自治區的邊界。伊拉克總理哈代爾·阿巴迪也以類似的方式建議他的政府控制庫爾德石油出口產生的收入。

美國和俄羅斯，或者不惜一切代價維持穩定

美國國務卿蒂爾森表示，美國不承認伊拉克庫爾德斯坦的獨立公投，並要求停止“相互進行

威脅”。西方國家多次重申反對公投，擔心贊成獨立的“是”獲勝，會導致更多的地區不穩定，削弱反對IS的“戰爭”，導致在多民族和有爭議地區，比如富裕的基爾庫克等出現動亂。

在庫爾德地區的能源領域投資超過40億美元的俄羅斯，作為超越美國的最大投資者，更加謹慎，說要考慮“尊重庫爾德人的全民願望”。然而，莫斯科認為，“巴格達同埃爾比勒(Erbil)之間的爭端，必須通過對話加以解決，目的是在伊拉克國內找到共存的方式。”俄羅斯在能源領域的重大投資可能是土耳其尚未實施其關閉基爾庫克-傑伊漢(Kirkuk-Ceyhan)油管威脅的原因之一，因為不能傷害它的俄羅斯盟友。俄羅斯國有石油公司(Rosneft)期待石油管道開始營業，莫斯科期望將來自庫爾德地區政府(KRG)的收入作為其投資回報。如果沒有石油管道，開放邊界或從巴格達到埃爾比勒的付款，庫爾德地區政府(KRG)將崩潰，這是俄羅斯企業的災難。但是，這種情況可能不會持續太久，如果沒有解決辦法，土耳其政府可能會迅速升級對庫爾德地區政府(KRG)的制裁。

以色列的支持，抑或是機會主義

以色列是唯一支援庫爾德自治區獨立的地區國家。以色列國和巴爾紮尼家族(Barzani family)之間存在著悠久的歷史政治關係，這種關係可以追溯到六十年代，當時第一批以色列特種部隊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幫助毛拉·穆斯塔法·巴爾紮尼(Mullah Mustafa Barzani)和他的反政府武裝。

馬蘇德·巴爾紮尼(Massoud Barzani)在2005年接受沙特日報“哈亞特(al-Hayat)”的採訪時曾表示。“建立庫爾德人與以色列之間的聯繫不是犯罪，特別是因為許多阿拉伯國家已經與猶太國家有聯繫”。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而且，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摩薩德特工或前以色列士兵已經在悄悄地訓練庫爾德安全部隊。近年來，庫爾德地區政府(KRG)還通過國際貿易公司，在未獲巴格達當局批准的情況下，向以色列國出售大量石油。在這件事情上，這種石油通過一條輸油管道到地中海的土耳其傑伊漢港口。土耳其與馬蘇德·巴爾紮尼的庫爾德政府結盟，促成了這一長期的業務。安卡拉在土耳其公共銀行哈爾克(Halk)開設了埃爾比勒帳戶，儲存庫爾德石油，等待買家。

以色列並不真正因為庫爾德人受壓迫而支持他們的自決權，但他們認為在巴爾紮尼的反動和親西方的帝國主義領導下，一個獨立的庫爾德國家可以作為一條路，讓其在該地區找到新盟友，反對該地區의各種角色，特別是伊朗。例如，以色列對敘利亞，土耳其和伊朗的庫爾德人信仰保持沉默。總理內塔尼亞胡最近也表示，以色列立場與土耳其，美國和歐盟相同，認為庫爾德工人黨(PKK)是一個恐怖主義集團。1999年初土耳其在肯亞捕獲庫爾德工人黨的逃亡領導人阿卜杜拉·奧賈蘭(Abdullah Ocalan)，在這件事上，以色列也發揮了作用。

另一方面，巴爾紮尼部落和庫爾德資產階級領導層的一些人傾向於把以色列視為一個獨立庫爾德斯坦的楷模，一個被敵人包圍的小國，並與美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榜樣。這種感覺之所以養成，是幾十年來中央政府在有庫爾德人的地方(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敘利亞)對庫爾德人的壓迫所造成的。在這些地區的人民中，即使在廣泛的左翼領域中，缺乏對庫爾德問題的聲援，也沒有幫助。除此之外，巴勒斯坦各個領導組織普遍與阿拉伯獨裁政權站在一起對抗庫爾德人民。以色列國旗在埃爾比勒和整個歐洲的一些庫爾德人集會上升起，就象徵著這種情況。

庫爾德地區政府（KRG）的內部問題

自2003年以來，庫爾德斯坦自治區經歷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那樣，很明顯，領導人馬蘇德·巴爾紮尼(Massoud Barzani)策劃了公民投票，得以繼續掌權，並將工作和大眾階層視線從該區域的社會經濟問題轉移開。對於執政的巴爾紮尼部落的資產階級和專制領導人一定不能抱任何幻想。

同樣，旨在對庫爾德斯坦自治區內少數族裔和宗教少數民族施加新形式壓迫的一切措施，都必須遭受譴責。根據人權組織“人權觀察”(HRW) 2009年11月發表的報告，自2003年以來，庫爾德民兵組織“自由鬥士”(peshmerga)依靠“恐嚇，威脅，逮捕和任意拘留”來鞏固少數族裔社區的支持，控制有爭議的領土。有些人已經談到了一個“庫爾德化(kurdification)”的過程，試圖創造少數民族對庫爾德地區政府（KRG）的某種形式的效忠。例如，在一些地區，開放學校，讓學生學習庫爾德語，招募公務員到庫爾德地區政府（KRG）新設的行政部門。

例如，在尼尼微省，由巴爾紮尼家族控制的庫爾德民主黨（KDP）非民主地取代了尼尼微平原兩個重要的基督教城鎮的市長，艾勒高什(Alqosh)的非茲·阿貝德·加瓦熱(Faiez Abed Jahwareh)和紹凱帕(Tel Keppe)的巴辛·貝羅(Basim Bello)，他們都反對在當地舉行公民投票。庫爾德民主黨（KDP）的附屬成員取代了他們。在這些地方出現了許多民眾示威活動，譴責這些措施。

尼尼微和辛賈爾地區的官方機構及省府已經逐漸由庫爾德民主黨（KDP）的成員主宰，使用各種庇護主義模式政策和威脅做法，攻擊對庫爾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德民主黨（KDP）政策進行批評的成員。

更糟糕的是，“人權觀察(Human Rights Watch)”最近透露，在對伊斯蘭國的戰爭中，庫爾德民兵組織“自由鬥士”(peshmerga)的戰士也在基爾庫克和尼尼微各省有爭議的地區用推土機推倒遜尼派的阿拉伯村莊。

沒有什麼能為這種行動辯解，當然，有必要承認和譴責伊拉克歷屆政權，特別是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侯賽因過去在這些有爭議的領土推行的“阿拉伯化”運動。當時，這種改變人口結構的政策導致數十萬人，特別是庫爾德人，被驅逐離開家園，以便安插遜尼派阿拉伯人。這就是為什麼庫爾德地區政府（KRG）當局和伊拉克庫爾德社會的大部分人聲稱，他們在這些土地上具有歷史合法性的原因。

但在這些有爭議的地區，也存在著其他種族和宗教人群，包括土庫曼人，亞述人和加爾丁基督教徒，亞茲迪人，卡基人和沙巴人。

在公民投票期間和之後，巴爾紮尼部落的威權主義並沒有停止反對庫爾德的其他政治集團。在走向公投的整個期間，庫爾德民主黨（KDP）禁止對公民投票的組織方式以及選舉日期提出質疑和批評，把其作為其政治對手叛國的標誌。戈爾蘭運動(Gorran Movement)，庫爾德斯坦伊斯蘭團體(Komal，稱為科瑪律)和庫爾德斯坦愛國聯盟(PUK)各分支，最初在改變立場之前，與庫爾德活動分子一起，通過這個公投組織活動譴責巴爾紮尼部落的目標，包括故意使庫爾德人的注意力離開社會經濟問題，離開庫爾德民主黨（KDP）的權力壟斷和議會的關閉。這些政黨和活動分子在爭取伊拉克庫爾德人民的自決權方面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卻想為舉行這次公民投票和籌備獨立進程創造最好的條件，例如，再次開放議會，改善公民的社會經濟生

活條件，並就這一獨立過程達成政治共識。在選舉前夕，科瑪律(Komal)最後表示支持“是”，贊成獨立，而戈蘭運動(Gorran movement)沒有任何正式立場，但其領導人奧馬爾·賽義德·阿裡宣佈他投了贊成票“是”。

結論

贊成獨立的票“是”在庫爾德斯坦自治區的廣泛勝利，源於庫爾德人民建立國家的長期歷史意願，也是過去各種伊拉克民族主義獨裁政權在伊拉克壓迫庫爾德人民的暴力歷史的後果。特別要記得的是，1988年復興黨(Baathist)政權用化學武器對哈拉布賈(Halabja)庫爾德人的屠殺。在這場大屠殺中大約有5000名庫爾德人死亡。這次襲擊是巴格達當局在此期間發動的安法爾(Anfal)行動的一部分，這個行動屠殺了18.2萬人，摧毀了90%以上的庫爾德人的村莊。

伊拉克公民投票再次表明，該地區的資本主義，沙文主義和集權民族國家的模式失敗了，這些模式一直壓制，抹殺/剝奪了它們社會的多元模式，在這個地區讓一個民族的地位至高無上/統治另外的民族，使一個宗教派別高於其他宗教派別，或者兩者兼而有之。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必須支援函式庫爾德人民在伊拉克和其他地方的自決權，並譴責阻止庫爾德人民自決權的國際和地區壓力。

這種支持，還必須明確反對巴爾紮尼部族，在民主和社會權利的層面上，這個部族不會給庫爾德人民階級帶來好處。同樣，有必要譴責庫爾德地區政府(KRG)強加一個新民族統治的企圖，應該讓爭議地區的人民有自由選擇的權利，讓他們決定他們想要屬於哪個國家，想如何組織和選擇他們的政治代表。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巴爾紮尼部族的意願是說服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在地區政治舞臺上利用伊拉克庫爾德斯坦，更不用說以色列和巴爾紮尼家族的聯繫了，所以必須同他們鬥爭。但是，這些因素不能用來合理化拒絕庫爾德人民自決權利的做法，就像在該地區的沙文主義左派所做的那樣。正如革命的俄羅斯人弗拉基米爾·列寧所說的：

“在一定的情況下，反對一個帝國主義強權的民族解放鬥爭，可能被具有同等帝國主義利益的另一‘大國’利用，這個事實，在誘使社會民主主義放棄承認民族自決權利方面，同資產階級利用共和國口號做政治欺騙和金融搶劫的一些案例相比，例如在拉丁美洲國家誘使他們放棄共和主義，份量並不更重。”

這兩個主要不同目標（支援函式庫爾德人的自決權和反對巴爾紮尼部落）之間的這種聯繫，是在庫爾德自治區把民主和社會權利相結合的必要條件。我們應該支持庫爾德斯坦自治區最革命和最民主的部門，建立一個進步的替代方案。

2017年3月10日



羅興亞人、緬甸政權和地緣政治風險 皮厄爾·羅瑟特

緬甸政府正在對羅興亞人實行種族清洗政策，把他們趕到國外。對這個穆斯林少數民族的迫害達到空前的暴力水準。緬甸政權的性質，土地掠奪政策和地緣政治風險是造成這場人道主義危機突發的主要原因。

羅興亞人是世界上主要的無國籍人口之一。情況並非總是如此。緬甸當局逐漸剝奪了他們以前被承認的權利，對他們的經濟活動，婚姻和受教育機會的限制越來越嚴格，並且暴力地壓制他們以至於達到這波恐怖浪潮的地步，仿佛是有計劃的種族清洗政策：羅興亞人必須死亡或離開永不返回。

羅興亞人的意思是“羅興的居民”，過去的名字，稱這個主要是穆斯林的人群是阿拉幹（Arakan）人 --- 所以叫“阿拉幹（Arakan）的居民”。目前的緬甸當局否認他們有權如此自稱，因為他們認為他們是外國人。

緬甸由十四個邦和行政區組成。阿拉幹的正式名稱是若開邦。它位於該國的中西部，與孟加拉灣接壤，與孟加拉有著短暫的邊界。若開邦也有佛教居民居住，本身就被邊緣化和受到歧視：這確實是該國最貧窮的邦。過去兩族之間似乎沒有任何特別的暴力衝突。

羅興亞的歷史是鮮為人知的，已經成為政治爭議的話題。然而，羅興亞人在阿拉幹的存在，可追溯到久遠的過去。另一方面，19世紀末20世紀初，英國統治時期，出現了一波移民潮，為此，緬甸民族主義者指責羅興亞人。

在緬甸，公民身份的問題很複雜：它不會自動給予所有人相同的權利。克曼人（Kam，穆斯林）得到承認，但他們的行動自由仍然受到嚴格控制。羅興亞人過去有身份證，有權在某些選舉中投票。



製造無國籍人

在2012年，緬甸政府公佈了135個官方認可的族群名單。它不包括羅興亞人，因而羅興亞人沒有任何國籍。在佛教民族主義者的壓力下，這個政權對羅興亞人施加了越來越多的歧視性措施：他們不能再投票或競選。他們必須註冊為孟加拉人（孟加拉不承認他們）。這些禁令在經濟層面上是成倍增長的（他們不能開店，不能與佛教徒作交易），在社會上的限制有：獲得護理，教育的機會，婚姻（受到行政控制），他們可能有的孩子，旅行等等。若開邦的社區分離變得很嚴格。

反穆斯林運動日益激進。2012年，在強姦謠言之後，佛教民族主義者焚燒房屋，造成280多羅興亞人死亡，數千人逃離，許多人是乘船逃

跑的。他們經常被鄰國拒絕避難。一個無名小組造成的小型武裝事件，被軍隊和員警用來有計劃地佔領穆斯林領土。

最後的攻勢？

面對這樣的情況，行動者組成了反對原教旨主義的阿拉幹羅興亞救世軍（ARSA），展現自己是自衛和解放的運動。在緬甸，許多少數民族武裝起來，幾十年來一直能夠抵抗政府軍。羅興亞的情況並非如此，現在依然如故。事實上，阿拉幹羅興亞救世軍（ARSA）只有非常初級的武器。2017年8月，它襲擊了員警或軍隊的陣地。戰鬥造成100多人死亡，其中包括十多名員警，其他所有受害者都是襲擊者。

對於緬甸當局來說，在“軍事”方面，阿拉幹羅興亞救世軍（ARSA）是一個很小的問題，緬甸當局瞭解其他人，並且知道如何談判，但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不想談判。整個羅興亞社區已經被罪惡化（“孟加拉恐怖分子”）。恐怖確實有，但是來自政府。

我們目睹了大規模的種族清洗行動，有計劃地屠殺平民，逐個燒毀村莊，追捕逃跑者，等等。已有40多萬羅興亞人越過邊界（冒著生命危險）到孟加拉避難，而且還在馬來西亞，泰國甚至印尼避難，他們發現自己完全一無所有和筋疲力盡，還有許多孤兒。

在這些事件之前，在若開邦，羅興亞人口估計為110萬。逃難時期過去就已經存在了。自七十年代後期以來，已有一百萬人逃離迫害。東道國的條件往往令人遺憾。他們過去沒有國籍，現在他們仍然沒有國籍。國際機構正在啟動重要的援助計畫；不幸的是，依經驗看，它們有局限性，或者從長遠來看，當難民集體自己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負責未來的條件得不到滿足時，會產生不利影響。

隔離

緬甸戰鬥的少數民族過去得到了外國政府（包括中國）的支援。對於羅興亞人來說，什麼都沒有，甚至也沒有來自孟加拉的支持，而孟加拉的邊防人員還經常騷擾和驅趕躲避屠殺的難民。在緬甸本身，沒有什麼重要的力量保護他們 --- 沒有其他少數民族保護他們，昂山素姬也沒有保護他們，而昂山素姬還是軍政府的長期反對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現任的政府首腦。她採取緬甸民族主義而不是人權的話語。

2017年9月19日，昂山素姬首次承認這個問題（不承認其嚴重性），並宣佈將在核實國籍後組織難民返回。（此舉已被撤回！）我們將看看會發生什麼。但是到目前為止，她和她的發言人是堅定站在軍方一邊的，甚至譴責聯合國援助機構是“恐怖分子的幫兇”。她要求美國停止使用羅興亞這個詞。她斷言說，關於若開邦局勢的所有噪音只是一個虛假資訊的宣傳運動。

人們可能會擔心，昂山素姬的態度，會揭示她的視野是多麼傳統的“緬甸式”，揭露她對羅興亞人缺乏同情心。但也反映了緬甸權力關係的現實，儘管全國民主聯盟（NLD）贏得了2015年的立法選舉，軍隊仍然擁有決定性權力，“憲法”授予他們三個關鍵部委：內政部，國防部和邊界部，並保證他們在議會有25%的席位（即任何憲法修正案的否決權）。軍方在涉及國家安全的一切事務上有控制權，因此在穆斯林領土問題上有決定作用。它得到了員警和極右翼佛教強硬分子的支持。和尚烏拉圖

（Wirathu）的帶領下，一個極具影響力的極右翼佛教運動形成，烏拉圖是個種族主義者和排外主義者，他認為，佛教允許（或甚至傳播）屠殺羅興亞人。

尊者烏拉圖（Ashin Wirathu）於2003年因為煽動種族仇恨而被判處25年有期徒刑，但他在2010年被赦免。他組成的969運動是針對穆斯林（約占全國人口的4%！）的。說後者威脅緬甸“以佛教為基礎”的“身份”和“種族”，說後者的目標是通過同緬甸青年結婚而把緬甸伊斯蘭化。

烏拉圖的佈道助長了2012年的部族間暴力。在969運動被取締後，他創立了保護種族和宗教的協會‘緬甸愛國協會（Ma Ba Tha）’；然後是慈善佛法基金會（Philanthropic Buddha Dhamma Foundation）。後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行組成的，這讓他能夠規避對其階層的連續禁令。烏拉圖使用社交網路來傾訴他的仇恨言論。

這種極端佛教右翼的影響甚至在統治者的決定中也能感受到。例如，2015年政府通過了“種族與宗教法”，其中包括限制穆斯林夫婦可能有的孩子人數（不限於羅興亞人），“保護”與穆斯林男子結婚的佛教婦女，特別是禁止她們轉換宗教到他們配偶的教派上。

最終導致危機

一個時代的徵兆，民盟（NLD）的勝利，並沒有引發真正的民主化進程，我們生活在一個政權越來越專制而不是相反的時期。軍隊設法維持了它的統治。羅興亞危機最終導致了其霸權的加固，這並非偶然的。這也加劇了緬甸的民族主義，而且對於統治者的客戶或跨國公司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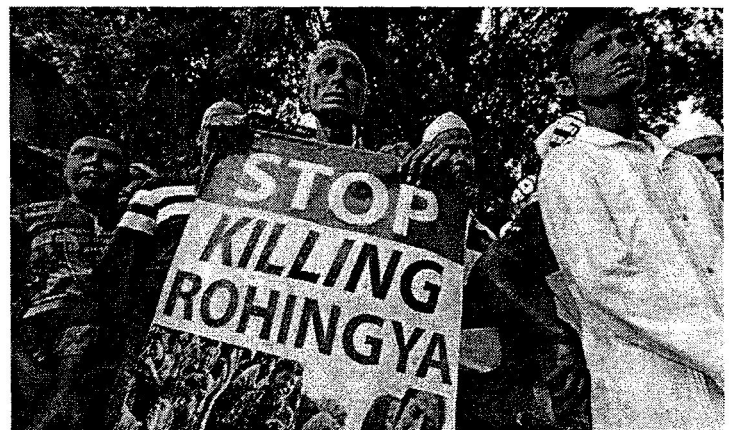
來說，他們可以攫取那些被屠殺或驅逐出境歸家無望的穆斯林的土地。

羅興亞人所遭受的種族清洗，是緬甸大眾階層遭受生存資料剝奪的一般過程的極端表現。有很多人被迫流離失所。政府開了綠燈，允許攫取土地為大投資者謀利。長期以來，該國一直處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的邊緣。現在正在向外資開放。它已經成為一個“新的前沿”。

緬甸是激烈的地緣政治競爭的焦點。例如，印度資助並建造了實兌（若開邦首府）港口，將（印度）米左拉姆邦連接到孟加拉灣。中國政府在少數民族地區進行了大量投資，並正繼續在實兌和中國昆明之間建設一條管道。對於美國來說，他們認為有必要平衡北京在這個關鍵國家越來越大的影響力。

政治演習，經濟利益和地緣政治，與緬甸當局現在解決“羅興亞問題”使用的暴力有很大關係。緬甸民族和宗教關係的複雜性顯然是一個需要考慮的因素，但他們的惱怒是由於那些原因沒有任何“靈性”的東西。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除了口頭抗議之外，歐盟和美國是如此接近緬甸政權。停止恐怖主義和種族清洗政策，並不被他們視為優先事項。



菲律賓左派和杜特爾特政權

皮埃日·羅瑟特

羅德里戈·杜特爾特總統的當選，揭示並擴大了菲律賓政治制度的危機，開闢了一個遠未結束的不確定時期。在2016年5月9日選舉的前後，左派的各種勢力必須對一名邊緣候選人表態，長期以來，這個候選人的勝利似乎是難以想像的，但他卻受到廣泛的民眾支持，直至徹底改變選舉競戰。事實上，左派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於今天。

新總統有一個標記著分裂的說法（粗暴地），他引發政治矛盾。對於一些派別（特別是菲律賓共產黨，CPP，毛澤東-斯大林派），杜特爾特可能會“落在左翼”。對於別人來說，他已經在滑向右翼，他在其“反毒品戰爭”中訴諸法外處決，揮舞著戒嚴的幽靈。然而，他們都試圖通過利用當選候選人的競選承諾，利用國內局勢的混亂，利用一些真實時機，例如給武裝衝突持續五十年的國家以和平談判之類的承諾，來推動其事業。

2016年5月9日當選後，杜特爾特於6月30日正式上任。然而，他是所有總統候選人中被最不看好的。他的競選運動開始時，似是一個笑話，結果是大勝，累積記錄和“第一”有：總統選舉中超高的投票率（81%）；在這樣的投票中獲得的票數最多（1500萬）；是第一個來自菲律賓群島南部最大島棉蘭老島的勝選人；一個地方人物迅速的掌握政權，而他不屬於決定國家政治的傳統“大家族”中的任何一個；支持率超過90%（而且100天后，還有百分之六十的支持率）。他也是國內當選的最老總統（他71歲）。

踢除當權者：政權的危機

自從1986年推翻馬科斯獨裁政權以來，弱勢候選人或精英圈外人幾次贏得總統選舉。不過，這一次，一場大規模的抗議浪潮，一場“選舉起義”推動著杜特爾特，使得主流政黨不得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不放棄為了阻擋一個危險且不可預知者而操縱結果的想法。“踢除那些當權者！”在許多國家，我們看到了這種拒絕的力量。這種拒絕以少見的一致力量鼓動了菲律賓人。

杜特爾特的勝利揭示了即將卸任的行政當局以及總統貝尼格諾·“諾伊諾伊”·阿基諾三世的破產程度，他們已經成為權利侍從主義（clientelism）和家族王朝統治的體現，是制度化腐敗的原因，精英們對人民的命運漠不關心[1]，普遍能力不足，缺乏政治勇氣[2]。1983年獨裁統治下的貝尼格諾·阿基諾（Benigno Simeon "Ninoy" Aquino）謀殺案，（重）開啟了阿基諾時代，三年後，他的遺孀柯拉松（“Cory”）當選。隨著其兒子的垮臺 --- 幾經變遷 --- 這個時代正在結束。

菲律賓資產階級內部的權力鬥爭發生在呂宋島（群島北部）的大家族和中米沙鄢（Negros，宿霧島...）的一部分家族之間。政治是一種金融投資，所獲得的職位是通向成功的路。在選舉過程中，結盟的環境在區域性政權之間形成和破裂，然後在眾議院和參議院中，形成總統大選的多數。當選代表的黨派政治變遷是常見的，因為加入一個黨派，並不是依據黨綱進行的。

這個政治制度已經不復存在了

按面積和人口計，棉蘭老島是菲律賓群島的第二大島嶼。然而，它被摒除在國家政治之外，只是在選舉時才有所用：各黨都來到那裡買他們在全國選舉中缺少的票。雖然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本人來自宿霧的維薩亞斯的地方王朝[3]，但作為達沃市長（棉蘭老島東部）的他，在這個意義上確實是一個圈外人。在他的整個競選運動中，他沒有錯過一個譴責“帝國馬尼拉”的機會，並且經常罵行政當局“混蛋”。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能顯

現出對既得利益集團的內心拒絕。

那是一個民粹主義者的諷刺畫，杜特爾特因為他言論的“特朗普式”粗魯，贏得了全球的聲譽，吹噓他在其任市長的城中不留情地槍決罪犯，或者對於一名澳大利亞修女被逃犯（他清算了那些罪犯）強姦和殺害的案件，他後悔不是第一個“去強姦者”[4]。他粗暴的男子漢姿態加強了他作為一個行動者的形象。

杜特爾特主義當權

羅德里戈·杜特爾特面臨著同眾議院和參議院對抗的風險，這個參議院主要由反對派控制；但是菲律賓的精英們向來如此，昨天的敵人通過組建一個總統“大聯盟”，大規模地向勝利者靠攏。從那時起，他制定政策時遭遇的制度性障礙很少。我們在這裡簡要介紹一些特別重要的方面，以瞭解左派採取的立場。[5]

人民共產黨（PCP）選擇的部長，和平談判

羅德里戈·杜特爾特依賴於一個密切合作的小團隊，他個人對這個團隊有信心，其成員包括內閣秘書利昂西奧·艾瓦斯科（Leoncio "Jun" Evasco）。

杜特爾特派任政府職務給統治階級的右翼和直接的代表人物；但他也請菲律賓共產黨/全國民主陣線（CPP-NDF）選擇四名潛在部長：喬爾·馬葛蘭斯（Joel Maglunsod）多被任命為勞工和就業部副部長（DOLE）。裘蒂·塔桂瓦羅（Judy Taguiwalo）是社會福利與發展部（DSWD）的秘書，拉菲爾·馬利阿諾（Rafael Mariano）土地改革部的秘書。至於麗莎·馬薩（Liza Maza），她選擇做國家反貧困委員會的負責人。

杜特爾特在競選活動中宣佈，他將與菲律賓共產黨（CPP）及其新人民軍遊擊隊開展和平談判。在雙邊停火未確定之前，他主動進行了

單方面的停火，直到雙邊的停火在8月27日生效為止。他釋放了22名被監禁的幹部，以便他們能夠參加8月底在奧斯陸（挪威）開始的談判[6]。

菲律賓共產黨（CPP）參與政府，顯然在菲律賓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局面。其對杜特爾特執政的判斷。遭到左派的大力反對[7]。

棉蘭老島的和平談判

菲律賓南部一直是眾多武裝衝突的地方；那裡居住著穆斯林人口。

阿基諾政權與目前被認為是穆斯林主要武裝組織的摩洛伊斯蘭解放陣線（ MILF）達成和平協定；但國會卻沒有批准。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希望將摩洛民族解放陣線（MLLF）與棉蘭老島原住民（Lumad，山地社區）和基督徒（群島的“多數人口”）融合在一起，恢復這一進程。

建立更廣泛的談判和代表性進程，是菲律賓南部當前這個時期的主要挑戰之一。

從“反毒品戰爭”到戒嚴的威脅

杜特爾特可以裝傻唬人，打出強烈的手勢，但他並沒有這樣做。他真的“清理”了達沃市，允許警方採取法外的行動，立刻地清理罪犯，毒販，街頭小孩.....被稱為“行刑隊的市長”，他被其他省份模仿。他現在把這個總政策應用於全國。他大聲地重申，他為清理癮君子 and 毒販的人承擔全責。因為吸毒販毒者不再是人類，為什麼要保護他們的人權？

殺人數正在增加。我們估計的數字，有3500人被立刻槍殺 --- 三分之一由員警槍殺，三分之一被“民兵”（准軍事人員）槍殺，另外三分之一被鄰居幫派等人槍殺。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對此殺人瘋狂負有政治和道德責任，因為他多次准予法外處決。

官員、法官和人士遭到總統的譴責，總統威脅要處決他們，但現在只有窮人才是行刑隊的受害者。超過六十萬名嫌疑人因害怕遭清除而向警方投案，以至於政府不知道該把他們放置於何處。

在阿布沙耶夫綁架團進攻達沃市後，杜特爾特在全國實行緊急狀態法。他發出了施行戒嚴的威脅。在這個惡劣氣氛中，民眾組織（農民，城鎮窮人，工會）的幹部也被“志願保安者”類似的運作殺害。[8] 特別是在宿霧，這事發生在一名工人黨（PM）黨員[9]身上，還發生在呂宋島的一名基羅山幹部身上[10]。

在馬科斯獨裁統治下，許多活動家被綁架，折磨和處決。從那以後，特別是土地所有者，還有老闆們已經讓太多的麻煩“分子”被殺。不過，在菲律賓，這是第一次由國家最高權力機構公開聲稱承認這些極端的侵犯人權行為---至少在反毒品戰上。杜特爾特還威脅要殺死“破壞”國家經濟發展的工人。



資源萃取主義和工作合同的不穩定性質

總體而言，杜特爾特的社會經濟計畫是（超）自由主義的；但特別在兩個問題上，它為民眾運動打開了一個行動視窗：煤礦開採和臨時工作合同政策（合同化）。發生了許多反對煤炭業的地方鬥爭；左派工會的主要運動之一，特別針對的就是臨時勞動力的使用。

對外政策

近幾周來，羅德里戈·杜特爾特針對關於他不尊重人權的國際批評，一直在公開地威脅要更加向中國人和俄羅斯人開放國家。他用他通常的粗暴男子氣概回應。

所以他稱美國大使是一個“男同性雞”，一個“娼妓的兒子”---後來，他還就用這個說法稱奧巴馬本人。他說，美國的特種部隊應該從棉蘭老島撤出。他回應歐洲議會“操...你”，還用相應的動作輔助他的說話語氣。他告訴擔心政治氣氛惡化的西方投資者，“滾開這裡！”他會邀請中俄的資本取而代之。

他越來越多地向北京展現友好姿態。他現在拒絕用海牙常設仲裁法院的判決，該判決承認菲律賓對中國佔領的斯卡伯勒礁（即中國的黃岩島）的主權。他邀請中國大力投資他的國家，從來不置一詞反對它...

目前，還只是口頭說話。並沒有採取具體步驟修改與美國的軍事協定，該協定允許美國第七艦隊使用菲港口，讓其特種部隊建立監聽中心。在經濟方面，杜特爾特公佈的憲法審查，其實是提出擱置外國投資自由的限制---對民族主義來說太糟糕了。

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只是在玩一場撲克遊戲，用心理戰術，拿中國做稻草人，威脅其監護者美國以獲得最大的讓步，還是真的打算把世界這個地區的戰略定向置於問題中？還有，首先，他是否真的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或是不用指南針而在日益動盪的亞洲水域中航行？考慮到區域和國家問題的重要性，本不應該有這種問題。

杜特爾特向何處去？

如果還有疑問的話，那是因為菲律賓新總統是一個急性的人，也可以說是“務實”的人。他承諾在三到六個月內徹底改變事情，從而讓

自己在選舉中獲得了勝利。

他一經確認勝選，就啟動了“反毒戰爭”。

不過，杜特爾特已經宣佈，他需要把這場戰爭延長六個月。它有可能陷入僵局，成為一場非常致命的“無了結的戰爭”。

同菲律賓共產黨的和平談判正在進行，並已在棉蘭老島宣佈了 --- 但沒有人會期待一個既有利又快捷的解決辦法。

但是，杜特爾特承受不起不作為的後果，那將給他目前的一些“朋友”一個轉而反對他的機會。他沒有自己的權力基礎；為了生存，他進行長期的戰爭運動。

大量湧入的中國資本，將讓杜特爾特在新戰線採取主動：投資，主要公共工程，就業... 這個想法是誘人的，但是有風險。巴拉克·奧巴馬已經清楚地表示了憤慨，取消了與菲律賓總統的會晤。菲律賓的精英與前殖民強權美國有著密切的歷史聯繫，軍隊也是如此。對於美國，日本西南部，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取代菲律賓。杜特爾特正在打一場緊張局勢，但卻是在一個已經遭受高度地緣政治壓力的地區。

這是一個高風險的遊戲。

左派立場

菲律賓左派的總貌正在轉變，新的發展正在進行中。讓我們嘗試瞭解發生了什麼，不過並非詳盡無遺。

公民行動黨(Akbayan)

這個黨是於1998年由基督教左派（Christian left），菲律賓共產黨（CPP）和全國民主陣線（NDF），“舊”共產黨（PKP），馬克思主義者和獨立的社會主義者重組成的...。儘管它與

社會運動有聯繫，但是，2009年公民行動黨（Akbayan）決定停止在下議院代表反對派力量，從那一刻起，加入總統聯盟，選舉平臺很快成了其律法。2010年與阿基諾三世結盟，加入政府。儘管有醜聞擴散，但它從來沒有潰散。[11]

在2016年，公民行動黨首次設法讓裡薩·洪體威洛斯-巴拉奎爾（Risa Hontiveros-Baraquel）當選參議員（但在下議院只有一名議員）。這可能是一個難得的勝利。現在，這個政黨在政治上被認定是即將卸任之行政當局的災難。其領導層是圍繞比斯格（Bisig）組建的，成了選舉機器；它不再代表整個組成其基礎的各派別。然而，與公民行動黨有關聯的工會和社會運動的派別，仍然是一個有待密切觀察的問題。



菲律賓共產黨

當菲律賓共產黨意識到羅德里戈·杜特爾特可以贏得選舉時，它支持他，儘管一開始它為格拉斯·坡（Grace Poe）助選。多年來，該黨的遊擊隊已經達成了一個協議，不干涉達沃省的“死亡小隊”市長。

居住在烏德勒支（荷蘭）的何塞·馬利亞·西松（Jose Maria Sison）是該黨的重組者，特別歡迎這位曾經是其學生的男人，認為他可能是菲律賓的第一位左翼總統[12]。在5月9日的選舉後，黨內發生了意見分歧的情況，西松對杜特爾特發起的對話作出了積極的回應，其他人則譴責新任總統的精英性質。似乎已經有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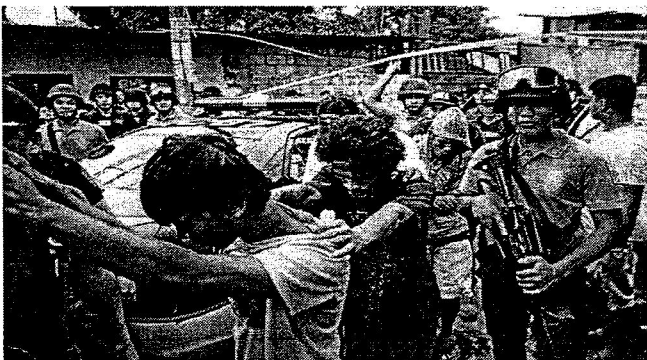
（暫時的？）協議，同意參與政府並開始新一輪的談判。

菲律賓共產黨支持“反毒品戰爭”政策，甚至為此作出貢獻。[13] 在最近的一個聲明中，西松提到了對侵犯人權的批評，但自己沒有表達對其的支持。在下一段，他譴責奧巴馬對這一問題的利用。從這個起點，他對所有以這種理由攻擊杜特爾特的人都持懷疑態度。[14]

本尼托（Benito）和威爾瑪·田宗（Wilma Tiamzon）夫婦體現了菲律賓共產黨“內部”的領導層。他們在2014年被捕，現在已經獲釋參加奧斯陸談判，在一次採訪（“整個線路很明確”）時表示支持總統當局，只是希望杜特爾特會採取實際措施，落實其獨立於美國的政策[15]。

不清楚的是，在社會領域，杜特爾特將會給接近菲律賓政府的共產黨籍部長或者菲律賓共產黨黨員任職的部長多少權力。不過，這可能是奧斯陸談判中要作決定的問題。新總統必須說服軍隊，他知道他開始時在做什麼。他需要結果。他也許認為，至少在某些地區，遊擊隊在衰落，在戰鬥五十多年之後，正在尋出路。他必須比照類似哥倫比亞發生的有關事情（與哥倫比亞革命武裝力量的協議）。當然，目前在奧斯陸，菲律賓共產黨的代表團的立場還是老樣子，也即意味著沒有任何結果的政治談判政策。

從左派觀點來看，談判的動力肯定是羅德里戈·杜特爾特（Rodrigo Duterte）勝利帶來的主要具體問題之一。



反對派方面：人權與民主

所有的左派都意識到，隨著該政權目前的危機，機遇視窗在各個領域開放。[16] 他們都試圖借此機會為工人（反對不穩定的合同...），當地人（反對採礦公司），農民（土地改革的復興...），窮人（社會保護...），棉蘭老島原住民（他們世代領域的權利...）爭取真正的利益，等等。這需要堅定性，靈活性和政治獨立性的結合運用。

然而，在人權和民主問題上，非共產黨左派（政治上的非政府組織，民間組織）中出現了分裂。對於一些以社會目標為名義著，我們不能在人權（反毒品戰爭）和民主（戒嚴幽靈）問題上譴責政府。相反，對於其他方面，這些問題太嚴重了，不能保持沉默。很快，特別是在瓦爾登·貝洛 [17]的倡議下，一系列組織宣佈自己反對新政府，只要情況依然存在，就要作動員以爭取具體的勝利。

許多力量也聚在一起，譴責杜特爾特決定將前獨裁者斐迪南·馬科斯的遺體埋葬在國家英雄公墓內。[18]

捍衛菲律賓人之尊嚴及人權運動(I-Defend)

此後，民主抗議運動繼續發展。8月12日，名為iDEFEND（捍衛菲律賓人之尊嚴及人權運動）的聯盟在人權問題上進行了一場正面的戰鬥。當情況惡化時，它的地位越來越廣泛，越來越堅固。它在最近的一個聲明中特別說明：

“今天，民主受到威脅，9月4日，總統將整個國家無限期地置於緊急狀態之下(...)。最近，我們目睹了最為生動的民主失敗表演，就是在馬拉坎南宮的指導下，驅逐作為司法委員會負責人的參議員利馬。這是行政機關全面控制國會的最新舉動。(...)全國都目睹了，當法院肯定調查馬拉坎南宮與毒品聯繫的法官的權力時，

他如何憤怒地威脅要宣佈戒嚴令。四十四年前的今天，馬科斯宣佈戒嚴，如今，我們的生命自由和民主權利面臨著的威脅，即便不是更大，卻也類似。” [19]

停止戰爭聯盟

“停止戰爭”聯盟涉及的範圍遠遠大於其名稱。它發表了對杜特爾特政權的第一批關鍵分析之一。[20] 它譴責從馬科斯獨裁統治繼承的債務（杜特爾特沒有對債務提出質疑），並抗擊氣候變化（杜特爾特不想聽到）。它不希望美國統治被新世界強權中國所取代。

群眾力量黨（PLM）

群眾力量黨（PLM）在9月7日發表的聲明中，“呼籲要阻止在城市貧民社區大規模屠殺有嫌疑的吸毒者和毒販，打擊毒品活動，只能針對最大的毒梟及其保護者，通過加強警力來做到。” [21]

工黨（PM）

工黨（PM）領導9月21日表示：“戒嚴四十四年以來，為所有人爭取人權與民主的鬥爭仍然至關重要。（...），公民自由和民主自由處在明顯的現存危險之下（...）以反毒品戰爭的名義，進行的法外殺戮，現在已經蔓延到了對人權捍衛者的屠殺。” [22]

革命工人黨-棉蘭老島（RPM-M）

6月12日，革命工人黨-棉蘭老島（RPM-M）表示：“我們宣佈，對作為一個組織的菲律賓共產黨-新人民軍（CPP-NPA）及其成員單方面停火，因為這種發展意味著國家民主力量的勝利，對菲律賓更具活力並更新的革命運動是個推動”。[23]毛澤東-斯大林主義共產黨實際上攻擊了其他革命組織的幹部，如革命工人黨-棉

蘭老島（RPM-M）的幹部，希望目前的情況可能有助於結束被認為是自相殘殺的衝突。

在阿布薩耶夫發動達沃襲擊事件後，革命工人黨-棉蘭老島（RPM-M）和人民革命軍（RPA）在9月4日發表的一篇文章中表示：“我們反對恐怖主義和非法毒品的態度是一樣的，但我們對宣告全國緊急狀態的官方聲明有保留。正如在該國經驗到的，軍方和員警人員的大規模部署和動員，導致了公民自由大幅減少。這也可以在反恐怖主義運動的名義下，被杜特爾特政府內的軍國主義集團和外國帝國主義的利益集團所利用，把新政府執政勢力內部的民族主義動機扼殺于萌芽中（...）”

“反對毒品，犯罪行為和恐怖主義活動，不應該是對人民和社區公民自由的威脅，而是鼓勵給人民群眾全面積極的自身努力，提供更多的空間。” [24]

第三道路

菲律賓左派的辯論有時候會取得最後的二者擇一的轉向。或者你在杜特爾特後面，或者你發現自己在“黃色”陣營（黃色是阿奎諾的顏色）裡。

菲律賓左翼作為一個整體，今天是削弱的，儘管在東南亞它仍然是最活躍者之一。20世紀80年代以來，還不能以持久的方式重新獲得政治主動性，而且經常地成了統治階級內部衝突的人質。

目前的統治危機可能有利於左派的重新組合，為一個徹底統一的新動力提供了契機。這不會發生在與杜特爾特當政（當然，也不是在前政府的廢墟）保持一致上。情況複雜，必須抓住機遇，但在人們的眼中，新任總統政權正在使權力的濫用和死刑小隊的使用合法化。這是致命的毒藥

2016年9月25日

注解

[1] 特別是在超級颱風海燕破壞性橫掃之後。

[2] 見瓦爾登·貝洛 (Walden Bello), “菲律賓 - 瓦爾登·貝洛作為公民行動黨提名代表的辭職演說：阿奎諾可以‘把我劃出他的盟友名單’”：<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3] 見阿勒克司·德·瓊 (Alex de Jong), “羅德里戈·杜特爾特，菲律賓新強人”：<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4] “我很生氣，她被輪奸了，但她很漂亮。我認為市長[杜特爾特自己]應該是第一個享用者。” <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5] 其他問題，如聯邦制，這篇文章沒有涉及。
[6] 但司法指控並沒有解除。

[7] 見C.J. Chanco, ESSF (第38128款), “菲律賓 - 杜特爾特，菲律賓精英，菲律賓共產黨和失蹤人員：獨立勞工運動”：<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Herbert Docena, ESSF (第38357款), “關於菲律賓新總統：為什麼杜特爾特不是 - 而且不太可能成為社會主義者”：<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8] 見ESS, ““團結一心”(Nagkaisa) 勞工聯盟譴責對菲律賓勞工領袖和組織者的清算”：<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和ESSF, “菲律賓：今年9月份第七次勞工殺害事件，暴力文化的結果”：<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9] 見ESSF, “菲律賓：工人黨宿霧 (PM-Cebu) 的社區領導，奧蘭多·阿巴甘，遭遇暴民式殺害”：<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0] ESSF “菲律賓：環保主義者和反燃煤活動家，格蘿麗阿·卡皮坦 (Ate Gloria Capitan) 被殺害”：<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1] 從瓦爾登·貝洛的角度來看，公民行動黨 (Akbayan) 的歷史，參見ESSF “菲律賓左派：公民行動黨 (Akbayan) 和進步的良知 - 權力走廊和我們的倫理道德”：<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2] ESSF, “菲律賓共產黨歡迎羅德里戈·杜特爾特誓言成為菲律賓歷史上第一位左翼總統。”：[\[>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3] ESSF, “菲律賓：對杜特爾特總統的禁毒合作呼籲的回應”：<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14] ESSF, “菲律賓共產黨/全國民主陣線 (CPP-NDF) 關於在菲律賓圍繞杜特爾特總統發生的衝突傾向的看法”：<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5] ESSF, “菲律賓共產黨/全國民主陣線 (CPP-NDF) 論菲律賓總統當局 - 獨立聲言，紅色領導人田宗夫婦 (Tiamzons) 談杜特爾特對美國的強硬談話”：<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6] 例如，參見Carmel V. Abao, ESSF, “菲律賓：參與杜特爾特政府，參與我們自己的活動”：<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7] ESSF, “菲律賓 - 左派和杜特爾特：尋求反對派的當局”：<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8] ESSF, “菲律賓：戒嚴受害者稱獨裁者斐迪南·馬科斯在國家英雄公墓安葬是‘最高的不公義’”：<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19] ESSF “聲明 (菲律賓)：結束殺戮。維護人權 捍衛民主”：<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20] 特別參見Ric Reyes的消息通報, ESSF, “菲律賓總統選舉：破譯杜特爾特的勝利”：<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21] ESSF, “菲律賓：關於‘無法無天狀態’的聲明 - 停止殺人！停止轟炸！要和平，不要戰爭策略！”：<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22] ESSF, “菲律賓：Partido Manggagawa加入iDefend聯盟運動；在戒嚴紀念日，為被殺的領袖，法外處決受害者，尋求司法公正”：<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23] ESSF, “菲律賓左派：對何塞·馬西森對話呼籲的回應”：<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spi...>

[24] ESSF, “菲律賓：關於杜特爾特政府對達沃的轟炸和對非法毒品集團的戰爭”：<http://www.europe-solidaire.org.php...>

處於祖馬總統徹底經濟轉型中心的土地

梅西雅·安德魯



農工和農村居民普遍被排斥在激進土地分配的“受益者”之外。

“獲得土地是農村人民的重中之重。因此，我們會檢討現行土地再分配計劃的適當性。我們這樣做是為了加快土地改革和再分配，並促進南非人的土地所有權。” 塔博·姆貝基（Thabo Mbeki），第13屆非盟峰會，2009年

過去二十年裡，激進的土地改革已經被用作玩偶戲，經常跳躍起來，佔據政府政治話語的中心舞臺。二十年來出現的格局顯示出的噪音，比政治意願的實際轉變更多。

爭取和支持農村窮人，無地者和農場工人的運動，農工組織和活動分子，一直在為激進的土地和農業改革爭論。這些力量一再要求停止扭曲的土地佔有模式，因為可耕地集中在3.7萬商業農場主手中。

許多人認為，非洲人國民大會（ANC）沒有看到實施有意義的土地改革的經濟，政治和生態意義，而這種改革會把土地交給成千上萬的小

農戶（男人和女人）。這種激進的土地改革必須伴隨著充分的基礎設施，財政，培訓，推廣和技術支援，從根本上改變農村，為成千上萬人提供生計。除了競選期間，或者執政黨必須對來自下方和左翼的壓力作出反應的時候之外，這些要求大部分都被置若罔聞。

我們現在正處於這樣一個時期。因此作為激進經濟轉型的一部分，祖馬式的激進土地再分配談判正在加速。我們必須記得過去二十年裡非洲人國民大會（ANC）關於土地改革的發言，其中大部分發言往往離得並不太久。

噪音多於行動

過去二十年來，非洲人國民大會（ANC）已經定期回歸激進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速度緩慢，土地持有模式沒有轉變的程度，已經貫穿了幾次“國情”諮文講話和政府會議。

2001年的全國土地保有權大會是第一次處理激進土地改革的會議之一。這是有關土地改革的系列會議中的第一個，我們得到通知，說執政黨要審查“土地政策的基本原則”。在2001年的會議上，政府強調的目標，是到2014年將30%的白人農用地轉移給歷史上的被剝奪者。但到目前為止，只有9%的耕地已經轉移。

僅四年後的2005年，托科·迪迪紮（Thoko Didiza）和副總統菲姆齊萊·姆蘭博-努卡（Phumzile Mlambo-Ngcuka）在約翰尼斯堡主辦了一次全國土地峰會。這次峰會意義重大，彙集了許多有關的利益相關者，也有白人商業農業和商業農

民工會，工會和民間社會組織的參與。在國家土地問題高峰會議上，迪迪紮公開表示，非洲人國民大會（ANC）的自願買賣（WBWS）形式的市場主導政策是加速土地改革的障礙。姆蘭博副總統在開幕致辭中，向1,500名代表面前宣佈，“今天我們埋葬了自願買賣（WBWS）”。

2006年不久之後，姆貝基總統在國情咨文中表示，國家將作為土地改革的“主要推動者”發揮關鍵的作用。在2007年非國大第52屆全國大會上，非洲人國民大會（ANC）發揮更激進作用的呼籲得到了呼應。執政黨再次呼籲加速小規模農民戰略。第五十二次會議再次強調，要加快和增加土地改革的步伐。“自願買賣（WBWS）”被第二次埋葬。從那以後，還有幾個政府會議提到了土地再分配和把土地置於經濟轉型的中心。在2005年的土地問題峰會之後，政府用了差不多10年時間，才使政策稍有移動。

國家發展計劃可能是非洲人國民大會（ANC）在這方面的政策建議中最具體的。最近，在2014年，在祖馬政府的領導下，還組織了又一次土地會議，會議上，以前峰會的所有噪音都被重新包裝。

一個城市精英者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NC），對農業的興趣有限，這是缺乏轉型的核心問題。

真正的建議是遠非激進的

但是，明確的是，在這些政策轉變過程中，土地持有模式基本保持不變。農工和農村居民普遍被排除在土地改革的“受益者”之外。在重新分配農場的地方一直沒有財政和技術支持。

所有這些聲明和激進經濟轉型呼籲的實際情況是，有意義的和深遠的土地再分配根本不在非

洲人國民大會（ANC）的議程上。非洲人國民大會（ANC）土地政策的實質是插入和鞏固一小撮黑人商業農民，讓他們作為現存白人商業農業和農業企業部門的一部分。

祖馬總統於2009年開始擔任總統，他說：“在競選期間，我們明確表示，農村發展和土地改革將是我們關鍵的五個優先事項之一。”再次，在2015年的國情咨文中，祖馬概述了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和推動經濟的九點計劃，該計劃是這種方法的暗示。農業和農業加工是就業創造戰略的核心。其中一些建議提到：

- 通過在44個地區推出農業園而改造農業部門
- 加快實施“加強土地勞動者的有關權利”（50/50）
- 實施“一戶一公頃”計劃
- 通過“商業化支持計劃”為90個黑人商業農民提供支援，該計劃的目標是到2022年將支持450個黑人小農戶。

考慮到農村發展和土地改革部的預算不僅不足，而且土地改革在政府總預算中獲得的資金最少，那麼，這些建議一直未能兌現，是不足為奇的。





超出預算

除了宣佈和實施之間的差距之外，非國大（ANC，非洲人國民大會簡稱‘非國大’）政府對土地和土地轉型的看法也很狹隘。此外，在土地和土地改革問題上，特別是在征地問題上，也存在著深刻的分歧。對於非國大（ANC），土地和土地問題被嵌入私人財產和資本主義生產關係中；因此執政黨不能採取斷然行動。

土地再分配需要一個政治意志和一個政治領導層，後者將採取措施，扭轉以市場為導向的新自由主義土地改革方式，因為，本質上，新自由主義土地改革方式仍然拒絕處理歷史的剝奪和不公正。其中一些措施意味著沒有補償的土地徵用。祖馬在早些時候做出民粹主義承諾之後，最近的立場則從這個承諾倒退了。他在傳統領導人的大會講話中說：“土地問題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解決。”

城市精英者的非洲人國民大會（ANC），對農業的興趣有限，這是未能轉型的核心問題。在轉變經濟和使農村貧困人口獲得生計方面，激

進的土地再分配可以發揮作用，但他們看不到這些。也缺乏恢復土地，人與自然關係的眼光。非國大（ANC）沒有挑戰白人土地持有模式的意願 --- 他們不相信貧窮的農村人口和他們的糧食生產能力，不相信他們確保全國家庭糧食安全的能力。所有政策都著眼於保持現狀，同時確保有一小部分黑人商業農民的存在。

當然，如果沒有重大的進展，可能到了某個時刻，這些農村窮人厭倦了等待，會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最近在蘇爾克拉克（Suurbraak）和其他地區發生的一連串佔領事件就是明證。

然而，非國大在面臨失去政權的前景下，有可能利用土地改革重新獲得民心支持，保持對農村的控制。我們在津巴布韋和南部非洲的其他地方看到了這一點。這將意味著農村地區出現相當大的政治動盪，可能會打開潘朵拉的盒子，使他們失去對因為推動土地改革而釋放的力量

的控制。針對非國大政策的曲折和政策失誤，所需要的，是無地人民和農村窮人的全國性運動，圍繞著這個激進土地改革的綜合平臺提出要求和動員人民。大型農地應該再分細分小，把土地分配給家庭和生產者。市政當局必須在支持激進土地再分配方面發揮主導作用。我們需要服務和支援，比如重組土地銀行等，以滿足小農生產者和農戶的需求和利益。它必須成為一種使他們，特別是婦女，能夠獲得贈款和軟貸款的設施。面對出口導向的農業，我們的重點和優先事項，是為當地市場提供當地生產的糧食和當地家庭的糧食安全。

2017年7月

關於加泰羅尼亞危機的四個論題

米格爾·曼贊



論題1：加泰羅尼亞危機是由西班牙自由主義君主制的國家機器引起的，其意圖是控制新自由主義經濟危機的政治後果。

目前發生在加泰羅尼亞的事情不是一個因果關係，它遠遠超出了安圭塔(Angueta)預測的兩個資產階級分支，西班牙和加泰羅尼亞這兩輛火車之間的相撞事故。與加泰羅尼亞人民——不僅與其資產階級——的對抗，是國家實際權力直接尋求的。這不是一個計算錯誤；儘管加泰羅尼亞社會民眾動員的程度是不可預測的，但是民眾政府的表現似乎是經過精細策劃的。與西班牙王國決裂，這種挑釁含有極端的困難，是加泰羅尼亞人為了獲得有尊嚴的未來必須要克服的，因為我不是在說一個假想的西班牙共和國的破裂，後者也許能夠和平地解決問題。

確認加泰羅尼亞這一版本政治事件的事實是已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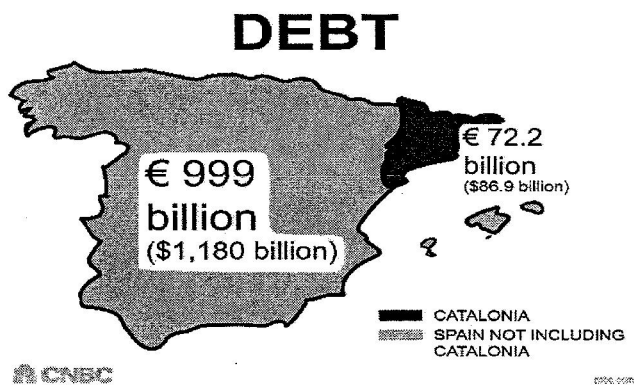
a) 開始：在考慮了保守黨提出的一系列上訴之後，2010年，西班牙政府廢除了2006年加泰羅尼亞自治條例的改革。眾所周知，該條例：1)

經加泰羅尼亞議會批准，2) 由西班牙議會批准，3) 加泰羅尼亞公民投票通過，4) 在自由主義君主政治秩序內完全可以接受。

b) 過程：加泰羅尼亞公民的反應非常壯觀，出現了巨大的動員，在2010年7月有個高達150萬人的示威遊行，其口號是“我們是一個國家，這是我們的決定”。自那時以來，這一運動並沒有停止，在9月11日的“加泰羅尼亞國慶日”和其他政治事件，如人民團結組織(CUP, Popular Unity Candidacy)宣導的象徵性全民投票中，都在不斷發展。面對這個問題，西班牙政府只有一個答案：採取鎮壓措施，譴責加泰羅尼亞自治共和國的政治領導人，施加各種處罰，如超高罰款，取消政治職位資格，任意拘留和連帶監禁威脅的嚴重刑事審判，等等。

c) 高潮：在加泰羅尼亞公民輿論越來越多地批評西班牙政府的強行做法時，拒絕對話，把公民投票非法化，這個西班牙政府由最反動的一派領導，日益加緊鎮壓，拒絕任何和平解決問題的方式，因為和解意味著1978年西班牙憲法的改革。為了加強其在其他西班牙人中的合法性，人民黨(PP)政府加劇了加泰羅尼亞問題，導致目前自由主義君主制合法性在加泰羅尼亞公民中間的危機。

有了這些先例，最具決定性的問題是：為什麼保守派政府這樣做，甚至不顧威脅自由主義國家政治穩定的危險呢？最明顯的答案是，國家的政治穩定已經因經濟危機而處於危險之中，同加泰羅尼亞的對抗是維持君主權力結構的戰略。



論題2：西班牙的金融寡頭計劃與歐洲社會的專制主義傾向一致，旨在削減自由，加強國家的壓制力量。

人民黨（PP）不是以自己的名義行動，而是服務於國際金融寡頭的利益，服務於自由主義君主制度所代表的西班牙國家利益，必須從這一原則出發，理解寡頭統治集團的戰略計劃，以便對抗他們：保守政府的表現不是臨時拼湊和任意的，而是自覺設計的政治計劃。

首先有一個明顯的直覺：社會危機必須非常深刻，才能使人們決定採取這樣的行動。事實上，150萬人的示威，顯示自由主義制度的機構廣泛地遭到非法化，特別是在年輕人中間，西班牙國家的統治制度有沉沒風險——尤其是因為類似的進程在整個地中海地區，北部非洲，中東和南歐擴展。150萬人的運動，把西班牙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中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帶入了政治舞臺：它缺乏前途，事實是，已建立的一個失衡而金融化的經濟，連同政治機構和支撐它的意識形態，迅速地陷入苦難。

在經濟危機爆發之後，這種清醒的覺悟就變得明顯了。我們必須指出問題的根源：

a) 進入歐洲後，由西班牙工人社會黨（PSOE，Partido Socialista Obrero Español）政府推動的，以國家非工業化為基礎的經濟模式，是西班牙經濟結構性巨大失業的原因——粗暴的合同不能被認為是解決這一問題的真正辦法；

b) 政治模式產生同企業家相關的政治階層的結構性腐敗，特別是在城市建設部門，它導致了這個部門的生產過剩危機。

自由主義的兩黨制被譴責為不能解決國家問題的政治制度，公民們認識到，腐敗是克服經濟危機的不可逾越的障礙。

第二個顯而易見的觀察是：在社會秩序破裂的時候，獨裁和鎮壓是資本主義統治階級——金融寡頭——的典型反應，過去的五年裡，在所有北約組織的帝國主義國家，這些反應都再次付諸實踐。這個寡頭政治的西班牙框架在政治上是由君主制代表的，君主制的特色是，通過受意識形態機器，尤其是天主教會——今日是社交媒體保護的國家強制機構，有效地管理使用壓迫手段。

在帝國主義專制統治的背景下，我們可以把加泰羅尼亞問題的製造，理解為具有深刻戰略意義的戰術把戲，其目的是使大多數西班牙公民能接受代表少數極右派的政府法西斯暴力。政府部門，如軍隊和司法機構，以及天主教等重要的私人機構，都受到法西斯主義少數派的控制，而且人民黨（PP）本身就是一個准軍事組織或具有法西斯特性的統治派別。侮辱加泰羅尼亞自治機構的明顯目的，是一個挑釁，目的是使政治鎮壓擴大並合理化，這個做法已經被廣泛用於遏制整個西班牙的民眾運動。

一旦巴斯克（Basque）問題暫時得到解決，西班牙政府就沒有足夠的手段來合理化其反民主

及限制自由的政策。通過廣泛限制政治自由的立法，鎮壓公民運動，對此，用公民運動回應，還不夠。它還必須被理解為自由主義君主制的防禦性政策，因為在目前的情況下，該制度面臨的危險，是它成為西班牙國家永遠的過去。對腐敗的譴責使得保守右派受到了束縛——請參閱愛琳·蒙特羅（Irene Montero）在反對拉霍伊（Rajoy）政府的譴責動議中的發言。

反對加泰羅尼亞的政變——表面未宣佈，但實際存在的緊急狀態——是在為金融寡頭服務的自由主義政治權力工具尚未完全惡化時發動攻勢的嘗試。

對加泰羅尼亞公民投票的鎮壓，旨在給一個完全不受信任的保守政府臉上貼金，把其弄成一個受加泰羅尼亞分裂主義威脅的西班牙統一的保證。它試圖認可它對加泰羅尼亞自治機構的無能，淡化它對國家敵人進攻時的犯罪形象。請記住，譴責分裂主義是第二共和國時期極端右翼的鼓動口號之一，也是法西斯軍隊發動引起內戰的政變的原因之一。這個“西班牙統一”意味著國際金融寡頭統治西班牙的國家機器，並通過它統治他們的具不同傳統的民族。這種由制度代理實行的統治，已經充分表現出巨大的腐敗，在我們共同事務的政治方向上則是低效率的。



論題3：加泰羅尼亞政治鬥爭中取得的力量與解決這場危機的相關性，將決定西班牙國家整套政治結構的民主品質。

加泰羅尼亞危機還不是一場革命危機，可能的原因是，它的地區特性和動員西班牙其他地方人民的困難性，即使考慮到後者的弱點，也是如此。但是它可以轉化為興起於第二次過渡時期之政府的內部永久性政治衝突，取代暫時平息的巴斯克衝突。

必須明確指出自由派政治家要解決的主要矛盾：在晚期資本主義的普遍化危機時期，把金融寡頭的欺騙性統治合法化。而在這個矛盾中，他們需要操弄民族情感，挑動一些群眾反對另一些群眾。但無產階級特有的國際主義不能忘記，以免輸掉為人類未來的鬥爭，同民族情感一樣深厚的社會現實不只是統治的面具。在全國問題上，工人階級的政治霸權問題得以解決，這個工人階級的政治霸權包括與小資產階級和農村農民等其他社會階級結成必要的聯盟，建立歷史性的共和集團。

中期政治機構的未來配置——也許另一個40年——將取決於當前社會危機中的政治對抗的結果（我們稱之為與70年代政治進程平行的第二過渡）和在加泰羅尼亞的政治鬥爭中可以實現的力量關係。在這種情況下，背叛加泰羅尼亞公民的民主鬥爭就等於背叛了西班牙國家的民主鬥爭。

必須明確的是，民主鬥爭不是反對或贊成一個抽象狀態或一個虛幻的地位，而是針對特定的政府機構，這是決定社會發展大方向的东西。歷史發展的規律是決定性的，不可避免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可以給出一個明確的方向，以便替代資本主義的，專制的和腐敗的統治，這個統治因其社會生態的破壞性而變成了怪物。要

改變這個方向，社會運動的鬥爭能做的非常有限，到今天為止，由於北約領導的帝國主義集團向法西斯主義傾斜，這一方面似乎還不夠。對抗這種傾斜，是當前歷史上最具決定性的政治路線。

自由主義君主制代表了國際金融寡頭對西班牙人的統治，但是這種統治的建立，在某種程度上，決定於社會凝聚力和人民的自我組織能力。自決原則是將政治權力擴散到公民和民間機構的工具，必須在每個歷史時刻以最廣泛的方式行使它。只有專制的政權才能害怕人民的自由決心；從這個角度來看，“民主的不可治理性”是限制公民權利的新自由主義口號。

論題4：聲援加泰羅尼亞，定義了當前歷史背景下的政治鬥爭。

政治動態導致人民共和國陣營中最激進的分裂主義選擇，這個事實，被改革派左翼陣營譴責為資產階級操縱的結果。獨立鬥爭中工人階級的缺乏，是改革派反對加泰羅尼亞運動的一個論據，而不想承認歐洲工人階級的消極性以及政治領袖對新自由主義的讓步是法西斯主義在帝國主義國家崛起的直接原因。但是，工人階級開始動員起來，反對加泰羅尼亞保守派政府所施加的壓制。面對正在發展的，扭轉屈從於倡狂法西斯運動的趨勢的政治事件，這個時候，階級本能可以覺醒。

否則，恐怕西班牙的工人階級會滑向像歐洲正在發展的那種政治進程裡。新自由主義左派的政治改良主義，已經無力為陷入苦難的工人階級重要階層提供另一種鬥爭方式，而其維護者似乎把更多的資本主義剝削視為一種必要之惡，甚至是一種奇怪的社會現象。歐洲的工人階級更喜歡投身於法西斯主義的武裝，而不是忍受

那些政客的虛偽，在沒有任何改革需要的時代，這些政客顯出一副資本主義政權改革派拐杖的模樣。

在這個時候，事情不應鎖定在獨立選項（是/是，在口號方面）還是專制型的西班牙（不/不）之間的爭論，因為還有第三種可能性，通過公民投票接受反對獨立（是/否）。第三種可能性是議會左派維護的，傳統上由聯合左派（IU，United Left）及其聯邦共和國的提議為代表，現在至少由‘我們能團結’（Podemos）聯盟的一個部門代表。然而，加泰羅尼亞的對抗動態使得這第三中間道路顯得模糊。顯然，政府力量做了這樣的操縱，但是聯合左派（IU）本身也顯示出它無力指導在危機中產生的社會鬥爭。雖然通過‘我們能團結’（Podemos）聯盟的重組，能夠解決過去左派最嚴重的組織問題，但也必須承認它的錯誤，認真對待自己的政治綱領，其高潮在於共和國的宣言。而且可以預見，在薩拉戈薩（Zaragoza）9月22日事件之後，他們將更清楚地瞭解形勢的嚴重性。聯邦共和國的捍衛者必須與加泰羅尼亞人民一道，建立反對政府鎮壓的共同事業。

對加泰羅尼亞進程的聲援必須是無條件的，儘管每個人都必須捍衛自己的政治立場，充分意識到它們的影響並尋求最大程度的連貫性。要應用的選擇，將取決於發生在整個危機期間的力量的相互關係，但無論如何，共和國的力量別無選擇，只能接受西班牙寡頭集團發起的挑戰，知道這場鬥爭是在惡化的條件下進行的，為民主而戰，並面對西班牙政府對半島和島嶼民族的壓制。

墨西哥教師的長期鬥爭

丹·拉·伯茨



在墨西哥爆發的教師抗議活動，是長達一個世紀的爭取公平教育和真正民主之鬥爭的一部分。

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有140萬會員，持不同政見的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中還有20萬以上的活動者。四個月來，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一直在進行罷工和直接行動，有時會癱瘓恰帕斯州，瓦哈卡州和米卻肯州。

三十七年來，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一直在領導一個群眾運動，以爭取更高的教師工資和保護公眾教育。最近，在反對政府教育改革法的鬥爭中，為國家提出了新的教育模式。

在該國的社會政治史上，墨西哥的教師是如何佔有中心位置的？他們在政府的酬傭勞動政治制度中，以及在挑戰政府的工人階級社會運動中，是如何成為這樣一個有組織力量的？異見教師運動是什麼，想要什麼？

墨西哥革命時代

在現代墨西哥，教師角色的根源在於革命時期，那時的小學教育工作者在爭取農業改革的農民運動中擔任政治顧問角色。

從1520年代的西班牙征服到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天主教會為墨西哥人民提供了一些小規模的正規教育。最好的天主教學校是為富人和少數中產階級專門預備的，而為工人和農民開辦的學校很少，教育品質也差。

在墨西哥總統波菲裡奧·迪亞斯(1876-1911)的獨裁統治時期，政府建立了第一個公共教育系統，但它是非常有限的，涉及的該國年輕人很少。將大眾公共教育帶到這個國家的，是墨西哥革命。

墨西哥革命有幾個隱含的目標和最終的成就：把土地分配給農民，承認工會，石油工業國有化，建立一個自由、世俗的公共教育制度。1910年至1920年的暴力時期結束之際，阿爾瓦羅·奧佈雷貢總統(Álvaro Obregón)在1921年創建了公共教育秘書處(SEP)，並任命了“宇宙人”(Cosmic Race)的作者，哲學家兼作家何塞·瓦斯康塞洛斯(José Vasconcelos)為主管。

曾與革命左翼---埃米利亞諾·薩帕塔(Emiliano Zapata)和法蘭西斯科·“潘喬”·威拉(Francisco “Pancho” Villa)大會---結盟的瓦斯康塞洛斯(Vasconcelos)被總統阿道弗·德拉·韋爾

塔（Adolfo de la Huerta）任命為墨西哥國立大學校長。瓦斯康塞洛斯（Vasconcelos）創造了著名的大學座右銘：“Por mi raza hablará el espíritu”（“靈魂將通過我的競賽說話”）。為了使這個想法成為現實，他推廣大眾教育，這種教育是民族主義的，也具有拉丁美洲的特點。

作為大學校長，瓦斯康塞洛斯（Vasconcelos）與教師志願者開展了全國掃盲運動，作為公共教育秘書處（SEP）的負責人，他繼續推動其理念，即教育是讓墨西哥人民獲得解放的工具。

瓦斯康塞斯（Vasconcelos）將其教師比作為傳教士，革命福音的傳播者。教師有一個神聖的使命：提升窮人，被壓迫者和未受教育者的地位。

土地改革時期

教師接受這項任務，有時候會有生命危險。

在1910年至1920年的革命動盪期間，然後在1920年代至1940年代的土地改革運動期間，當時農民起而要求莊園主歸還他們祖傳的土地，是當地的教師們經常幫助文盲農民，制定他們的要求。我們可以說，教師成為1910年代和1920年代農民運動的工會管家。

幾乎肯定的是，教師是村裡唯一偶爾讀報紙的人，很可能是唯一讀過書的人，他們以徹底的土地改革運動語言表達村民的要求，在類似米超康（Michoacán）和韋拉克

魯斯（Veracruz）這樣的地區，其訴求還經常具有社會主義性質。事實上，20世紀20年代初，這些州的激進農民運動的一些領導人加入了新成立的共產黨。

當地的鄉村小學 --- 那個年代，少有人學歷超過六年級 --- 不僅成為土地改革運動的堡壘，更普遍的是墨西哥革命的堡壘。

在革命之前，天主教會舉辦了大部分的學校教育，但幾乎沒有為農村窮人服務的學校。1917年憲法 [<https://www.loc.gov/exhibits/mexica...>] 結束了教會在教育中的作用，要求國家為所有人提供免費，平等的教育。

公立學校教師往往是自由思想家，多是強硬的無神論者，他們指責天主教教會及其牧師愚弄人民，用迷信塞滿人們頭腦，並向要求施行洗禮，結婚和赦罪禮的人收取高昂的費用。相反地，農村教師雖然受制于自己的有限教育，卻努力傳授現代，理性和科學的世界觀。

20世紀20年代，教師的角色是農民的支持者，教會的對手和繼續深入革命的運動員者，這使得他們成了地主的目標，後者派出其白衛兵（guardias blancas）中的槍手暗殺當地的教師，這在那個時代是一個很常見的事情。農村教師仍然挺身上前，繼續用文字表達農民對土地的需求。

社會主義教育

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導致一些農業部門的崩潰，以及許多莊園的失敗，削弱了地主階級。在1934年拉薩羅·卡德納斯

(Lázaro Cárdenas) 擔任總統時，他支持爭取莊園土地的農村改革運動，支持農村學校及其教師。

在他的支持下，一個較為強大的農民聯盟和工業工會運動發展壯大，成為總統的強力支持者。卡德納斯不但以集體所有的形式把數百萬英畝的土地分配給土著農民，而且還在某些情況下向農民組織提供武器，讓他們捍衛土地不受白衛兵侵佔。

與此同時，卡德納斯不但加強了公共教育，還使公共教育激進化了。卡多納斯認為自己是社會主義者，認為他的計畫是利用政府來控制經濟發展和現代工業，在農業社會中創造社會主義。

作為該計畫的一部分，以他為首的執政黨修改了1934年憲法，規定“國家教育將具有社會主義性質”。在此期間為公共教育秘書處 (SEP) 提供了一些工作人員的墨西哥共產黨 (PCM) 同意總統的社會主義教育目標。

政府實行的新社會主義教育專案 --- 被許多人非常正確地解釋為無神論教育 --- 立即導致與教會和其他保守勢力以及鄉村虔誠農民的衝突。

在某些地區，當地人燒毀學校，割下教師的耳朵；在其它地方，他們暗殺了教師。該國許多地區在這個問題上分裂很深，一些地區幾乎處於叛亂狀態。

左派和右派的許多人回顧起來，認為卡多納斯實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決定是政治判斷的大錯誤，儘管一些歷史學家認

為，圍繞社會主義教育的鬥爭，有助於形成多元文化民族主義的意識。

墨西哥教師聯盟 (SNTE) 的成立

在卡德納斯總統任職期間 (1934 - 1940 年) 期間，他獲得了工會支援，並鼓勵工會組織的動員和罷工。同時，他迫使工會中心化，組建全國聯盟，分為三個不同的聯盟，一個是工人 (CTM) 的，一個是公職人員 (OATSE) 的，一個是農民 (CNC) 的。(雖然一些大城市和一些州的教師組織起來，形成各種教師聯合會，但在那些年裡，教師沒有成功組建單一的全國教師工會)

卡德納斯把新的勞工聯盟帶入了國家黨，把它從革命民族黨 (PNR) 改名為墨西哥革命黨 (PRM)，口號是“為了社會主義”。

卡德納斯設想通過國家黨從上面指導和創造農業社會主義。所以諷刺的是，墨西哥最左翼的總統也是一個公司系統的創建者，也就是說，國家黨控制工會和工人。

然後卡德納斯選擇曼努埃爾·阿維拉·卡馬喬 (Manuel Ávila Camacho) (1940-46) 擔任總統的繼任者，後者是一個保守得多的領導人。

是阿維拉·卡馬喬 (Ávila Camacho)，在1943年創建了墨西哥教師聯盟 (SNTE)，他把教育工作者聯盟 (SUNTE)，墨西哥教師和教育工作者聯盟 (SMMTE)，全國教育工作者自治聯合會 (SNATE) 和墨西哥教育工作者聯盟 (STEMRM) 和其他小型組織合為一體。

1943年至1949年間，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成為宗教右翼，國家黨和左派之間鬥爭的場所。執政黨成功打破了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裡保守員工的權力。

然後在1949年，在美國國務院的壓力下，冷戰來到墨西哥，這是國家黨領導人歡迎的發展，在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開啟了第二條戰線。

冷戰導致執政黨，也即現在的體制革命黨（PRI），把共產黨人趕出教育部。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也將他們排除在外。

在20世紀50年代，墨西哥的教育制度受到兩個強大的國家官僚機構的控制：公共教育秘書處（SEP）和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其領導人合作控制教師，其中許多是1920年代和30年代的社會運動鬥爭的退伍軍人。

在墨西哥制度下，勞工官僚往往是由國家黨強加給工會的，有時是蠻橫強加的。公共教育秘書處（SEP）同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合作，為一大批工會工作人員和非教學工作提供資金。國家公共教育秘書處（SEP）和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官員與體制革命黨（PRI）州長和當地官員以及鄉村老闆印第安人酋長合作。

要求工會官員確保工人不為更高的工資而罷工，並投票給執政的體制革命黨（PRI），作為回報，官員們會成為國會議員，參議員和州長以及體制革命黨（PRI）本身的領導人。

教師們在基層發揮了重要作用，通過恐懼和好處，讓體制革命黨（PRI）贏得全國

的選舉，把持所有政權，從市政廳，省政府，到議會總統府。總統控制了最高法院的法官。

第一次異見者運動

1940 - 1970年間，這是“墨西哥奇跡”的時代，墨西哥經濟的高速增長率為3%至4%，通貨膨脹率為3%。

奇跡源於民族主義的經濟模式，進口的替代，控制大部分經濟的國有產業部署，以及維持工人的低工資。在這期間，工會受到國家的控制，它的工作是讓工人（包括教師）不要求更高的工資。

正是由此導致了墨西哥第一次異見教師運動。

領導這個運動的，是奧通·薩拉紮爾（Othón Salazar 1924-2008），他是一名出生在格雷羅（Guerrero）的教師，運動首先發生在歐克斯特佩克師範學校（Oaxtepec Normal School），然後發生在阿約廷紮帕師範學校（Ayotinzapa Normal School），最後在國立師範學院（National Teachers College），奧通·薩拉紮爾在1951年成為教師，1952年成為青年共產主義俱樂部的一名成員。他很快就被公認為墨西哥城高級師範學院的教師領導人。

在薩拉紮爾的領導下，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第9區在1956年舉行了罷工，爭取更高的工資。然後在1957年，他和他的教師組織了革命教師運動（MRM），在墨西哥城和其他地區的教師中間展開了更廣泛的運動。1958年，革命教師運動（MRM）

開始在墨西哥城舉辦了一系列抗議示威遊行，要求提高工資。

政府對示威者的反應是，破壞抗議遊行活動，逮捕和短期監禁薩拉紮爾，指責他是共產黨人和蘇聯間諜，犯煽動叛亂罪。

政府壓制了這一運動，當薩拉紮爾在1960年領導高等師範學院的第二次罷工時，他被解雇了。從1956年至1977年，他繼續領導革命教師運動（MRM）。

在革命教師運動（MRM）抗議活動的同時，另一位共產黨人德米特裡奧·巴列霍（Demetrio Vallejo）成為墨西哥鐵路工人工會領導的人，領導了該國鐵路的總罷工。

這個罷工，癱瘓了國家，被墨西哥和美國政府解讀為共產黨的革命企圖，被軍隊鎮壓了，有幾個人死亡，數百人被捕，這次運動被徹底破壞了。

共產黨領導的鐵路工人和教師運動的失敗，使得墨西哥的群眾社會運動終結了十年。

鎮壓民主運動

墨西哥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發生了巨大變化。1910年至1940年的革命給了農民土地，帶來學校和診所，人口急劇擴大。後革命政府也建成了連接城市的道路和高速公路。數百萬的革命子孫從農村轉移到城市，導致城市地區和人口的天文數字式擴張。

體制革命黨（PRI）的老式工農結構，

不再足以代表全國擴大的有數百萬高中和大學學生的社會結構。年輕的墨西哥人對自己和他們的國家抱有更高的期望。

然後是1959年的古巴革命，激發了墨西哥的激進社會變革運動。

在墨西哥社會的基礎上，一個新的民主運動發展了起來，於1968年在墨西哥奧運前夕，出現了大規模民主示威活動。

學生和教師一直是運動的中心，全國有數十萬人聚集在其周圍。古斯塔沃·迪亞斯·奧拉茲（Gustavo Díaz Ordaz）總統（1964 - 1970年）的回應是，調集員警和軍隊襲擊這個運動，在特拉特洛爾科（Tlatelolco）三元文化（Three Cultures）廣場殺死了三百多人。

1968年的事件成為墨西哥歷史上的一個巨大轉捩點，導致了接下來的幾十年的一系列民主運動。

新左派走向人民

體制革命黨（PRI）對民主運動的暴力鎮壓，導致成千上萬的年輕墨西哥人轉向左派。

親蘇聯的墨西哥共產黨（PCM）在這個時期有所增長，但是，極左派 --- 菲德爾·卡斯楚和埃內斯托·J·格瓦拉，毛澤東和萊昂·托洛茨基等人的追隨者 --- 的影響力最大。

菲德爾主義者，毛主義者，托洛茨基主

義者，以及一些新卡迪斯塔斯人（neo-Cardenistas）走向人民：貧窮的城市街區，農村，工業區的工廠。他們很快就在農民，汽車工人，鋼鐵工人和教師中招來了追隨者。

在新民主運動的同時，從1968年到70年代中期，在工業工人和一些公務人員中間，一個工作者反叛運動持續發展。反叛成為一個實驗室，讓左派活動家可以測試他們關於組織一場革命的理念。

工會受到墨西哥官僚腐敗和暴力的國家黨控制，就改變這個工會的戰略，左派進行了辯論。一些左派團體選擇創建新的獨立工會，而另一些則決定在現有的結構中鬥爭，爭取建立民主運動，以便可以控制地方工會，最終控制全國工會。

一群左派教師決定採用後一種策略。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的成立

今天的異見教師運動始於20世紀60年代中期，主要是女性，恰帕斯州的土著教師。

這些雙語或多語言教師，以西班牙語和該地區的一種或多種瑪雅語言進行教學，他們開始組織起來，以爭取獲得更高的工資。雖然其中絕大多數普通成員是女性，但運動的領導人幾乎都是男性。

有些事情為他們建立一個教師組織的早期努力創造了背景。首先，路易士·埃切韋里亞總統（Luis Echeverría，1970-1976年）結束了“印地安人西班牙化”的舊制度，並讓國家公共教育秘書處（SEP）以土著自

己的語言和西班牙文負責土著教育工作。

結果是在農村正規學校培訓了成千上萬的土著雙語教育工作者，他們在社區中組成了一個重要而有尊嚴的新角色。隨著時間的推移，對體制革命黨（PRI）的印地安村落酋長式侍從體系，這些教師是抗衡的力量，對國家公共教育秘書處（SEP）的官僚控制的工會代表，他們是個挑戰。

第二，大多數教師在農村正規學校接受基礎教師教育，後來又在墨西哥城國立師範學院和高等師範學校學習。在七十年代，他們的教授中，許多是由毛主義者和托洛茨基主義者組成的新左派，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的要素教授給新教師。

因此，基層土著運動與全國左派組織建立了聯繫，包括毛主義的無產階級陣線（LP）和托洛茨基主義的革命工人黨（PRT）。

毛派主義傾向主要集中於建立學校和社區地方的基礎，但是托洛茨基主義者則強調與政府鬥爭和爭取社會主義的重要性。這兩個潮流都將對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產生重要的影響，他們的政治傾向因為捲入土著社區而逐漸變得溫和。

20世紀70年代的新教師運動，起初是為了提高工人的工資而奮鬥，但很快就成了反對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官僚主義的鬥爭。但鬥爭是多方面的，反對體制革命黨（PRI）的，反對公共教育秘書處（SEP），反對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官員，但也許最重要的，是反對當地的政治土豪，這三個組織共有的政治老闆。

雙語教師，其中大多數是婦女，每兩周與學生父母開一次會，解釋他們的行動和目標，並逐漸與許多家長和社區建立聯盟。



革命先鋒

從1949年到1972年，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一直由耶穌·羅布林斯·馬廷訥茲（Jesús Robles Martínez）主導，這是工會的輝煌期。但是當他顯然不能控制難以駕馭的教師時，他被解雇並由卡洛斯·瓊蘇圖·巴里奧斯（Carlos Jonguitud Barrios）取代，正如喬·福拉克（Joe Foweraker）在“墨西哥的民眾運動：1977年至1987年的教師運動”中所說的：

瓊蘇圖（Jonguitud）是墨西哥城第9區的官員，國家員警委員會負責人（負責工會紀律），還是一個名為革命先鋒隊的強大核心小組的領導人。他還擔任體制革命黨（PRI）的國會議員，參議員，州長以及勞工大會（CT）主席。

因為有埃切韋裡亞總統（Echeverría）總統的護持，1972年，瓊蘇圖（Jonguitud）和他的革命先鋒隊掌管工會，同時政府增加了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教育支出，這一做法為公共教育秘書處（SEP），從而也為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捐款機器提供了更多的資金。

在資金好處未能贏得地區領導人的地方，瓊蘇圖·巴里奧斯（Jonguitud Barrios）與公共教育秘書處（SEP）合作，解雇工會領導人，如果有必要，他威脅，毆打對手，甚至有時殺害對手。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趕走了巴里奧斯

不過，恰帕斯的持不同政見者繼續鬥爭，爭取更高的工資，爭取對本地工會的民主控制，並取得了成功。1979年，恰帕斯州和其他州的教師創建了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作為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核心小組。

儘管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領導層的托洛茨基主義者和毛派人士都未採納民主的模式 --- 在形成其基礎的土著社區也沒有實行民主模式 --- 但他們聚集一起，形成了一個運動，側重于建立民主學校和地方工會，以及參與運動，採取直接行動，以便對酋長，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公共教育秘書處（SEP）和體制革命黨（PRI）施壓。恰帕斯州的活動者經過努力，舉行了民主的州工會大會，選舉了自己的工會領袖，這個成果是1981年完成的。

幾年之內，瓦哈卡州的教師也成功地控制了當地的工會，同時改革運動在墨西哥城也在增長，儘管在所有這些區域，維持工會自主權的鬥爭是不斷的。全國協調委員會

(CNTE)進行了一些罷工，有成功有失敗，但戰鬥持續年復一年。

1989年，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領導了全國罷工，在南部和東南部最強，在墨西哥城也得到了巨大的支持。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動員了三十多萬名教師舉行大型示威遊行，要求趕走卡洛斯·瓊蘇圖·巴里奧斯(Carlos Jonguitud Barrios)，並召集民主的全國工會大會。

墨西哥城被罷工和抗議的教師弄得癱瘓，1989年4月，體制革命黨(PRI)的總統卡洛斯·薩利納斯·德戈塔里(Carlos Salinas de Gortari)將瓊蘇圖叫到辦公室，解雇了他，結束了其對教師十八年的獨裁控制。

然而，教師們沒有贏得舉行民主的全國大會的權利；相反，薩利納斯則把也是第9區官員的埃爾巴·以斯帖·戈迪略(Elba Esther Gordillo)推出，讓她成為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第一位女主管。她反過來認可了民主反對派在墨西哥城第9區的選舉勝利，成功地平息了異見者。

戈迪略不是改革者。她是瓊蘇圖(Jonguitud)革命先鋒隊的忠實而強硬的成員，她的基地仍然是工會，儘管她也努力爭取成為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的領導人，並與公共教育秘書處(SEP)的教育改革者合作。

由於工會內部的一系列政治鬥爭和談判，她很快就從上面構建了一個新的官僚機構，儘管恰帕斯州和瓦哈卡州繼續持反對立場。

忠誠和異見

戈迪略對工會進行政治控制的方式與前任一樣：用賞罰兩手，獎賞忠誠者和懲罰反對者。

教育體系發展巨大，更多的學生從初級學校到高中。預算也隨之增長。在政治酬庸體系(prebendalist corporative system)下，除了工會的會費外，公共教育秘書處(SEP)繼續向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提供資金，維持充斥閒職和掛名工作的龐大官僚機構。

她的行政當局也是壓制性的，1981年1月，她被指控要對謀殺教師蜜雪兒·努呢茲·阿科斯塔(Misael Nuñez Acosta)負責。根據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的說法，在過去幾十年中，151名教師中只有一人被謀殺。

此後還有其他幾名教師被謀殺。除了恰帕斯州和瓦哈卡州外，戈迪略對工會的控制仍然是牢固的。

堅定地控制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企圖用工會來獲得政治權力，讓戈迪略也成為一個重要的政治人物。

像其他工會官員一樣，她曾擔任國會議員，也是參議員，但她也是從普通黨員升格為黨頂層的人，最終在2002年成為體制革命黨(PRI)執政委員會的總書記，黨的最高職位。

所有這一切都是傳統和典型的，但是在2000年，隨著國家行動黨(PAN)的維森特·福克斯(Vicente Fox)當選總統職務，所有事情都突然改變了。

福克斯和國家行動黨（PAN）沒有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樣解除酬傭體系。保守派把其用自己的目的，與上層工會領袖形成政治關係。福克斯和戈迪略成為朋友，為她提供了在公共教育秘書處（SEP）的影響力，即為工會人員提供持續的工資來源和職位。

部分原因是因為她與福克斯的聯盟，2005年，戈迪略（Gordillo）發現自己與另一位體制革命黨（PRI）領導人羅伯托·馬德拉佐（Don Roberto Madrazo）的鬥爭失敗了。她辭去了體制革命黨（PRI）的職務，並於2005年在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基礎上組建了自己的新聯盟黨（New Alliance Party）。同時，她也支持了國家行動黨（PAN）的候選人菲力浦·卡爾德龍（Felipe Calderón）。

在2006年，她的新聯盟黨獲得了14%的可觀選票，使得她在國會上佔有重要地位。同年，她試圖恢復她作為體制革命黨（PRI）領導人的地位，但體制革命黨（PRI）領導層將她從組織中驅逐出去，因為她支持了另一黨的候選人。

自從卡洛斯·薩利納斯（1988 - 1994年）任總統以來，墨西哥採取了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模式---開放市場，外國投資，削減社會服務，打擊工會 --- 現在政府開始把這種模式強加於教育。2008年，卡爾德龍總統和戈迪略達成了一項協定，名為“素質教育聯盟”（ACE）。

素質教育聯盟（ACE）要求教師在受雇于公共教育秘書處（SEP）之前參加考試，工會停止銷售教學職位。雖然這兩項主要規定似乎是合理的，但人們普遍認為，長期目標是政府更多地控制工會和教師，結束革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命以來的民族主義公共教育的模式。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拒絕了素質教育聯盟（ACE）協議，認為這是對工會和公共教育的攻擊。

教育改革法

從墨西哥資產階級以及全國勞動人民的角度看，維森特·福克斯（Felipe Fox）和費利普·卡爾德龍（Felipe Calderón）的總統工作都被證明是失敗的。卡爾德龍的反毒品戰爭導致六萬人死亡，另外有二萬人的強迫失蹤，以及數萬人的流離失所。而且經濟停滯不前。

隨著國家行動黨（PAN）信譽的徹底破產，中左派的民主革命黨（PRD）否定了通過欺詐獲得的選舉勝利，墨西哥的公民回歸體制革命黨（PRI），選舉了恩里克·佩尼亞·尼托（Enrique Peña Nieto）為總統。

2012年12月，佩尼亞·尼托（Peña Nieto）將體制革命黨（PRI），國家行動黨（PAN）和民主革命黨（PRD）的領導人帶到了查普爾特佩克城堡（Chapultepec Castle），在那裡簽署了“墨西哥公約”，要求改革稅收結構，銀行體系，能源，電信和教育。教育改革法獲得了三大主要政黨的支持，儘管受到戈迪略和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反對，該法於2012年12月由國會通過。

教育的中心是建立國家教師評估制度。佩尼亞·尼托（Peña Nieto）的第一任公共教育部長厄米洛·恰非特（Emilio Chuayffet）解釋說，測試是強制性的，沒有管理或參加考試將導致“法律後果”。

新法對雇傭，工作安全，工資和晉升機

會有影響。它也打破了正規學校之間的聯繫，允許開放所有的教學工作給任何大學的畢業生競爭，無論他們學什麼。教師不能把工作交給家庭成員或者在市場上出售。

戈迪略和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反對改革，說在法案起草時沒有諮詢工會和教師。不過，她不會被允許繼續反對或領導反對運動。

2013年2月26日，佩尼奧·尼托（Peña Nieto）當局把戈迪略逮捕，指控她挪用數百萬美元的工會資金，據報導，錢已經存放在歐洲的銀行並用於房地產上。

墨西哥總檢察長耶穌·穆利洛·卡蘭（Jesús Murillo Karam）指責戈迪略洗錢，說她使用工會資金支付飛機，飛行員培訓，她的整形手術和在美國購買的奢侈品。曾是她的工會核心小組忠實成員的卷·戴茲·德·托雷（Juan Díaz de la Torre），成了工會的負責人。

雖然戈迪略很可能犯了她被指控的貪污罪，但這種做法在墨西哥的勞工官僚機構中很常見。監禁她的動機是政治性的：首先她背叛了體制革命黨（PRI），其次反對佩尼奧·尼托（Peña Nieto）。

她必須走人。被捕後，被監禁等待審判，她的聲譽被摧毀，離開權力，她不再有任和政治力量。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把新的教育改革法作為對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的開戰宣言，尤其針對其異見者運動，開始動員工會的普通成員。像ACE一樣，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認為教育改革法是對公共教育，工會和教師本身的攻擊。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教師開始抗議，但很快就發現自己捲入了更廣泛的鬥爭。2014年9月26日，在格雷羅州伊瓜拉（Iguala）市，員警和幫派成員殺害了六人，二十五人受傷，並從阿約茲那帕地方師範學校（Ayotzinapa Rural Normal School）綁架了四十三名學生，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參加了已成為全國範圍的抗議活動。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面臨的挑戰

墨西哥的教師繼續面對自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後期以來所面臨的制度：體制革命黨政權，強大的教育部，官僚主義的墨西哥教師聯盟（SNTE）以及地方土豪。

恰帕斯，瓦哈卡，格雷羅和米卻肯的教師們在他們的州建立了強大的運動，贏得了權力，教師們仍然處於不斷保護自己的動員狀態。儘管鬥爭了近四十年，儘管其他一些地區有活動偶然爆發，民主運動仍未能能在其他二十八個州中獲得權力。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受到公司媒體不斷的批評，費力地向媒體和公眾解釋其觀點，認為它是在捍衛公眾教育，教師的工作

條件和學生的最大利益。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也繼續努力，維持其與地方家長和學生的關係，這是一個困難的挑戰，因為工會經常會罷工幾個星期甚至幾個月的時間。

持不同意見的教師努力爭取公眾的支援，因為部分公眾對於將工作轉交給家庭成員或出售工作的做法持批判態度。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最近也制訂了自己的教育改革計畫。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從一開始就與選舉政治問題纏鬥在一起。民主革命黨（PRD）自一九八九年成立以來，一直最同情持不同政見的教師，並表示願意擔任其政治工具。但是，民主革命黨（PRD）的宗派主義，腐敗和機會主義使得它不是那麼令人滿意的政治盟友。

在六人死亡的時候，在阿約茲那怕地方師範學校（Ayotzinapa Rural Normal School）四十三名學生失蹤的時候，當時民主革命黨（PRD）主導格雷羅州政府和伊瓜拉市政府，這個事實嚴重損害了該黨在教師中的聲譽。

在2015年6月，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呼籲抵制選舉，但瓦哈卡和格雷羅的教師摧毀投票站和投票箱，燒毀選票，進行強迫抵制，這個導致與當地地方社區的衝突。

較近時候，一些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領導人與國家再生黨運動（Morena）的洛佩斯·奧布拉多爾（Andrés Manuel López Obrador）（普遍稱為AMLO）合作，儘管許多人擔心AMLO（洛佩斯·奧布拉多爾）只會

利用聯盟來維護自己的政治利益。

到目前為止，持不同政見的教師沒有為他們的運動找到政治工具。

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反對一系列墨西哥政府的史詩般戰鬥發生在這樣的時期，當時大部分勞工運動被墨西哥政府挫敗或擊垮。

戈迪略的盟友費利普·卡爾德龍（Felipe Calderón）摧毀了墨西哥電器工人工會，把墨西哥礦工和金屬工人工會領袖拿破崙·戈麥斯·烏魯蒂亞（Napoleón Gómez Urrutia）驅趕到溫哥華流亡。

政黨，政府機構，私人雇主，邪惡的律師和流氓團夥控制著墨西哥的大多數工會。經濟仍然停滯不前，自2008年大衰退以來，向美國移民變得更加困難而回報更少。

所有這一切使全國協調委員會（CNTE）的鬥爭更加醒目。儘管他們的幾個活動分子被謀殺，一些領導人遭逮捕，以及警方對示威遊行施以暴力攻擊，但鬥爭仍在繼續。

Mexico: Oaxaca Teachers Repel Bloody Riot Cop Assaul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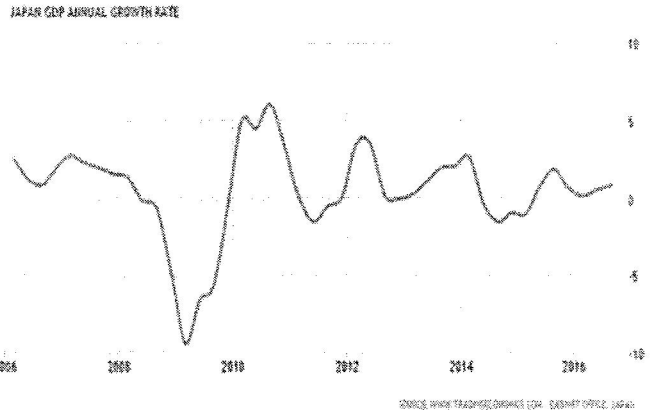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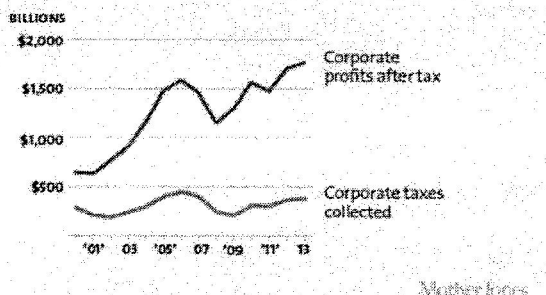
特朗普經濟學的考驗

邁克爾·羅伯茨

在唐納德·特朗普當選之前，每逢他在民意調查中有所改善時，股票市場都下跌。金融資本不希望他贏。但自從他令人驚訝的當選以來，股市並沒有下滑。相反，隨著美元走強，它們大幅上漲。看來，對資本來說，“唐納德”完全是一件好事。

這種樂觀主義大多是一廂情願。但一廂情願的想法可以在市場上作用一段時間。這個想法的依據是特朗普提出的政策：特別是企業部門的減稅，以及有利於1%收入最高者的個人所得稅的減少。此外，他還聲稱，將在全國各地的新基礎設施和投資專案上花費高達1萬億美元，放開對銀行的管制，減少勞動者的權利（那還剩下什麼？）。

刺激措施是凱恩斯主義經濟學耳熟能詳的音樂，儘管凱恩斯主義頂尖大師普遍對“唐納德”的態度和粗魯感到厭惡。事實上，如果這些政策在未來一年左右實施，那麼對於世界經濟的凱恩斯主義解法，特朗普經濟學（Trumponomics）將是下一次考驗，檢驗它能否讓世界經濟走出這一長期蕭條。日本的“安倍經濟學（Abenomics）”遵照類似的公共支出政策，減稅和量化寬鬆政策，已經悲慘地失敗了。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幾乎沒有變動，而工資收入和價格依然不敢稍動。



但現在有些凱恩斯主義者讚揚特朗普的做法是“與新自由主義的決裂”。偉大的歷史學家和凱恩斯傳記作家羅伯特·斯吉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告訴我們，“特朗普還承諾將有8000億美元到一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投資計劃，融資方法是債券發行以及大量減稅，其目標是創造2500萬個就業機會和促進增長。這與維護福利待遇的承諾一起，是凱恩斯財政政策的現代形式。所以斯吉德爾斯基繼續說道：“當特朗普從民粹主義向政策轉變時，自由主義者不應該厭惡和絕望，而應該參與特朗普主義的正面潛力。他的建議需要被質詢和提煉，不應被視為無知的狂妄言論。”不錯，被凱恩斯主義說服的自由主義者可能想‘參與’特朗普並採用特朗普經濟學，但是那些想要改善‘勞動法（Labour）’的人，是大多數，他們不屬最富有的1%，持有不同的觀點。

那麼，讓我們來查看一下特朗普經濟學。顯然，斯吉德爾斯基（Skidelsky）認為削減企業稅會創造新的就業機會，並增加增長。不過，沒有證據顯示，以往主要經濟體中企業稅的削減，有過任何這樣的效果。在新自由主義時期企業稅率被削減，但經濟增長萎縮。發生的情況是，犧牲勞工讓資本的利潤增加，讓非生產

性金融投機增加。據官方資料來看，美國企業的邊際稅率為35%，但剔除各種豁免金，實際上只有23%，是全球最低的。

特朗普的基礎設施計劃是極為需要的。在我的博客中，我經常列舉美國公共服務和交通的可怕狀態。美國固定資產的平均年齡為22.8歲，是1925年以來資料中最大的。基礎設施支出為30年來的低點，橋樑、道路和鐵路在我們眼前搖搖欲墜。根據美國土木工程師協會2013年度的報告，到2020年，美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需要的資金將超過3.4萬億美元，其中道路、橋樑和過境費用為1.7萬億美元；電力和電網為7360億美元；3910億元用於學校；機場需1340億美元，而水路及相關工程則為1330億元。但聯邦對基礎設施的投資，在過去三十年中已經下降了一半，從GDP的1%降到0.5%。

毫無疑問，基礎設施的公共投資將有助於美國經濟提升一點增長 --- 高盛估計每年上漲0.2%。但特朗普四年花費1萬億美元的建議是假的。其絕大部分根本不是公共投資。這些資金將來自有提供資金動機的私人資源：大型建築公司和開發商（如特朗普公司本身），他們將獲得減免稅款，也有權對使用其建成的橋樑、道路的用戶收取過路費。直接公共開支和建設將受到限制。

此外，正如我在許多發文中所說的那樣，幾乎沒有證據表明凱恩斯主義的刺激計劃有助於就業和增長。斯吉德爾斯基 (Skidelsky) 談到了20世紀30年代的羅斯福時期。實際上，在羅斯福時期很少有長期的或新的工作機會產生出來。失業率一直維持到戰爭開始。正如美國凱恩斯經濟學權威保羅·克魯格曼 (Paul Krugman) 在他的書“終結蕭條 (End Depression now)”中指出的那樣，是這場戰爭成就了全面的就業和經濟的復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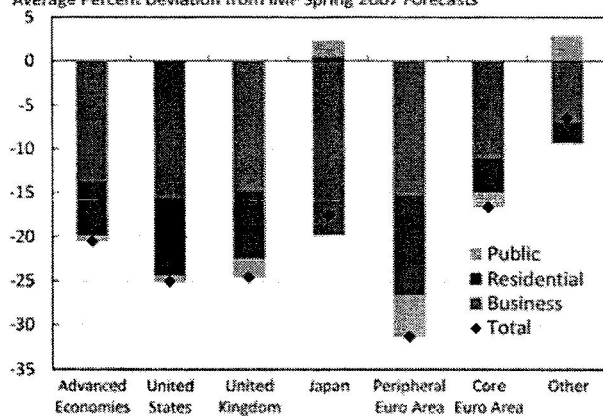
在“緊縮”期間，從2009年起，當時政府在經濟衰退 --- 我們仍然處在這個時期 --- 之後，試圖運用預算剩餘，想要削減公共債務，而凱恩斯主義者告訴我們，緊縮的“係數”是巨大的（即通過削減預算赤字或政府支出，增長大幅度地以一比一以上的比例減少）。那麼，在以前的發文中，我已經表明，這個“強大的係數”確實是有問題的。事實上，自2009年以來，減少或提高政府赤字或支出，同增長之間幾乎沒有相關性。與增長關聯最密切的是利潤而不是政府支出。

最近，北卡羅來納州立大學的諾拉·特拉姆 (Nora Traum) 發了一文，題為“清除財政乘數陷阱”。她發現“不同的假設創造不同的乘數”。她詢問了九位建模者，使用三種不同的模型來預測三種不同稅制改革方案對增長的影響。對於一次改革，短期增長預測從-4.2%到16.4%不等，長期來看，從1.7%到7.5%不等。

最近的研究表明，對資本最好的消息，是削減政府支出而不是提高稅收以實行緊縮政策。減少政府支出給私人資本提供了更多的空間，而增加像企業稅這樣的稅收，對資本更有害，從而影響到增長。如果我們現在預期特朗普實行財政擴張而不是緊縮（我們會看到），那麼資本就希望減稅，但不希望政府支出（除了那些獲得合同的開發商），特別不希望其直接干擾或取代私人投資。這就是後凱恩斯主義的邁克爾·卡萊茨基 (Michal Kalecki) 本人反對凱恩斯主義刺激的觀點。

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解釋了為什麼。在現代資本主義經濟體中，私人資本投資占主導地位，真正推動投資的，是那些項目的盈利能力。因為利潤太低，私人投資未能到位，但即使如此，公共部門也不能干預。

Decomposition of the Investment Slowdown, 2008-2014
Average Percent Deviation from IMF Spring 2007 Forecast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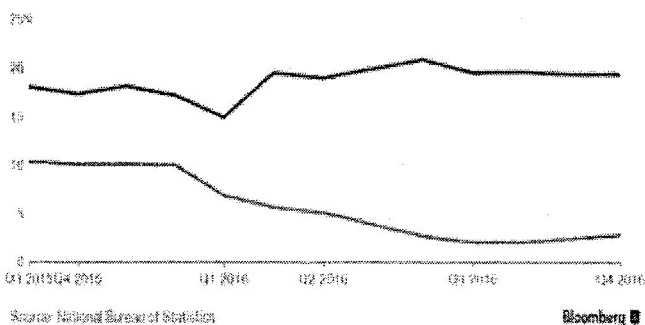


這就是特朗普計劃與中國政府在2009年以來的大規模基礎設施和城市化投資方面的差距。過去十年，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花費了11萬億美元，是特朗普計劃的十多倍。這種公共投資由國家銀行資助，由國有企業執行，削弱了私營企業在中國的增長。但是控制經濟的是中國政府，不是國內外大企業（世界銀行頗感失望），這種投資可以在這個長期蕭條時期實現6-7%的年增長。

Picking up The Slack

China boosts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as private investment slows

■ China fixed-asset investment in infrastructure (cumulative) YoY
■ China private fixed-asset investment (cumulative) YoY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Bloomberg

因此，特朗普經濟學能否像特朗普聲稱的那樣，取得高達每年4%的經濟增長率，其可能性很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顧問認為採用與特朗普計劃相似的方案，就能讓GDP增長率達到4%以上時，主流經濟學家（romer-and-romer-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evaluation-of-friedman1)對其是一片撻伐聲，說這是一個無法實現的夢想 --- 不錯，我同意。但是現在特朗普宣導它，金融市場和凱恩斯主義者卻發現它是有吸引力的，甚至是可能的。

像安倍經濟學一樣，特朗普經濟學確實是凱恩斯主義與新自由主義的結合。顯然，新的支出和減稅的代價，是更多地放鬆對市場和勞動條件的管制來增加利潤。這應該是按“動態模式”促進增長率，這個模式以前被稱為“滲滴式經濟學”，其主張是給富人減稅可以讓其將錢用於商品和服務，以便我們其他人得到多一些的收入和工作。根據特朗普自己經濟專家們的看法，主要的激勵作用並不是來自個人或企業稅率的減少，而是因為允許企業不拖時間地迅速收回投資。

斯吉德爾斯基 (Skidelsky) 在他對特朗普政策的讚美中，忽略的是特朗普經濟學的特徵：貿易保護主義和移民限制。這些政策比凱恩斯式的刺激更有可能得以執行。特朗普計劃放棄TTP（與日本和亞洲的區域貿易協定）和TTIP（與歐洲的區域貿易協定），並與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談判”區域貿易協定“NAFTA”。目的是‘保護’美國的工作，結束廉價的墨西哥勞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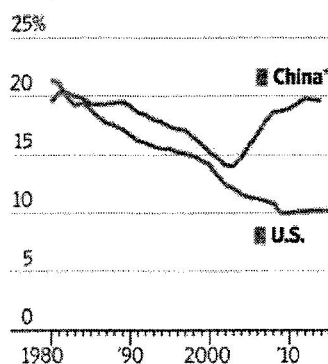
正如唐納德去年三月所說：“我要讓蘋果公司開始在我們的土地上而不是在中國製作電腦和iPhone。”他想對中國進口商徵收45%的關稅。據大和資本市場 (Daiwa Capital Markets) 估計，這可能會拉低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4.8%，在三年內減少中國向美國出口的87%。雪梨大學資訊研究學院教授傑森·德特裡克 (Jason Dedrick) 估計，即使蘋果在美國找到足夠的工人進行裝配，蘋果iPhone 7的成本可能會增加30-40美元。由於勞動力僅占電子設備整體成本的一小部分，這些較高費用的大部分，將用於運輸零部件到美國。如果iPhone元件也在美國製造，那麼設

備的成本可能會攀升到90美元。這意味著，如果蘋果選擇將所有這些成本轉嫁給消費者，該設備的零售價格可能會上漲約14%。因此，即便假設中國沒有報復，特朗普的貿易政策也將意味著美國商品價格開始大幅上漲。

Local Call

Manufacturing jobs in China have soared in the smartphone era. The cost of products such as Apple's iPhone would increase if they were manufactured in the U.S.

Share of employment in manufactur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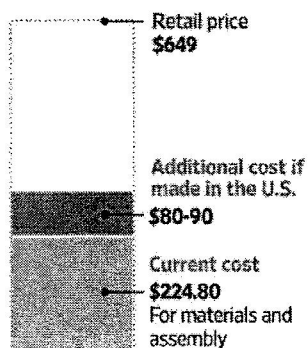


*Latest data as of 2014

Sources: OECD (employment); IHS Markit, research by Syracuse University, UC Berkeley and UC Irvine (cost estimat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iPhone 7 manufacturing cost For a 32GB mode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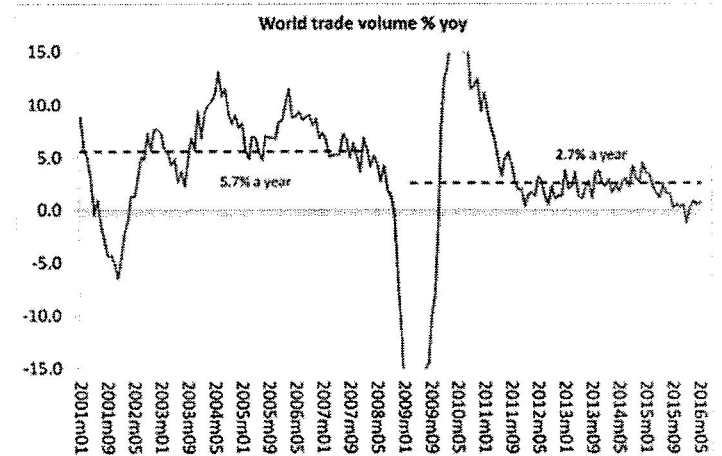


把所謂“全球化”的這個關鍵特徵扭轉，只會對美國公司造成損害，同時把任何成本和價格上漲的負擔轉移到美國普通家庭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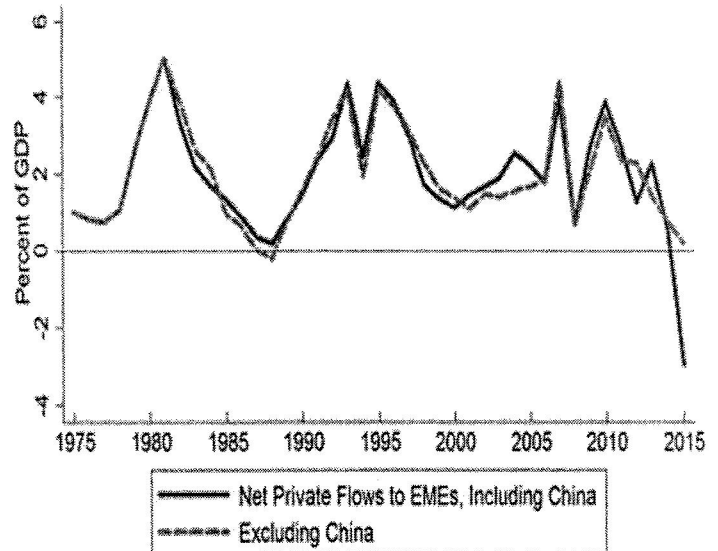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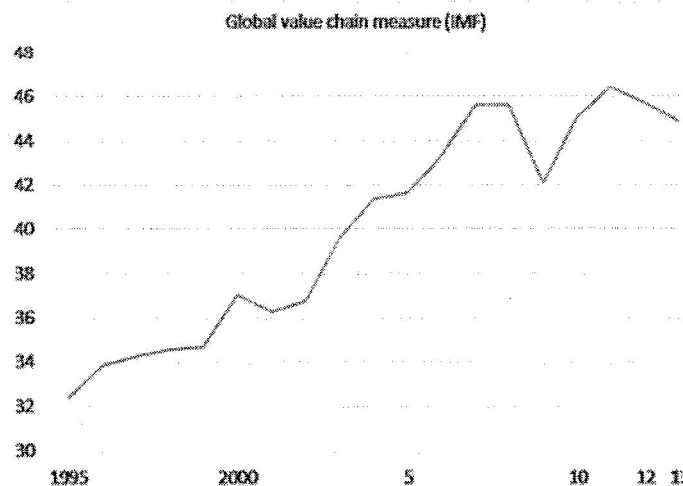
全球化 --- 世界貿易的跨境擴張和資本流動以及國際增值鏈的發展 --- 是1960年代中期至1980年代初期主要發達經濟體經歷過的利潤下降的重要因素。勞動權利的放鬆，工會權力的破裂，國內公共部門資產的私有化，這些都伴隨著跨國公司的全球擴張。特朗普現在談到要扭轉這一反作用因素，以利於他在美國中西部的“生鏽帶”中的選舉支持者，因為美國跨國公司搬移到墨西哥，亞洲和拉丁美洲剝削更便宜的勞工，這些地區受到最多的影響。

諷刺（以及資本的擔心）的是，大衰退和隨之而來的長期蕭條似乎在結束全球化。在特朗普和脫歐運動（Brexit）之前，全球化已經陷入困境。自2009年以來，全球金融危機，大衰退和隨之而來的長期蕭條（類似於20世紀30年代）已經使世界貿易的擴張停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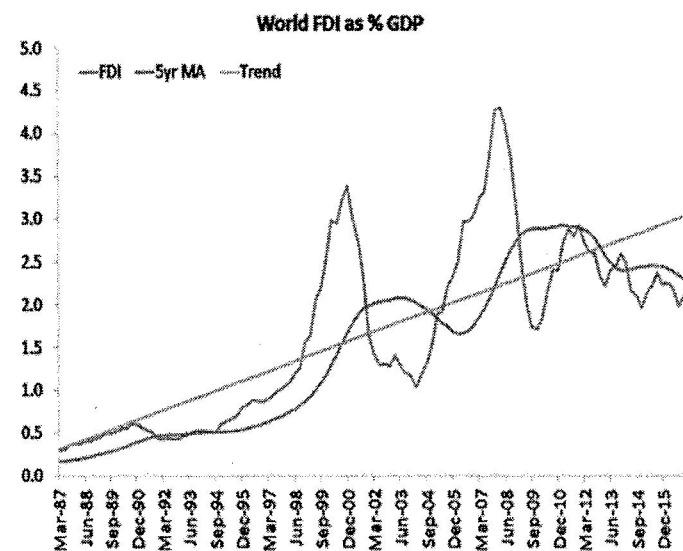
正如約翰·史密斯在其雄辯的著作“二十一世紀的帝國主義：全球化，超級剝削和資本主義的最後危機（Imperialism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Globalization, Super-Exploitation, and Capitalism's Final Crisis）”中所表明的那樣：“全球貿易的80%（以出口總額計）與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網路有關。”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估計，“約60%的全球貿易……由中間商品和服務的貿易組成，它們是在用於最終消費的商品和服務生產過程中的各個階段納入的。”當代全球化的一個突出特徵是，現在許多全球價值鏈中，增長中的非常大比例的勞動力落在發展中國家經濟體。一句話，正如史密斯先生所引用的加里·格雷菲（Gary Gereffi）的說法那樣，“大部分世界工業生產的重心已經從全球經濟的北方向南方轉移。”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關於全球價值鏈的參與衡量標準，主要跨國公司之盈利能力的提高，現在正處於停滯中。



當然，資訊流（主要是互聯網流量和電話）爆炸，但貿易和資本流動仍然低於衰退前的高峰。全球外商直接投資占GDP的比例正在下降。



而流向所謂新興經濟體的資本也急劇下降。

最近，在特朗普勝選之前，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會面，他們已經看到全球化危機緊迫的徵兆。他們表示反對“一切形式”的貿易保護主義。正如德意志銀行的經濟學家們所說的：“感覺我們正在走向一個經濟時代的終結……因為系統中的現有壓力，為了防止經濟和政治體制的變化，時間正在耗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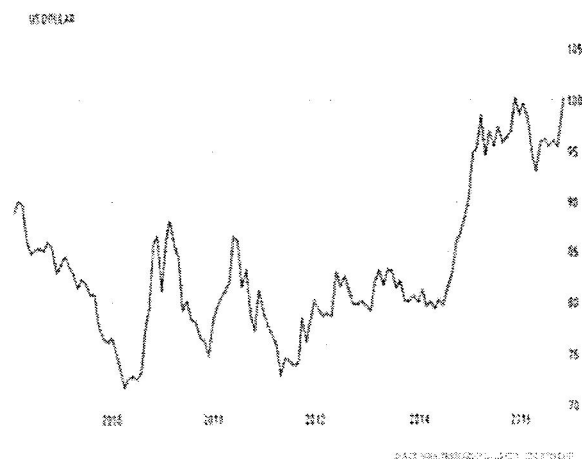
資本策略師擔心，特朗普經濟學只會使全球盈利能力變得更糟。前歐洲央行成員，金融資本首席策略師賓·斯馬季（Bin Smaghi）評論說：“試圖扭轉全球化，可能是有害的，對於邁出第一步的國家，傷害尤其深。在最近一波的浪潮中，發達經濟體面臨的挑戰最大，所以反全球化運動正在得到支持，政府也傾向於轉向內部。然而，由於他們的經濟如此之大，受到全球化網路的約束，除非新興市場也退縮，否則它們不能扭轉局面。”

風險在於，隨著貿易進一步下滑，流入資本枯竭，新興經濟體可能會陷入低谷。新興經濟體已經從美國和歐洲的銀行舉措大量的債務（信貸）來投資，而錢並不總是用在生產部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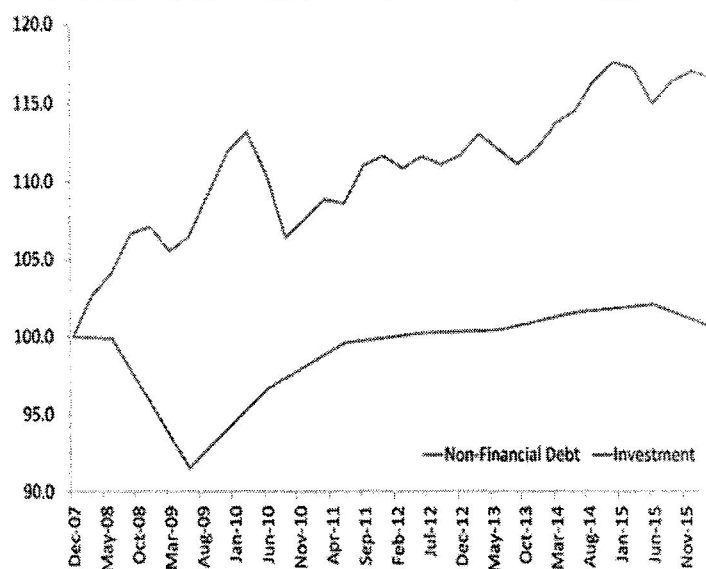
由於全球利率非常低，美元走弱，因此美元借款不成問題，迄今尚未造成任何問題。

但這是改變的開始，部分是由於特朗普經濟學。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今年在奧地利，土耳其和沙烏地阿拉伯等國家發出了35次信用降級，只發表了5次升級。評級公司評估的134個國家中，目前對35個國家的展望是負面的。國際清算銀行去年年底的資料顯示，至少有7萬億美元的政府債務有降級的危險。這一被穆迪投資看衰的國家比例，是自2012年以來最高的，而它不會在更糟糕的時候出現。債券利率，特別是長期債券利率現在急劇上漲。如果這是債券市場35年牛市的結束，那麼，經過多年的低利率後，政府可能需要準備大幅度提高借款成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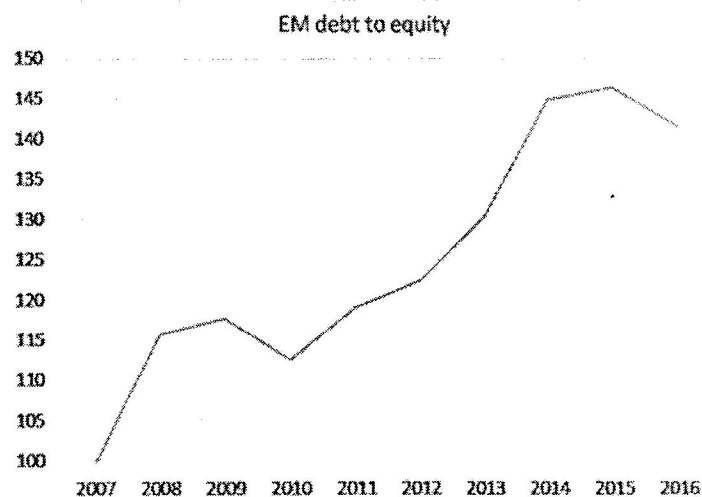
與此同時，美元與其他主要貿易貨幣相比，呈強勢上漲態勢。



相比於生產性投資，全球債務急劇增加。



而新興經濟體的企業債務與資本比率也急劇上升。



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伴隨著借貸成本上升和貿易停滯不前，目前受到特朗普經濟學的威脅，全球經濟衰退的風險將會增加，難以避免。

生態社會主義不僅是戰略，還是文明規劃

亞歷山大·阿勞霍·科斯塔、丹尼爾·坦諾羅

巴西生態活動家亞歷山大·阿勞霍·科斯塔（Alexandre Araujo Costa）同比利時生態作家兼活動家丹尼爾·坦諾羅（Daniel Tanuro）就生態學和生態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問題進行了交談。

多年來，左翼組織一般都不太關注環境問題，但至少自第十五次大會以來，第四國際似乎越來越關注我們所說的“生態危機”。是什麼東西改變了？

事實上，在20世紀60年代，大多數左翼組織忽略過了這一點，當時，所謂的“生態危機”成為一個受到廣泛社會注意的新問題（雖然人們可以給這個新興事件標上一個象徵性的生日：瑞吉兒·卡森（Rachel Carson）的書《寂靜的春天》，出版於1962年）。其主要原因是這些組織的注意力集中於殖民地國家（古巴，阿爾及利亞，越南等）的反殖民主義戰爭和革命，關注反對東方官僚體系（波蘭，匈牙利）的群眾運動，以及西方青年和工人的激進化。

但在我看來，這個原因並不是唯一的原因。我們還必須考慮到，從理論的角度來看，左派組織不能輕易應對生態危機。例如，許多作者對於譴責資本主義技術和限制增長的想法感到不安。實際上，在這些話題方面，馬克思著作中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的，但是他的後繼者似乎已經忘記了他的貢獻（關於圈地，關於資本對人與自然的社會新陳代謝的破壞，關於林業，農業，土地管理的後果，等等）。甚至像我們的同志歐尼斯特·曼德爾（Ernest Mandel）這樣富有創造性的開放的革命馬克思主義思想家也是如此。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我想說清楚一點：在我看來，馬克思生態學的說法有點誇大，必須考慮到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衝突和矛盾。但馬克思遺產的生態方面確實令人印象深刻，他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為我們提供了使其蓬勃發展的絕佳工具。那麼，我們應該如何解釋這個事實：大部分馬克思主義左派在上個世紀60年代都錯過了生態學這輛列車？當然，史達林主義要負很大一部分責任，但是這種解釋對於反史達林主義潮流的情況，就不是很有說服力的。我認為，生產論和科學主義的觀念非常廣泛地污染著左派。它開始於19世紀末的社會民主，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真正紮根 --- 也許是因為俄羅斯，那裡發生了革命，是一個落後的國家。

我認為，有三個方面的變化：首先，是核威脅培養了一種意識，即技術不是中立的；其次，貧苦農民和土著鬥爭表現出生態問題的社會層面；第三，少數作者開始重新回顧馬克思關於自然的論述，發掘他的遺產。儘管如此，大多數左派人士仍然滿足於純粹的宣傳主義方法，告訴人們在資本主義的框架內不可能有任何生態主義的選擇，話雖不錯，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提出具體的生態要求和改革，把它們同過渡綱領的社會要求結合起來。

邁向這一綱領的一個重要步驟，是邁克爾·洛維（Michael Löwy）和喬爾·科維爾（Joel Kovel）於2001年撰寫的“生態社會主義宣言（Ecosocialist Manifesto）”。催生這個宣言的動機是深化的生態危機及其全球性，氣候變化則是一個主要威脅。與此同時，在我們組織中，有越來越多的積極分子參與了針對生

態挑戰的社會運動，特別是氣候運動和糧食主權運動（這些運動密切相關，因為農業企業在全球暖化中扮演重要角色）。自上次大會以來，第四國際已經將自己定義為一個生態社會主義組織。

按照你的觀點，氣候變化有多令人擔憂？問題僅僅是技術的適當使用，比如用可再生能源代替化石燃料嗎？通過碳捕集與地球工程技術相結合，就可以扶正地球的氣候嗎？

氣候變化是極其令人擔憂的。實際上，這可能是我們必須應對的最危險的社會生態威脅，具有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巨大後果。我不想對此做太詳細討論，但是必須知道，3攝氏度的升溫極有可能導致海平面上升約7米。到達這個程度需要一千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但這一運動是不可能停止的。專家認為 短期內，到本世紀末，海平面上升60-90釐米。這將意味著數以億計的難民。如果考慮到氣候變化的其他影響（極端天氣事件，農業生產率下降等），結論是令人恐懼的：在某一閾值以上，一個八、九十億人口的人類將無法適應氣候變化。如何定義這個閾值，不僅僅是一個科學問題，而且還是一個政治問題。在巴黎，各國政府決定採取行動，將變暖溫度維持在2°C以下，並試圖將其限制到1.5°C。平均2°C的變暖應該被認為是一場災難。

顯然，氣候變化不是唯一的威脅：其他的威脅有物種的大量滅絕，海洋的酸化，土壤的退化，由於氮磷污染，化學污染造成的海洋生物死亡，臭氧層的消耗，淡水資源的過度使用和大氣中的氣霧劑濃度(Aerosol loading)。但是，氣候變化起著核心作用，直接或間接地與大多數其他威脅相關：是使生物多樣性喪失的一個重要因素，海洋酸化的原因是大氣中二氧化碳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濃度的上升，海洋中氮和磷的過量來自農業企業，這些企業在淡水濫用和土壤流失等方面起著主要作用，等等。事實上，大多數問題是相互關聯的，這意味著，把對氣候變化的回應與其他挑戰的回應分開是錯誤的。然而，所有這些生態挑戰都具有相同的根本來源：資本主義積累，利潤競爭所帶動的數量增長。

這意味著氣候變化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它提出了全球替代這種生產模式的基本問題。這個替代模式在客觀上是非常緊迫的。它是如此的緊迫，實際上，因為即使從技術角度看，綠色資本主義的戰略也是有偏差的。當然，完全有可能只依靠可再生能源來生產我們所需要的所有能源。但是，您如何生產光伏面板，風車和其他設備？用什麼能量？從邏輯上講，你必須考慮到過渡過程本身將需要額外的能源，並且過渡開始時，這個額外能量的80%，來自化石，將引起額外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因此，你需要一個計畫，在某處做額外的碳削減，以補償額外的排放量。否則，即使可再生能源的份額迅速提高，全球排放量也會繼續增加，因為那意味著你可能超過了所謂的“碳預算”，即加到大氣中的碳排放量，所謂“碳預算”，也就是在本世紀末之前，人們想要讓溫度增加不超過一定閾值的可能性。根據IPCC的資料，2011年至2100年期間，要以66%的概率把溫度增加限制在1.5°C，則碳預算為4000億噸。全球排放量約為400億噸/年，而且尚在改進中。換句話說，1.5攝氏度的碳預算只能用到2021年。因此，我們已經撞牆了。這是資本主義狂熱追求利潤的具體結果，也是拒絕規劃必要的減排功能轉型的具體結果。

這確實開啟了關於碳捕獲和地球工程的辯論。在資本主義生產主義制度的框架內，碳捕獲和地球工程是抵消超出碳預算的唯一可能的“解決方案”。我之所以用引號，因為這些是魔法

師徒弟 (sorcerer's apprentice) 的解決方案。其中最成熟的技術之一就是所謂的生物能源結合碳捕獲封存法 (BECCS)。這個想法是在發電廠中用生物材料替代化石燃料，捕獲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並將其儲存在地質層中。由於生長中的植物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大規模使用生物能源結合碳捕獲與封存法 (BECCS) 應該能夠減少溫室效應，從而改善碳排放的收支。除了原因外，這還是一個非常假設性的解決辦法，因為沒有人知道將二氧化碳保持在地下，技術上是否有可能，能持續多久。同時，對這個問題的反應是非常棘手的，因為生產必需的生物質材料將需要巨大的土地面積：大約相當於當今農業使用土地的五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一方面，將農田轉化為生物質材料種植，將不利於糧食生產。另一方面，在非耕地建立工業生物質材料種植園，將會對生物多樣性造成可怕的破壞，使自然界極度貧瘠。可以說，95% 的包含實施這種技術的 IPCC 氣候方案，是非常值得懷疑的。也就是說，這進一步證明了科學不是中立和客觀的，特別是在進行社會經濟預測時。

值得注意的是， 1.5°C 的碳預算將被超過，而 2°C 的預算很可能會很快被超過，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應該兩害相權取其輕而接受資本主義技術。反之，情況非常嚴重，事實是，減少和取消碳排放是不夠的。挽救氣候需要從大氣中移除碳。但是，這個目標可以更好地達成，而不用訴諸生物能源結合碳捕獲封存法 (BECCS) 或其他危險技術。資本主義選擇 BECCS 等技術的原因是它們適合利潤競爭。另一種方法是發展和推廣農民有機農業，並謹慎的管理森林和土地，尊重土著人民。通過這種方式，可以從大氣中除去大量的碳並將其存留在土壤中，同時促進生物多樣性並為每個人提供良好的食物。但是這個選擇意味著同農業企業和土地所有者進行激烈的反資本主義鬥爭。換句話說，解決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辦法不是在技術領域，而是在政治領域。

最近樂施會 (Oxfam) 提出的一項研究顯示，八名男子控制的財富與一半人類的財富相當。我們也打破了全球溫度記錄（再次），我們大氣的二氧化碳濃度超過了 400ppm 。氣候變化和人類不平等是否有聯繫？

當然是。眾所周知，一般而言，災難中，特別是在氣候災難中，主要受害者是窮人。顯然，由於人類活動（更準確地說：由於資本主義活動）造成的氣候災難也是如此。事實上，正如我們在全球各地清楚看到的那樣：2014年颱風海燕在菲律賓造成的災難，2005年卡特裡娜颶風在美國，2010年的巴基斯坦洪水氾濫，2003年歐洲遭受熱浪襲擊，貝南等非洲國家出現乾旱和海平面升高，等等。

此外，資本主義對氣候變化的反應是這種社會不平等的加速器。因為其政策是建立在市場機制基礎上的，特別是依賴自然資源的商品化/佔有。它主要依靠“把外部性內在化 (internalising externalities)”，其意思是，環境損害的價格必須被估價並包含在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中。當然，這個價格然後傳遞給最終消費者。那些有錢的人可以投資於更清潔的技術 --- 比如電動車 --- 其他人則不能，所以他們為同樣的服務（在這種情況下，為了“行”（流動性））支付更多的費用。

在不平等加深的背景下，保險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拒絕給風險增大的貧困地區提供保險，或者提高人民的投保費。一般而言，金融業扮演著重要角色，投資於高度投機性的碳市場。例如，它投資於森林，因為森林作為碳聚匯的功能已經商品化。結果，土著人民被禁以生計，其名義是保護自然，而土著人民幾個世紀以來是一直在保護自然的。例如，由於生產生物燃

料和生物柴油，農業領域正在經歷類似的剝削和無產階級化過程。在這方面，保護自然也被用作藉口，以便加深不平等並執行公司統治的政策。

這些資源的商品化和佔用的市場機制，很可能在未來變得越來越重要，產生越來越多的社會不平等。鑒於之前關於地球工程的實施，特別是BECCS所說的，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但更有甚者。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Sir Nicholas Stern）主持的非常有影響力的智囊團‘全球委員會（Global Commission）’有個最新報告，專注於基礎設施在所謂的綠色經濟過渡中的作用。該檔將自然界定義為“基礎設施”，解釋了讓基礎設施對資本具有吸引力的必要性，並得出結論認為，這種吸引力的一個關鍵條件是物業規則的一般化和穩定化。潛在地，資本希望就像納入勞動力（儘管勞動力也是自然資源）那樣納入自然。

你能否談談生態危機與移民之間的關係，以及你如何思考未來的趨勢？

這是氣候變化最可怕的後果之一。如前所述，超過一定的門檻，80億人口的人類就不可能適應氣候變化。最危險的是那些被迫離開他們居住地的人。這一進程已經在若干地區發生，例如在西非，它與戰爭，專政，恐怖主義和跨國公司搶佔土地的影響相結合。在孟加拉，越南和一些小島嶼國家，這個進程也正在發生。逃跑的人做什麼？他們聚集於城鎮的郊區。他們的社會結構受到廣泛的影響 --- 特別是性別關係，婦女經濟權力的喪失。其中一些人，大多是男性，試圖移居富國。如果他們通過旅程而倖存下來，他們會試圖把錢匯給家人。這是一場巨大的災難。

你如何評估在這背景下特朗普的興起？

我給出的1.5°C碳預算的描述，意味著特朗普上臺的時刻，正值我們處於氣候變化失控的邊緣。特朗普在競選期間表示，氣候變化是“中國人”為了使美國製造業失去競爭力而創造的一個騙局，他承諾要退出巴黎協議。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充滿了氣候變化否認者，他選擇的領導環保局的人想要從內部摧毀它，此人曾作為奧克拉荷馬州總檢察長，幾十年來，一直試圖從外面摧毀它。

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擔憂的。我們不支援巴黎協定，也不支援奧巴馬對這個協定的“全民堅定的貢獻”（NDC）：從生態角度來看，兩者都是完全不足的，從社會的角度來看，是完全不公平的。特別是，我們知道巴黎協定（1.5-2°C）的目標與NDC（2.7-3.7°C）的累積影響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就排放而言，2025年這一差距將達到約5.8Gt（58億噸）。為了評估美國決定退出協議的影響，必須知道美國NDC相當於到2025年減排2Gt（20億噸，與2005年相比），而這些2Gt（20億）占NDC中191個協定簽署國的全球努力的大約20%。因此，如果把特朗普的計畫付諸實踐，就意味著，為了不超過1.5攝氏度溫度，美國將在世界各國政府承諾要做的事情與應該做的事情之間的差距58億噸上，再加20億噸。換句話說，就像我之前說過的那樣，因為美國，要不超過2°C是非常非常困難的；沒有美國，這又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認為，全世界的大多數統治階級現在都相信，氣候變化是現實的，是對其統治的巨大威脅，而這種威脅的現實“源頭是人為的”。中國，印度，歐盟等國家的反應表明，這種情況並沒有因為特朗普的當選而改變。甚至沙烏地阿拉伯也確認了其對巴黎協議及“全民堅定的貢獻”

(NDC)的承諾。但美國變卦的影響，如果得到證實的話，那就是其他國家會更不願意來填補這個空白。從這個角度來看，歐盟非常保守的立場很有話說。另一方面，我們應該要求各國政府加大氣候努力：一方面要填補巴黎和NDC之間的空白，另一方面要彌補美國背信造成的損失。在現行資本主義政策的框架下，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它要求進行打破市場邏輯的改革，例如免費的公共交通，公眾支持隔熱建築的意願，支持農民反對農業企業，支持土著人民反對採礦和伐木公司，等等。

誠然，特朗普要實現自己的目標並不容易，一方面，因為部分的美國氣候政策依賴於各州，城市和企業，另一方面，又因為二氧化碳被清潔空氣法案(Clean Air Act)列為污染者。但是必須在更廣泛的範圍內看這個問題。這不僅是特朗普的氣候政策問題，而且是他總體的政策問題。特朗普的計畫是為了對抗美國霸權在世界上的衰落。這也是奧巴馬的目標，但特朗普的方法不同。奧巴馬希望在全球新自由主義治理的框架內實現這一目標。特朗普想通過民族主義，種族主義，性別歧視，仇視伊斯蘭教及反猶太主義的野蠻政策來達到目的。他主要關注資本主義的中國，這個崛起的大國將來可能會挑戰美國。這個計畫會帶來嚴重的戰爭危險，甚至是第三次世界大戰。類似的情況出現過，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大英帝國的衰落和德國的興起，以及希特勒在二戰之前經濟，社會和政治危機的深刻背景下的崛起（我沒有說特朗普是法西斯主義者，這不是重點）。然而，在這種情況下，由於形勢的原因，氣候危機的緊迫性可以被歸為次要問題，儘管統治階級中的聰明人知道事實並非如此。

每一朵雲都鑲有銀色光沿。這種情況的積極方面是，美國的兩極分化不僅有利於右翼，也有利於左翼。婦女進軍運動(Women's March)，
十月評論 2017年 第2/3期

反對“穆斯林禁令”的群眾運動，以及四月二十九日的“氣候遊行(March for Climate)”等，都表明挫敗特朗普是可能的。這個挑戰是巨大的，不僅對美國人民而且對全世界所有人來說，都是如此。在目前的情況下，擊敗特朗普是為氣候而戰的最佳途徑。在所有國家，我們都應該試著跳上美國社會運動的車。美國婦女運動剛剛發起了國際呼籲，要人們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加入她們的鬥爭。這是個榜樣。本著同樣的精神，我們應該在四月二十九日（或二十二日，美國的擁護科學遊行的日子）到處組織為氣候而戰的示威遊行。當然，不是支援巴黎協議，而是提出徹底的生態社會主義要求。

我們生活在一個被人類活動如此深刻改變的世界裡，許多科學家認為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新的地質時代：人類本位紀。你認為在革命性的左派綱領和戰略中，這必會有什麼樣的影響？

這確實是一個非常有趣的辯論。科學家認為，人類本位紀(Anthropocene)起源於二戰後。這是因為只有從那時起，人類活動的影響會導致地質變化，如海平面上升，核廢料，以前不存在的化學分子堆積等。從地質學的角度來看，這不容爭辯：日期依賴於客觀事實。但是，有兩個潛在的社會和政治辯論：推動這一客觀變化的機制，以及綱領和戰略方面的影響。這兩個爭論是有聯繫的。

關於機制的辯論，就是關於人類摧毀環境之原因的辯論。當然，資本主義對這種破壞負有最大的責任：其增長邏輯，抽象價值生產和利潤最大化邏輯，同生態可持續性是不相容的。曲線的指數特徵，顯示了作為時間函數的生態危機的各個方面的演變，它清楚地表明：所有這些曲線（溫室氣體排放，臭氧層消耗，化學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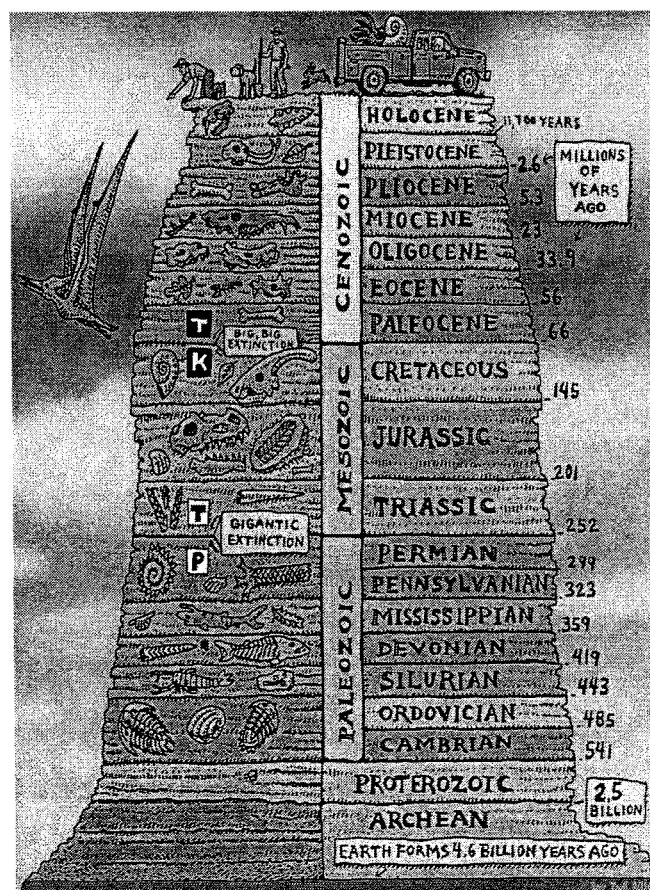
染，大氣氣溶膠負荷，物種損失等）顯示出二戰後出現的拐點。與資本主義長期擴張浪潮的聯繫是絕對明顯的。否認資本主義的重大責任，假裝人類本位紀（Anthropocene）不是資本主義的結果，而是智人（Homo），甚至是智人屬（genus Homo）的結果，這是荒謬的。

但這不是整個故事。在資本主義之前就存在環境破壞，在20世紀的非資本主義社會也存在著大規模的環境破壞。這與婦女所受的壓迫有一定的相似之處：它存在於資本主義之前，延續於所謂的“現存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在兩種情況下，分析的結論都是一樣的：廢除資本主義是婦女解放的必要條件，是人類與自然其他部分之間建立非掠奪性關係的必要條件，而不是充分的條件。在婦女解放領域，這種分析的含義是雙重的：婦女需要一個自主的運動，革命者應該在這個運動中建立社會主義的傾向。在這裡，我們顯然有做比較的局限，因為大自然的自主運動沒法干預社會辯論，這是當然的。

我們應該從中得出什麼結論？有些人必須在社會辯論中代表自然界進行干預。這就是生態社會主義者想要做的事情。因此，生態社會主義不僅僅是一個把社會和環境要求聯繫起來的戰略：它是一個文明計畫，旨在發展一種新的生態意識，一種與自然的關係的新文化，一種新的宇宙觀。當然，沒有人能預先確定這個新意識的內容，但是我認為應該用尊重，關心和謹慎的態度來促成它。我們知道人類有巨大的支配能力。那是我們智慧的產物。但是，“統治”可以從兩方面來理解：一方面，是一種殘暴和佔有的行為，另一方面，是理解，解決難題的能力。我們應該立刻停止對自然第一種意義上的主宰，並試圖實行第二種意義上的“主宰”，因為一個好學生完全理解他們的題目。我們已經造成了很多的破壞，但是如果可能的話，沒有理由不能用我們的智慧來照護自然，重建我

們毀滅的東西。與傑瑞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所說的相反，過去有一些其他社會非常聰明地照護自己的環境，這要歸功於他們對自然非常深刻的瞭解。

總之，我們所需要的不僅是一場社會革命，而且也是一場文化革命。必須立即開始非常具體的行為變化，但這不單純是個人行為的問題；必須促進全社會行為的變化，並將通過具體的鬥爭獲取進展。土著社會是靈感的源泉。我認為小農在這個過程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原因很明顯。還有婦女。不是因為他們對“自然”更敏感，而是因為他們所受的具體壓迫。首先，由於他們生產了80%的食物，女性直接面對自然退化的現實及其後果。其次，由於父權制的壓迫，婦女經常負責家庭內的繁殖工作：這使他們對我提到的三種動力的重要性有了一個特定的觀點：尊重，照顧和謹慎。



什麼是托派？

劉家良

編者按：《明報》2017年11月7日國際版簡要地刊登了托洛茨基的生平和主張：「托洛茨基是列寧領導下的。有人視他為十月革命實際領導人。」

什麼是「托派」？

目錄

- 一、托派是怎樣產生的？
- 二、托派的世界革命政綱；
- 三、托派對中國革命的基本見解；
- 四、托派與抗日戰爭；
- 五、托派為建立一個真正無產階級黨而鬥爭；
- 六、勝利終會到來！

九十三年前，科學社會主義之父——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

「有一個怪物，在歐洲徘徊着，這個怪物就是共產主義。舊歐洲有權力的人都因要驅除這個怪物，加入了神聖同盟。羅馬法王，俄國皇帝，梅特涅，基佐，法國急進黨，德國偵探都在裡面。那些在野的政黨有不被在朝的政敵，誣作共產主義的嗎？那些在野的政黨，對於其他更急進的政黨，對於保守的政黨，不都用共產主義這名詞，作為痛罵的套語嗎？」

今天，九十三年後，我們很有權利將這個怪物來形容托派。所不同的，她不僅徘徊在歐洲，她還踏遍了全球。正因如此，所以不僅歐洲，就是全世界有權力的人，也加入神聖同盟來驅逐她，這個同盟也同樣包括了羅馬法王、法國急進黨、德國偵探。所不同的只是俄國皇帝換了個蘇聯官僚的首腦——斯大林，梅特涅變了希特勒和莫索里尼、基佐變了貝當和邱吉爾，同時還新增了美洲和歐洲的一批新盟友吧了。

舊世界的私有財產的擁護者，不僅爭先恐後的加入新的神聖同盟來驅逐和迫害新的怪物托派，他們甚至拿托派來互相攻擊了。例如中國的斯大林黨人，不消說，是拿托派來攻擊政敵的老手，他們稱一切托派都是漢奸，回頭又罵一切漢奸都直接間接與托派有關。但上海一個道地汪派漢奸的機關報《新中國》也稱斯大林派與托派是一丘之貉。這種論調在許多汪派漢奸的機關報上都可以發現。

事實既已如此，那末我們更有權利抄襲馬克思的兩個結論，只不過詞句上略為更改吧了。

托派已被全世界有權力的人認作一種勢力。托派向世界(包括中國)勞苦群眾詳細說明自己的意見、目的、趨勢，並對抗關於托派這怪物的無稽之談，已是時候了。

我們現在本著這個宗旨，向中國民眾特別來做一番詳細的解釋工作。



一. 托派是怎樣產生的？

了解一個政治的派別，像了解任何社會集團一樣，首先應了解它是怎樣產生出來的。因為任何政派都不是平空產生，都有其社會的背景和階

級根源的。托派當然也不會例外。只有那些最廉價的資產階級學者和政客，才會把托派說成是個人爭奪權位的工具。

我們現在從國際和中國兩方面來說明托派產生的原因吧！

（一） 國際的背景

托派是一個國際黨，並不是一個民族黨，因此，它產生的基本原因必需從國際方面去找尋。目前稍為有點政治常識的人，大概總知道，現代社會的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代表著兩種不同的歷史利益，前者代表私有財產和民族界限，亦即代表歷史之過去，後者則代表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亦即代表歷史之未來。那末唯一能組織國際黨的當然是無產階級。無產階級國際黨過去有過三個，即第一國際，第二國際和第三國際。第一國際經過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手，立定了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基礎，但因為巴黎公社失敗造成國際空前反動局面，這個國際就瓦解了。第二國際繼第一國際而造成各國無產階級黨和群眾組織，並爭取了生活上的改善。但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的第一天，第二國際的領袖背叛了無產階級的反戰立場，投降了帝國主義，第二國際政治生命也就完結了。直到一九一七年，俄國的無產階級在列寧和托洛茨基的布爾什維派(第二國際中的革命派)的領導之下奪取了政權，才又復活了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精神，於一九一八年建立了第三國際。

第三國際(共產國際)是產生在俄國十月革命的基礎上面的，它不僅繼承了第一國際的革命傳統，同時還融化了大戰當中和以後的寶貴的新鮮經驗，這種傳統和觀念通通結晶在第三國際首四次大會的許多決議案中了。但不幸這個新國際既然建立在十月革命的基礎上，它不僅接受了這個革命的好處，同時也受它的弱點牽累。

十月革命的最大的弱點，就是農村破產，工業凋殘，和普遍的貧窮、飢荒。在這個破蔽的國土中，無產階級如果得不到先進國工人的幫助，

不僅建立社會主義，就是長遠的保持政權也是妄想。這即是說，俄國無產階級要想和落後的環境鬥爭，要想把俄國從農業國變成工業國，必須首先促成先進國無產階級的勝利。

但一九一七年以後，國際的革命運動都因為第二國際的出賣，一個一個的失敗了。現在俄國無產階級不僅生活在落後的環境中，同時又陷入孤立環境中了。於是俄國的工人、農民普遍的發生疲倦、失望的情緒，這是革命退潮的現象，這又是群眾的落後思想復活的現象，這種現象在共產黨、蘇維埃政府、工會等機關中到處暴露出來了，於是俄國無產階級內部便產生了分化，有一部份共產黨人公然與農村的資產階級(富農)聯合，主張對資本主義大大讓步(如取消對外貿易獨佔權等)。這一派叫做右派，以布哈林為代表，另一派則搖擺於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間，採取了跳躍不定的盲目政策，這就是中派，以斯大林為代表，這兩派曾長期結盟，形成俄國工農的官僚層，霸佔了工農的一切機關，所有國家的分配權力都落在他們手中，我們剛才已說過：俄國是一個落後的國家，她的工業很不發達，農業則更不用說，生產不足自然影響到分配不足，比方，我們假定俄國每天產生的麵包，每人只能分到一個，這顯然是不夠飽的，那負責分配的人(工會、蘇維埃、黨等機關的上級人員)自然首先滿足自己和自己的親屬，食個飽才把剩餘的分出去。他們就這樣在分配過程中吞沒了無產階級國家收入的大部份，這就是一種不合法的特權，享受這種特權的，就叫做官僚，凡是享有特權的便天然結成了官僚集團，這個集團為了維護自己的特權和利益，為了平服下層工農的不滿，它就不得不維持一個龐大的警察機關(在蘇聯叫做柏格烏)，取消黨、蘇維埃、工會等機關內部的一切民主權利，蘇聯下層人民的口通通被箝制了。但這還不夠，官僚集團為了鞏固它的統治權威，還要進一步騙取國際工人的信任，因此它就篡奪了第三國際的機關了。總之，蘇聯的寄生官僚不僅要犧牲蘇聯人民的利益，同時還要犧牲全世界無產階級

利益來保護它的特權了。這就是近二十餘年來蘇聯國內外形勢日趨險惡，國際革命（包括中國革命）不斷失敗的原因。

但俄國十月革命並沒有白白空過，它的活的傳統關係存在少數先進、最覺悟的戰士心中，歷史往往就靠這少數人開闢道路。他們勇敢的起來和官僚戰鬥了，他們最先起來反對官僚的破壞黨和蘇維埃的民主制度，反對官僚對富農和資產階級的讓步，他們還積極提出俄國工業化的計劃，往後他們又在國際革命的政策上，反對官僚的機會主義和盲動主義。這派人叫做「左派反對派」，又稱為「布爾什維克——列寧派」。他的領袖是托洛茨基，故又稱為托派。托派因為堅決反對蘇聯官僚的國內和國際的政策，遂遭受了斯大林派和右派聯合的殘酷壓迫，一九二三年以後，托派便不斷被開除、放逐、充軍。至一九二八年，她的領袖托洛茨基也被逐出蘇聯了。各國共產黨內的托派也同樣受了開除的迫害。

托派從一九二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整整十年，為什麼自稱為「左派反對派」呢？那就是她認為第三國際還保有龐大的革命群眾基礎，她的領導尚有改良的希望，但等到一九三三年，第三國際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的最大支部——德國共產黨，不經抵抗便投降了希特勒以後，托派便立即宣佈第三國際死亡，宣佈脫離它，同時宣佈建立第四國際來領導世界革命了。往後的事實也證明，第三國際一步一步走上叛變、出賣和鎮壓各國工農的道路，它在法國、西班牙和中國都和資產階級及其走狗聯盟，破壞工農的獨立革命運動。第四國際的產生是必然的，是適應歷史的迫切需要，這個第四國際，就是人人所稱的托派。

根據上面的簡單敘述，我們知道托派(第四國際)的產生是蘇聯和第三國際墮落的結果，它是第一國際——布爾什維主義的真正繼承者，是國際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先鋒隊或參謀部。

(二) 中國的背景

但托派為什麼發展到中國來的呢？上面一段話還沒有解釋到，目前有些政客，為了蒙蔽中國民眾的認識，就妄稱中國托派是舶來品，其實，如果一個政治派別只是一種舶來品，她又怎樣能夠在中國存在了這樣長久？這又怎能引起資產階級那樣大的仇恨和迫害，其名字又怎麼能年年出現呢？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最好是讓我們自己來冷靜的研究一下吧！

中國的托派(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支部)和各國的托派一樣，最先是從共產黨內的鬥爭中形成的。當然，在中國這樣落後的國家中剛剛出世的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本身，還是很幼稚的，他們不僅沒有經驗甚至還沒有力量來了解自己的經驗呢！那麼，他們自身的問題，最初在國際無產階級參謀部（第三國際）內提出來就並不稀奇，共產國際於一九二七年，即一九二五年——二七年中國革命的生死年頭，為中國革命問題引起激烈的鬥爭，亦即是托派與斯大林派的鬥爭，托派認為斯大林派在中國執行的政策，從頭到尾是遷就資產階級國民黨，犧牲中國工農利益的投機政策。它反對共產黨加入國民黨，亦即工農反對受資產階級的政治束縛，而保持工農自己的獨立領導，它要求組織蘇維埃，亦即要求工農有獨立的鬥爭機關，它要求發動土地革命，亦即要求擴大和加深中國革命，讓農民幫助工人奪取政權。這些見解，斯大林派通通拒絕了，結果把蔣介石捧上了台，中國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慘遭失敗。這個失敗証實了托派有先見之明，同時也喚醒了中國無產階級先鋒隊內的優秀份子。一九二七年，第三國際關於中國問題的鬥爭便發展到中國共產黨裡面來。一九二七年之後，在中國共產黨內有一部份人直接承受了國際托派的主張，斥斯大林派為中國革命的掘墓人，他們公開承認革命已告失敗，認定中國工農群眾的當前任務是防守將要失去的陣地，並逐漸恢復已失的陣地，而不是進攻。

因此，他們提出一個過渡的民主政綱（關於這個政綱，我們往後再詳說），準備第三次革命。另一派（斯大林派）則不承認過去的錯誤，甚至不承認革命已告失敗；相反的，他們為了平服中國、蘇聯和各國工農對他們的領導的不滿，為了維持自己的權威，他們居然提出種種荒謬的學說出來，認為中國革命形勢愈來愈高漲，「因此他們到處發動不成熟的暴動，把工人的生命當作兒戲，城市暴動通通失敗之後，他們便轉向農村，企圖在山上成立「蘇維埃」，等到這個幻夢又打破了，農民運動在孤立的環境之下消滅了，他們就又在抗日的名義之下，重新投降資產階級國民黨，他們現在簡直成了蘇聯的外交工具，他們為了蘇聯官僚的利益已公開叛變了中國工農了。

從上面的事實看來，我們就可以清楚了解，中國托派是一九二五——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後的產物，她在中國革命問題上團結和鬥爭起來，她就表現了她自己與無產階級的密切關聯，她站在上次革命的經驗上，把這些問題加上正確的解釋，她就代表了中國無產階級的基本利益，同時也代表了中國民族的利益。正因為如此，托派才能在中國立足了十幾年，才能在中國社會中生了根，才能在思想上逐漸影響了廣大的工農群眾，又才能使斯大林黨和資產階級的政黨驚惶失措，生起「怨托病」來啊！

二. 托派的世界革命政綱

我們已把托派產生的原因說明白了。當然，我們對托派產生的歷史只能這樣簡單的敘述。如果想詳細敘述就非要連帶把近二十餘年的國際革命運動史和中國大革命史也詳細述說不可。這本小冊子的目的不是寫托派的歷史，而是寫它的主張，托派怎樣替中國民族和中國工農謀解放呢？說明這個問題是這本小冊子的主要內容。不過我們已說過，托派不是一個民族黨，是一個國際黨，那末要想深切了解她的中國政策，首先就不能不了解怎樣為世界大多數被壓迫被剝削的工農大

眾謀解放。

簡單的說來，托派改造這個世界的方法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這不是新的發現了，人類前仆後繼為此奮鬥已差不多一百年了，尤其是經過俄國革命的勝利之後，這個名稱已成為婦孺皆知，甚至連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的政治集團也掛上了這個名字了。從希特勒到孫中山都說他們最後目的是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叛賊，雖然已出賣了工人們自己的靈魂，但他們口口聲聲也就是為社會主義，在這種紊亂的情形之下，為了使中國工農明瞭社會主義的真義起見，我不得不進一步把托派關於她的見解介紹一下，

托派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到目前的地步已把整個地球的各部份連結在一起了，連結的紐帶就是商品經濟。現在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過閉關自守的生活，落後國的原料與先進國的商品，輕工業國與重工業國，形成天然的分工，互相補充，互相依賴，印度少不了英國或美國，英國也少不了印度與中國、日本這些輕工業國家，一方面少不了如英美德這樣重工業國，另一方面也少不了如中國朝鮮這樣供給原料的國家。總而言之，現在每一個國家（不管落後的也好，先進的也好）都不是滿足為自己民族，自己的國家而生產，都是為滿足世界市場的需要而生產。這種現象明白告訴我們，資本主義的生產實際上已超出了民族國家的界限，已把這些界限變成歷史上的障礙物。正如它過去在國家範圍內剛剛生長之時，把封建的地方分割主義變為歷史的陳跡一樣了。既然整個地球已連成了一個經濟單位，我們為什麼還要人工地把它割裂，造成許多無必需的，多份還是很可笑的國家界限呢？尤其是我們為什麼還要建立這許多關稅壁壘、海陸空軍，甚至一次兩次的驅逐無辜的人民去為它犧牲生命呢？這顯然是不合理的，但資本家不能不維持這種不合理的現象，因為原來他們的經濟客觀上雖然是為滿足他人而生產，但卻以私有財產為最高手段。有了這個手段，資本家不僅可以預防國內缺乏購買力的廣大窮人起來革命，同時還可抵抗另一群（即

另一國〕資本家的吞併，他們甚至可以利用這個手段來剝削其他人民的利益呢！那末，歸根結蒂資本家維持的不合理現象就是私有財產制度。現在所有破壞人類福利、障礙歷史前進的惡果、戰爭、民族仇恨、恐慌、人剝削人……都造因於這個私有財產制度。

托派從上面分析中，就做出這個天然的結論來：資本主義已造成了包括全球的經濟基礎，我們的任務就是站在這個基礎上把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澈底破壞，換之以「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合理制度。這種制度就叫做社會主義，但要實現社會主義，過去無數的經驗告訴我們，必須經過暴力革命。這個革命就叫做社會主義革命，它的擔當者就是資本主義制度的犧牲者——全世界工農。只要他們一起來，他們就要分別的推翻其本國的資本主義統治勢力，建立工農政府，這個建立的過程當然是複雜的，每一個國家都按照其本身經濟政治文化發展的程度來決定它參加這個革命過程的遲速和繁簡，但雖如此，每個國家的出路仍然是社會主義。無論中國與美國的工農，只要他們在革命中爭取勝利，他們就無法也不應該把革命限制在自己國內，這個革命的潮流就要被推展出去，一直到全世界工農的勝利，這就是說，社會主義既然只能在國際的基礎上建立社會主義革命，也祇能是國際的革命。

這就是托派對社會主義的全部見解，同時也是她的世界革命的政綱，我們就拿這個政綱來做標準，考察一下各種各式的「社會主義」吧！希特勒和孫中山的政綱不是社會主義政綱，它們只是一張保護私有財產的文書。第二國際那些資本主義的奴僕，也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祇是「社會主義的背叛者」，因為他們竟認為資本主義可以和平發展成為社會主義，把社會主義的革命性割除。第三國際自從受斯大林「領導」之後，已用「一國建設社會主義」的學說來代替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原來見解，他們也是社會主義的閹割者，因為他們把社會主義的國際性割除了。

由此可知托派之遭受各國資本家及其奴僕的野蠻迫害不是偶然的，因為這已成了他們的照妖鏡了。真正的社會主義者就是國際革命者，托派的全部世界革命政綱已証實他們是世界革命者的集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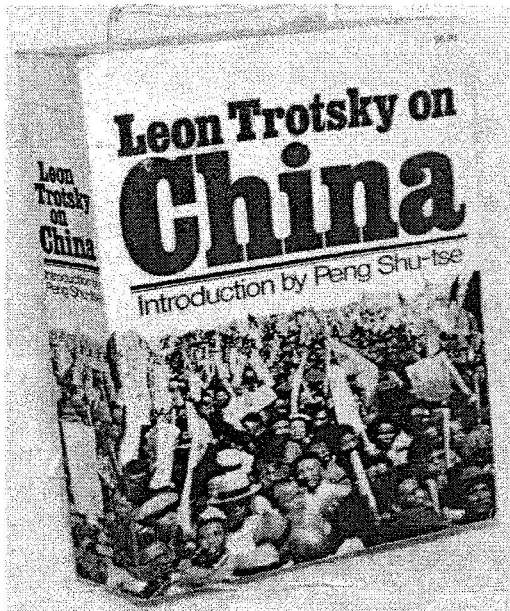
那麼托派怎樣具體的指導各國革命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勸讀者最好去讀一讀「第四國際的過渡綱領」。這個政綱就世界各國不同條件，〔如「民主」國——英美等、法西斯主義國、工人國家——蘇聯、落後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國家〕，分別指出正確的詳細的鬥爭路線。此外，還有一個「反戰宣言」〔一九四零年五月〕，號召各國工農起來反戰，指出在帝國主義戰爭中應採取「失敗主義」的路線。不過，我們在這裡不能逐一評述，我們只能告訴讀者，托派怎樣為中國民族和中國工農謀解放，在底下各節我們就專門說這個問題吧！

三. 托派對中國革命的基本見解

我們剛才說到中國托派產生的背景時曾經得出結論：中國托派是中國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失敗的產物。那末，它的全部政治見解當然也以這次革命失敗的教訓為出發點，一個革命〔不管其結果是失敗或勝利〕不僅最清楚的暴露一個社會的所有弱點，提出所有問題，而且還引起社會的深刻變化〔最主要的就是階級力量關係的變化〕，如果在上一次大風暴似的中國革命，我們還看不清中國的社會性質，中國的諸革命問題及階級力量的關係，我們也得不出半點教訓，則千百個的工農頭顱也空擲了。

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同時也是一個落後的資本主義國家，她因為受帝國主義壓迫，便被牽入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裡面去。但因為她加入這個制度太遲了，不僅世界其他各部份的市場通通給先進國奪了去，就連她自己的國內市場也被人宰割了。因此帝國主義的侵略雖然刺激中國民族工業的生長，但中國的民族工業很快就碰到

重重的障礙，這些障礙的主要根源當然是帝國主義。



（一）帝國主義怎樣扼住中國的命脈？中國「民族」資本和它的關係如何？

自十九世紀中期以後，帝國主義連續舉行幾次鴉片戰爭，用武迫使中國簽訂種種不平等條約，取得無限特權。他們不僅操縱了中國關稅，他們還可以在中國自由傾銷，投資和開工廠。結果他們支配了中國紗廠的三份之二。他們操縱了中國大部份的鐵路投資，全部電力，三分之二的鑛業，大部份的重工業。至於百業之王的銀行資本，他們竟佔了四份之三，從這些粗略的數字裡，你們就可以知道帝國主義在經濟上已完全扼住了中國的命脈，這種情形當然立即就反映到政治上。帝國主義為了維持自己的特權，便把中國劃分為幾個勢力範圍，扶助中國軍閥的割據，近幾十年來，沒有一次軍閥戰爭不是帝國主義操縱指使的。除了助長中國的分崩離析局面之外，帝國主義還極力維持中國封建和一切落後的反動勢力，靠這些勢力來替他們服務。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最初培養了一批買辦，替他在中國傾銷商品開闢市場。後來這些買辦中有些發展了洋財的，便自己經營工業，向外國買機

器來開工廠，第二次世界大戰當中，因為各帝國主義者都被歐戰吸引了去（只有日本是個例外），無力兼顧中國市場，許多買辦資本家便乘機擴大營業，大開工廠，想把中國市場爭回自己手裡，因此便產生了一種強烈的民族獨立要求，我們通常稱為「民族」資本家的就是這種人。

從「民族」資本家產生的過程中，我們就了解他們與買辦資本家的關係多麼密切，同時也可以推想得到他們既然從買辦出身，那末，當帝國主義重新來擊中中國而使他們蒙受極大打擊的時候，他們又或多或少的回到買辦地位。所以如果有人把「民族」資本家和買辦資本家看作兩個敵對的不可調和的階層，是非常錯誤的。這種人一定會把「民族」資本家理想化。

現在我們進一步把「民族」資本家和帝國主義的關係看一看。我們從剛才列舉帝國主義操縱中國經濟命脈的數字就明白，中國「民族」資本家的基礎是很薄弱的，他們沒有辦法購買最新式的機器。他們沒有辦法採用最新式的設備，因此他們生產的貨色往往比帝國主義的商品差，競爭不過。其次，我們剛才已說過中國的關稅不能自主，外國商品納很低的稅，甚至免稅可以運入中國，入了中國的關口，他們又有不平等條約的保障，可以自由暢銷中國各地，免除一切苛捐什稅，因此帝國主義的商品既「物美」又「價廉」。中國的商品雖然用不着入口稅，但在國內傾銷卻反而受重重苛捐什稅的抽剝，因此弄得既「物劣」又「價高」。光舉這兩點就可以明瞭，何以中國「民族」資本家常常被帝國主義的資本排擠，假如碰到恐慌，中國的「民族」資本受打擊更大。這好比小工廠和大工廠的情形一樣。前者總是大大吃虧的。「民族」資本家在不斷的被打擊之下迫得借外債，日甚一日的向匯豐等外國銀行抵押借款。他們始終脫不掉買辦的臭味，原因就在這個地方。

（二）「民族」資本家和工人階級

「民族」資本家受了帝國主義的排擠，一方面在

經濟上反而愈加依賴帝國主義；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補償於廉價勞動的殘酷剝削。因為中國本身非常落後，農村經濟早已破產，流浪待業的人非常多，所以勞動力很便宜。而勞動力愈是便宜，勞動時間愈是更長，資本家的生產成本也愈是低，而得到的利潤也愈是大。結果，中國的民族工業便維持一種最黑暗，最帶封建臭味的剝削制度。你們試到中國的工業區去看一看吧，有那一個國家的工人生活有中國工人生活那樣的悲慘的啊！他們每天做十二十六十八個鐘頭，所得的工資還不够養活自己的老婆子女，而資本家還利用種種機會抬高物價，間接的剝削他們。至於工廠衛生設備、失業保險，養老金等則談也不要談，工人在這種高度的剝削之下，很快就衰老死亡了。但這有什麼要緊？資本家是不愁僱不到工人來填補的，因為中國流浪失業者正多着呢！這件事無意中告訴我們一個秘密：「民族」資本家對帝國主義是力求妥協讓步，對中國工人則連半點的改良都不容許的。這就無怪他們在最後關頭總是聯合前者來反對後者了。

（三）「民族」資本家與農民

中國的「民族」資本家不僅從城市方面取得補償，它還從農村人口方面取得補償。中國的資本家差不多沒有一個人不和農村沒有關係的，或者他們自己本人，或者他們的親屬就是地主。他們就經過這種關係在農村營謀高利借債，用賤價替外商收買原料，又用高價替所謂國貨〔數量很少〕傾銷，同時是利用這些手段〔尤其是高利貸〕來進行兼併農民的土地，現在全國農民竟有百分之五十五沒有土地，土地不足的也佔百分之二十，地主們〔包括城市資本家和銀行家〕則竟佔去耕作它的百分之八十。在這種情形之下，中國農村當然成了一幅最悲慘的圖畫，農民為了謀生不得不租地主一小塊土地，佃租的條件非常苛刻，他們通常除了償付地主百分之四十到七十的收穫物之外，還負擔種種封建式的苛捐雜稅，他們即使可保存一小塊土地，但也不夠維持他們一家數

口的生活，因此他們便長期依賴高利借貸來彌補，永遠變成地主及商人的債權，這種農民構成農村人口的大多數，就叫做貧農。至於靠自己一份田，尚可自供自給的農民（中農），地是朝不保夕的，在旱災、水災、兵災的不斷夾擊之下，他們很快就成為地主商人的債務人，並逐漸連自己的土地也送給他們了，中國農民就這樣成千成萬的被逐離土地和家鄉，變為一無所有的流浪者。他們或者成群的被賣到外洋去，或者當土匪，或者增加軍閥的隊伍，或者變為都市的流氓，只有一部份人僥倖走入工廠，或者當苦力，或成為農村的工人。農民中也有少數人變為富裕農民靠剝削他人維生，甚至繼續爬上了地位，但他們數目很少。而且這種富農對一般貧農和農村工人的剝削，與地主一樣殘酷，他自身就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貸的三位一體。

所謂「民族」資本家就是靠這種農村的無情剝削來積蓄自己的資本。這也使得他永遠仇視農民的鬥爭，永遠站在帝國主義方面來出賣農民了。

（四）自由和權力在誰的手裡？

照上面的情形看來，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只有無情的剝削工農才能生存，絕不能對他們作絲毫讓步的，即使是最輕微，最可憐的改良步驟在中國資本家看來也是一件無可忍受的事情。這樣一來就引起「民族」資本家利益與工農利益的極度緊張的衝突，使中國資產階級在民眾中處於孤立的地位，四面受工農的敵對威脅。一個統治階級人數又少，經濟基礎又薄弱，又遭逢全國大多數民眾的反對，它當然不讓民眾有充分的權利，更不願意民眾起來和它鬥爭。所以中國「民族」資本家一出生就仇視人民的自由權利，因為它曉得廣大人民得到了自由，就無異替他掘墳墓。但資本家願不願意人民有自由權是一回事，民眾自己願意不願意放棄這自由權又是一回事，結果當然引起劇烈的階級鬥爭。事實上，中國近數十年來的歷史就充滿這種階級鬥爭。在全國大多數人民反對之下，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只好依賴於

外敵(帝國主義)的金錢和武力，把全國的貪官污吏、土豪劣紳組織在一起，培養一個龐大的警察機關，僱傭一支龐大的軍隊——組成一個最野蠻的軍事獨裁政府。這個政府的任務就是無間斷的逮捕、監禁、鎗決，活埋工農的戰士，它的「功業」就是一團血污。自國民黨一九二七年上台直到一九三零年，短短的幾年內就有十四萬人被殺，加上以後「剿共」(即屠殺農民)和城市的白色恐怖，這數目就真是驚人了。

「民族」資本家為了自己利益不惜用流血手段來剝削工農民眾的自由和權利，但卻因此保持和鞏固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自由權利。這正是資產階級軍事獨裁的另一主要任務。他們試看「九一八」以來，國民黨那種卑鄙的妥協政策，他因為忙於「安內」(剿共)不惜把國土一塊一塊的讓給日本了。不過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再詳細說。總之「民族」資本家的軍事獨裁就是「民族」經濟的集中表現，一面依賴帝國主義，一面殘酷的剝削和壓迫工農。

(五) 怎樣解放中國，誰來解放中國？

你們憑上面的分析就自然知道：目前解放中國最徹底最迫切的辦法，就是推翻一切帝國主義在華的特權，使工人得到八小時工作制，使農民獲得土地，使廣大民眾得到自由，得到權力，而民眾得到權力的最理想最合理手段，就是召集一個人人有權利選舉和被選，有權利立法和執行法律的國民會議——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除了這種根本的辦法之外，一切都是騙人的空話，不推翻帝國主義的勢力，中國民族得不到獨立自由的發展，不改善工人的生活，不沒收地主的土地歸農民，不給工農民眾以自由和權力，換言之，不改善中國大多數人民的生活，不讓他們自己握有權力，就談不到中國民族的解放，談不到推翻帝國主義。這些任務都是不可分離的。民族的自由解放與民族大多數的人口(工農)的自由解放是不可分離的。但誰能解決這些任務呢？我們已經知道，中國民族不是一個清一色的統一體，其自身

包含三個利益完全不同的階級：「民族」資本家，工人階級和農民，在解決這些任務的時候，每一個階級因為利益不同，態度也就不同。「民族」資本家既然一方面仰賴帝國主義的扶持，一方面拼命吮吸工農的血液仇視他們。牠當然不能滿足他們的要求，因而也不能動員民眾起來堅決的澈底的反對帝國主義，他們不想經過鬥爭，更不想經過工農的武裝來反對帝國主義，他們祇是想藉妥協的辦法，藉奴隸擇主的辦法(投降一方的帝國主義反對另一方)來謀取帝國主義的讓步，而這種妥協或奴隸擇主的辦法不但不能動搖帝國主義，倒還給帝國主義的侵略大開門戶。這種政策當然充分說明他們的反動心理：他們認為在帝國主義的支配之下，還可以分得一杯羹，在工農的覺醒之下，他們的剝削制度和整個私有財產就受到威脅了，因為在進行沒收帝國主義財產的時候，工農是分不清中外資本的，在反對國外剝削者和壓迫者的時候，同時也不能容忍國內的剝削者和壓迫者的。只要了解這一點，我們就了解何以近代中國的革命史充滿了「民族」資本家的叛賣。

農民小資產階級也沒有能力解決這些任務，甚至還不能獨立解決土地問題。因為他們自身就瓦解為數個階層，經濟利益互相衝突，同時農業的落後性、散慢性、地方性也是他們的致命弱點，所以農民的鬥爭始終是組織鬆弛，此起彼伏的，他們始終無法形成一個一貫的政策，更談不到有一個明確政治經濟制度。太平天國運動和最近十餘年來農民暴動的失敗告訴我們，沒有一個城市階級的集中領導，農民是永遠得不到勝利的，農民的地方政權和土地鬥爭的成果必須靠一個中心權力機關來保護。這個中心權力機關不是民族資產階級的軍事獨裁，因為牠根本就仇視工農的。

只有工人階級才有能力、有資格定立一個革命的中心權力機關(無產階級獨裁)來滿足農民的要求，並解決上述的一切基本任務。因為工人階級是近代一個唯一沒有財產的階級，『除了失去一條鎖鍊之外，便沒有什麼可以損失的』，他們

的本身利益就是徹底解決中國目前的一切根本問題，他們自己正想解除中外僱主的剝削，所以能不顧一切的反對帝國主義及其中國的代理人，所以能夠衷心幫助農民取得土地，所以能給中國被壓迫民眾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和權力，又因為它操縱了中國社會的心臟和命脈(一切城市和交通)，所以除了資本家之外，他們是最有組織、最統一、最集中的階級。只有他們方能代替資本家階級，建立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因而工人階級是唯一代表人類未來的階級——是農民的領導者，同時也是開闢人類未來的唯一擔當者。

(六)『工農民主專政』是一個反動公式

以上就是托派對中國革命的基本見解，這種見解是唯一代表無產階級的。至於『民族』資本家的見解不消說，是激頭激尾反動的，他們久已沉醉於『國民革命』勝利，久已將『革命工作』變為屠殺工農的掩飾了。值得我們提一提的就是一種頗為流行的小資產階級學說，這種學說以『共產黨』為代表，他們認為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所以認為中國革命是一個『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完成這一革命的工具是『工農民主專政』，這個『工農民主專政』當然是和無產階級專政對立的。因為它假定工人和農民平等參加政權，即是說，假定工人『暫時』放棄推翻自己的本國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代理人)的任務，遷就農民的『民權革命』，這個政權科學的說來就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政權，不用說，這完全是一種開倒車的幻想。我們剛才已經指出過，中國的『民族』資本家太過於依賴帝國主義和藐視工農，工農在沒收帝國主義財產時，是不能避免連帶沒收中國資本家的財產的，這即是說，中國的革命不能永遠停留在『民族革命』的範圍之內，勢必要不斷的超出這個範圍，走上社會主義革命。那個真正夠資格領導這個革命的就只有無產階級了。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革命，就叫做無產階級革命黨，所成立的政權，就叫做無產階級專政，其任務不僅限於解決一切階級和民主的問題，同

時還要解決社會主義的任務(沒收一切私有財產，有計劃的生產和分配)。

「共產黨」的『工農民主專政』學說的反動性，最清楚的表現在新的『國共合作』中。因為中國革命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中國抗日戰爭是『這個革命之一部分』，『工農民主專政』的公式自然就應大開門戶，加入『民族』資產階級、『革命的地主和軍閥』，擴大而為『民主主義共和國』或『新民主主義共和國』了。

四·托派與抗日戰爭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開始爆發，這次戰爭是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來的一件重大事變，當然不是憑空而來的，可以說完全是上次革命失敗的結果，資產階級國民黨自從叛棄革命之後，便大規模的鎮壓民眾的反帝運動和一切革命鬥爭，對工農及其戰士的屠殺更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而這種鎮壓和屠殺還交織著軍閥的內戰。每一次內戰都大大地破壞了農村生產，把田園變成廢墟，同時還毫不容情的浪費無數國家的財富，回頭來交戰雙方軍閥又把一切負擔加給人民，平空增加了一批苛捐什稅，結果使民眾趨於赤貧化，農民更快更多的離棄土地，全國的經濟生活更趨於破產。這就是資產階級反革命工作之賜。資產階級就這樣戕害中國民族的生機。這無異替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進行殘酷的報復，這無異掃清道路歡迎帝國主義的進攻。日本帝國主義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就在這種有利的條件之下進攻東三省，資產階級國民黨碰到日本帝國主義的進攻，立即採取『不抵抗』的政策自動放棄滿州以後，從『九一八』至一九三七年，在整整六個多年頭當中，資產階級國民黨只是一方面向帝國主義的分贓機關——國際聯盟哭訴，一方面則和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一個和解又一個和解，熱河及冀東都相繼落入日本手中，整個華北也變相的讓棄了，甚至當一部分軍隊自動起來抵抗日本侵略時(一二八)，資產階級國民黨也完全怠工來答覆，

結果連上海也迫得劃一個非武裝地帶，一切抗日運動和要求均遭受殘酷的摧殘，資產階級為什麼這樣幹呢？為的是『圍剿』南方的農民暴動，為的是懼怕工農運動的復興——一個工農的劊子手是永遠畏懼工農的。

這六年來的退讓政策，一方面固然給了蔣介石擊敗江西『紅軍』的機會，另一方面卻把日本帝國主義的野心空前的提高了。這都是讓蔣介石耗竭無限國富動員幾十萬大軍『剿平』農民的武裝，卻確實替日本的進攻掃清了障礙，這就難怪正當江西的農民軍逃入僻遠的陝北之時，日本發動了企圖征服整個中國的全面戰爭。

（一）·中日戰爭爆發的原因

根本上說來，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中日戰爭，當然是一九二五——二七年革命失敗和資產階級反革命工作的後果，當牠把中國工農力量澈底破壞之時，日本帝國主義便不客氣的要吞併中國。所謂吞併中國不僅表示牠要把中國人民淪為牠的第三者奴隸，同時還要表示牠是徹底吞併和破壞中國的民族工業。這即是說，日本帝國主義還要把中國『民族』資產階級連根摧毀。我們祇要觀察日軍每佔一城市之後便盡量接管中國工廠，劫走運機器，便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是不能容忍中國有『獨立』甚至半獨立的經濟基礎的。這件事迫使中國資產階級起來自保。這也是中國抗戰的直接原因之一。其次，自『九一八』以來，中國民眾突然遭受不斷的鎮壓和打擊，但抗日運動始終沒有停止。恰恰相反，牠總是隨著日帝的螺旋式侵略，不斷擴大。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前後，西安的軍事叛亂，北平上海等地的學生示威運動，上海青島的蔓延的罷工浪潮均直接間接與抗日要求有關，甚至各派軍閥也開始在抗日的名義之下發生衝突了，這種壓力成了中國抗戰的第二個直接原因。從這兩個原因看來，可知中國的抗戰從始就反映中國民族解放的要求，而在這個要求之中，包含兩種不同的矛盾的要素。即資產階級的『自保』與工農的澈底解放中國民族的願望，

資產階級為了使整個抗日運動遷就自己的利益，他們能否先獲得一個壓制民眾的可靠的保障，幸運得很，資產階級固然找到這個可靠的保障，即就是共產黨的投降——『國共合作』。共產黨在一九二五——二七年『國共合作』的政策之下斷送了革命，現在經過十年的『國共衝突』之後，又重新成立『國共合作』，重新宣佈放棄階級鬥爭，放棄宣傳自己的政綱，放棄「蘇維埃」，放棄土地革命……總而言之，放棄一切革命的行動和政策來擁護「蔣委員長」，擁護「三民主義」，這種國共合作，無非表示共產黨和國民黨「合作」壓倒一切，違反「三民主義」的任何獨立的抗日鬥爭停止。這便是資產階級放心舉行抗日戰爭的最後一個原因。

（二）·抗日戰爭是進步的呢？還是反動的呢？

深刻的了解抗日戰爭爆發的原因，是我們估計它的性質的先決條件，我們已根據馬克思主義的正確方法，把它的原因簡單扼要的說過了，我們根據這些原因可以做出我們正確的結論來。雖然這次中日戰爭是上次大革命失敗的結果，又雖然這次抗戰是在資產階級的反動領導（國共合作）之下，但這次抗戰既然直接反映着中國民族解放的要求，則這次戰爭無疑是進步的。每一個進步革命家都應該擁護這種進步的戰爭。同時，一個進步的戰爭不僅反映在國內的歷史要求中，同時還反映在國際革命的作用中，一個殖民地要求解放的戰爭與整個國際革命的利益必然是一致的，它自己就是這個革命的要素之一。中國抗戰的目的是抵抗日本帝國主義欲淪中國為殖民地的企圖，這個戰爭的勝利將不僅完成中國的民族解放，同時還直接動搖帝國主義的統治基礎，促進世界革命，並幫助蘇聯十月革命的復興。總之，不管資產階級出於最自私的動機（「自保」），又不管資產階級採用的是最反動的政策，但資產階級的抗戰不僅保衛着它本身的利益，同時也是最蹩腳的保衛着整個民族的利益，因而也盡量促進世界革命與保衛蘇聯的作用——這與蘇聯官僚的抗

德戰爭不僅保衛着自身的特權，同時也是最蹩腳的保衛着十月革命的成果，因而也盡着促進世界革命與幫助中國民族解放的作用一樣，每一個真正的革命家都應根據這一正確的客觀的前提來確立自己的革命態度。

斯大林派——共產黨和各式的機會主義者正是弄不清這次抗戰的原因和意義，結果把資產階級的抗戰行動及其客觀意義與資產階級的反動政策和動機混為一談，他們認為資產階級參加和領導了一個進步的抗日戰爭，所以它在自覺地繼續完成它的「國民革命」，它的動機和政策也是進步的結論，便是「擁護蔣委員長」，「擁護抗戰政府」，「擁護三民主義」，而比較害羞一點的機會主義者則竭力勸民眾不要懷疑政府中途妥協。

一些厭棄鬥爭，以漂亮的空談自慰的極左教派主義者，同樣也不正確的了解這次抗戰的原因和意義，他們也一樣把資產階級的抗日行動，與資產階級的政策和動機混為一談，只不過成了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面，他們認為因為這次抗戰是上次大革命失敗的後果，是在資產階級的自私動機與反動的領導之下的，所以民眾根本沒有起來的可能，而抗戰也只是純粹為資產階級服務的反動戰爭。結論便是：失敗主義！非常有趣的右傾機會主義者以抗戰的進步性「淹沒」或遮蓋了資產階級領導的反動性，極左空談以資產階級的反動政策動機和行動來「淹沒」或遮蓋了抗戰本身的客觀進步性。前者在催眠民眾，後者則以驕傲的態度丟棄了廣大的民眾逃避戰場，而兩者的作用一樣幫助了資產階級，同時也幫助了日本帝國主義者。

（三）·托派的抗戰政策

托派一開始便根據上面的正確分析確定了它對這次抗戰的基本態度，擁護抗戰，反對資產階級的反動政策，更具體的說，它一方面在軍事行動上支持國民黨的軍隊，一方面依然積極的反對國民黨的反動政策和行動，在抗戰過程中，一

步一步的向民眾暴露它，教育民眾，喚醒他們，提高他們的認識和政治覺悟力，發展他們的鬥爭，把他們組織起來，準備充分的力量，推翻國民黨——蔣介石政權，把抗戰的領導權握在工農政府手中，這次的抗戰才能從不斷的失敗轉上一個勝利的民族革命戰爭。從這個基本的態度和政策出發，托派便向民眾貢獻了一個最澈底的抗戰政綱，它認為實施這個政綱是抗戰勝利的先決條件。

第一，托派要求立即沒收日本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財產，取消它的特權和租借地。

第二，托派要求立即沒收全國地主的土地，分配給農民及抗日士兵，因為農民佔全國人口之大半，不動員他們起來，抗戰勝利是不可思議的，但不澈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動員他們起來也是不可思議的。不僅為了動員農民，就是為了解決戰時的糧食和原料問題，也非把土地分給農民們不可，而分配土地給抗日士兵，則直接可提高他們的作戰犧牲精神，因為農民和士兵們都深深感覺得保衛國土，就是保衛自己的土地。

第三，托派要求澈底改善工人的生活，實行八小時工作制。實行八小時工作制不僅可以提高工人的戰鬥心，還可幫助解決失業問題。其次為了預防資本家任意抬高物價，間接剋扣工人的工資，托派又要求按照物價增加工資，這就是說，工資的增加應依照物價的增加而增加，這是保障工人生活的澈底要求，因為如果工人們像以往一樣只是要求增加工資，結果資本家只要抬高物價便可以抵消了。再次，因為戰時資本家往往為自己利益，任意操縱生產，不是故意囤積商品、原料，就是以惡劣的生產品拿來賺錢。這不僅影響民眾的生活，同時還影響抗戰。因此，托派又直接提出工人監督生產的要求，由工人自己來監督工廠的原料和生產品之分配，監督資產階級的資本和利潤。換一句話說，由工人自己來提高戰時生產力。

第四，托派要求由一切消費者——工人農民學生管家婦等組織物價委員會，共同監督和規定糧食和一切日用品的價格，同時還規定房租，因

為戰爭是促進投機事業的滋生地。資產階級當然利用戰爭所做成的種種破綻(如交通不便,生產不足等),蓄意囤積居奇,抬高物價,抬高房租,靠資產階級及其政府來消滅這種現象完全是一種夢想,只有被犧牲的消費者本身組織起來,才能打擊一切戰時投機。其次,托派還要求徵收財產累進稅,及沒收一切漢奸奸商和投機家的財產充作戰時經費及救濟難民貧民。

第五,托派要求澈底武裝工農民眾。如果一個民族解放戰爭,把構成整個民族大多數的民眾排出戰爭之外,純粹靠僱傭軍來作戰,這完全是不合理的。一個落後的國家要戰勝一個比較先進的國家,只有靠武裝民眾參加的革命戰爭才有可能。俄國十月革命已給了我們一個很好的教訓,一支新生的工農軍隊可以肅清內亂,打退一切帝國主義的圍攻。不錯,國民黨也假裝武裝民眾,他久已下令徵兵和抽壯丁。但這種辦法完全是拉伕式的強迫徵募,毫不尊重民眾自己的意願,更不關注他們的利益,所以托派反對強抽壯丁,要求工農的武裝要由民眾自己的組織來監督,並應由工農自己選舉教練官,經費由政府負擔。

第六,托派要求給民眾以一切抗日自由,並恢復民眾一切組織(工會農會等),民眾沒有發表意見的自由,沒有把意見印在紙上的出版自由,也就表示民眾沒有批評資產階級政策和提出自己政策的自由——這無異叫民眾眼看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眼看資產階級把自己出賣而不准出聲。民眾沒有集會和組織的自由,民眾沒有團結的自由,也就表示群眾沒有集合力量來保衛他們自身和中國民族利益的自由——這無異叫民眾束手匍匐於敵人進攻屠殺之下。

第七,托派要求軍隊民主化,要求兵士有成立兵士委員會的權利。中國資產階級軍隊純粹是一種僱傭兵,他們過着一種野蠻的文盲的貧困的生活,並為一種極端嚴峻的軍紀拮据着。尤其是上級軍官們都是一些生活糜爛和無能的專制者,國民黨軍隊分明以最尖銳的形式反映着階級的矛盾。而這種充滿緊張的矛盾的軍隊是最經不起

反帝戰爭的。兵士們因為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懷着莫大的仇恨,已不是一切自動的發揮他們的神奇戰鬥精神(如「一二八」十九路軍抗戰及目下抗戰中的許多表現)。但這種精神往往為長官們的叛變,臨陣逃脫,無理壓迫等窒息了。為了解放兵士的創意力和戰鬥力,必須讓他們有自己的組織、有自由選舉和撤換長官、決定作戰計劃等權利。

第八,托派要求與蘇聯及全世界一切弱小民族和一切被壓迫人民建立革命的反帝聯盟,反對資產階級的秘密外交,反對與任何帝國主義成立任何秘密的軍事同盟,因為這種同盟只能把中國從一個虎口送到另一個虎口。

第九,托派要求立即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會議解決國家的一切重大問題,並批准人民的一切革命行動。中國民眾忍受國民黨的軍事獨裁太長久了。他們在抗戰中受它的壓制和摧殘也太利害了。而抗戰本身之所以遭受不斷失敗,主要的是國民黨的罪過。民眾要想得到解放,要想進行一個勝利的革命戰爭,必須召集國民會議來代替國民黨的軍事獨裁——抗戰的領導權必須從資產階級轉到工農手中。

除此以外,托派還為廣大的淪陷區工作貢獻幾條特別重大的見解:

一、她認為動員廣大的淪陷區的人民起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其工具——汪派漢奸政府,是個非常急迫的任務。在淪陷區中動員農民起來的最有力口號是沒收漢奸地主的土地,因為淪陷區的地主已毫無例外的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工具。其次便是反對漢奸收捐稅,沒收漢奸奸商的財產,成立農民的游擊隊及抗日軍,抵抗偽軍。

二、組織工人的秘密組織,發動罷工怠工和一切打擊日軍行動的鬥爭。當然,在淪陷區中發動工人鬥爭和組織工人都是非常困難的,因為都市是日軍統治最強的地方,同時也是最恐怖的地方,但即使在此種環境裡,工人仍然證明是能夠鬥爭的。上海閘北、虹口、楊樹浦的工人仍然不斷的發出行動。而且不僅在英美的廠內,甚至還

在日帝漢奸區，因為跟着工人的鬥爭無法完全遏止，所以也進行組織一些所謂工會來籠絡工人，為了對付這些漢奸工會，托派直接提出「打倒漢奸工會」的口號，但如果某些場合漢奸工會居然騙取了一部份落後工人甚至或已騙取了不少工人群眾，則驅逐漢奸工賊出工會，又成了一個有力的口號了。

三、在日軍中進行反戰反帝國主義的革命宣傳，鼓吹中國革命士兵聯歡，以同樣的革命的宣傳瓦解漢奸軍隊，組織工農的真正民主化的抗日軍。在日軍及偽軍中進行革命的宣傳是件非常重大的工作，因為這些軍隊本身也是由日本和中國的被壓迫工農構成的，他們之參加掠奪戰爭，一半是被迫，一半是受欺騙，我們如果不發展這些軍隊內的階級鬥爭，不刻苦耐心向他們進行革命的鼓動和教育，使他們了解我們，就無法順利的擊潰日本帝國主義。當然，如果中國本身不爆發蓬勃的革命運動，如果中國工人、農民和兵士自身得不到解放，一句話，如果中國的階級鬥爭不發展，要想瓦解敵人的軍隊也是辦不到的。革命的宣傳只是革命行動的輔助工具。



我們已概括的把托派的整個抗戰政綱敘述過了。這個政綱事實上也只是把他們原來的主張適用到抗日戰爭的局勢中吧了。無產階級的戰爭政策是其階級政策的延長和尖銳化。同樣的道理，國民黨與斯大林黨的戰爭政策也是他們底資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政策的延長和尖銳化。

（四）·托派對國共合作的態度

我們剛才已指出過，資產階級一開始就毫不放鬆的把抗戰的領導權握在自己手裡，竭力把抗戰限制在自己設定的範圍內，遷就它自己的階級利益，光是這幾點就可以証明中國的抗日戰爭並沒有取消階級鬥爭，恰恰相反，倒還使階級鬥爭更尖銳起來了。我們就更具體的看一看資產階級怎樣鎮壓工農的階級鬥爭吧！

一、資產階級國民黨因為害怕動員工農，所以自始至終只是靠它的僱傭軍隊在抵抗日本的侵略，而這種軍隊在腐敗和專制的軍官率領之下孤立作戰，只能不斷打敗仗。

二、資產階級有系統來破壞民眾的鬥爭和組織。本來在抗戰初期，群眾受戰爭的刺激產生了不少的抗日組織，並且進行了不少的抗日鬥爭，但資產階級最先狡猾地成立一個「抗日後援會」及類似的官辦組織，把一切自發的抗日團體加以收編或解散，等到群眾的任何獨立鬥爭被它壓制之後，國民黨便愈來愈兇殘的對付一般群眾領袖和戰士，尤其是對付青年戰士。集中營、勞改營、監禁活埋……一切殘酷的手段都用出來了。

三、資產階級把全部戰爭的損失轉嫁給工農民眾。在抗戰期間，不僅工農得不到什麼實際利益，且還得不到公平的分擔損失。巨額的軍費均由種種變相的苛捐什稅來抵補了，如救國公債，救國捐，飛機捐，難民捐等。這些苛捐什稅都落在平民大眾的頭上。至於戰時所產生的一切困難如運輸不便，生產不足，工廠農田受破壞等也要分落在平民大眾身上。因為資產階級都乘機以囤積居奇抬高物價、買賣外匯、濫發貨幣、延長工作時間、剋扣工資等方法、直接間接的加倍向工農大眾剝削。他們不僅已取得補償，甚至已空前發了「國難財」了。現在每一個人都知道，政府要人們(尤其是蔣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都有大筆外匯存放在外國銀行裏。

四、資產階級以加強軍事獨裁來答覆民眾的民主要求。蔣介石利用抗戰的名義，進行把一切異己勢力壓平！他不僅槍決和削弱一切異己

的軍閥，他還以極集中，極嚴峻的警察和憲兵的力量監臨在工農的頭上，頒布無限期的戒嚴令，用死刑來對付罷工，擴充「法西斯」藍衣社的秘密組織；另一方面他又狡猾地成立一個所謂國民參政會，網羅一些無恥的政客來替他歌功頌德，粉飾他的猙獰面孔。

五.資產階級既然自絕於人民，他便愈來愈密切的投降英美帝國主義，不僅希望靠他們來反對日本，而且還希望聯合他們來對付中國人民的革命威脅。結果國民黨一方面在抵抗日本的侵略，另方面卻在歡迎英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在經濟政治上逐步成了她們的附庸，所謂A、B、C、D運動就是這個意思。

光是根據這幾點主要的事實，你們能說資產階級在抗日也放棄了，甚至緩和了階級鬥爭嗎？任何有革命良心的人、任何被壓迫民族都一定齊聲答覆一「不」字的，但居然有個自稱為「共產黨」的斯大林黨告訴我們要「階級調和」「勞資合作」，並居然把這個荒唐的「格言」寫在黨綱上。結果他們與國民黨結成一個聯盟，這就是有名的「國共合作」。

但「國共合作」本身就消極的承認了階級鬥爭，資產階級國民黨與「無產階級」的「共產黨」合作的條件是「共產黨」取消蘇維埃，把紅軍改為國民黨的僱傭兵，放棄城市和農村的階級鬥爭，放棄共產主義的宣傳，贊成三民主義，統一軍權，擁護蔣委員長和國民黨政府。這些條件就是在政治上完全解除「共產黨」的武裝，要它無條件遷就和屈服於資產階級利益。那末，所謂放棄階級鬥爭，所謂「階級調和」或「勞資合作」或「國共合作」，並非真正調和階級鬥爭，只是「統治階級」接受了「共產黨」的投降，並經過它來屈服於對工農被壓迫階級的統治，統治階級並沒有放棄階級鬥爭，只是藉共產黨的「合作」，把他鎮壓掉罷了。在抗戰期間，資產階級之所以順利地幹着上列的反革命工作，正是「國共合作」帶來的結果，民眾中每一種批評政治的聲音，每一種獨立鬥爭的表現，通通「在破壞統一戰線」

的名義之下，被「國民黨」和「共產黨」壓服了，每一個罷工，都在「勞資合作」的名義之下，被「共產黨」出賣破壞了。但有一件事非常有象徵意味的，那就是：每當「共產黨」壓迫任何一種階級鬥爭的時候，它總是加上一頂托派漢奸的帽子，這即是說，凡是主張階級鬥爭、批評資產階級政策的總是托派漢奸，那末，「共產黨」的「國共合作」政策又消極的證明“托派”是唯一能堅守工農的階級利益和立場的。

事實上，托派從頭至尾的指出「國共合作」是工人抗日鬥爭的絞索，並堅決的反對這種「合作」的一切反動政策和行為。但托派並不因此反對聯合戰線，恰相反：托派一貫就主張在抗日的軍事行動上與任何抗日黨派和群眾組織成立聯合戰線。托派的聯合戰線與國共合作的唯一不同就是：她並不因為和別人合作而放棄了自己的政綱和宣傳自己政綱的全部自由。她和任何黨派合作只是在行動上的合作，並非政治上的合作，因為她很懂得自己是代表無產階級的，別的黨是代表剝削階級或半剝削階級的，兩種政綱和政策固然也代表完全不同的階級利益，根本談不到調和或合作。如果要和資產階級黨在政治上聯盟，只有像共產黨一樣澈底放棄自己的政綱，犧牲工農的階級利益才有可能，因此殖民地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只能在行動上的聯合共同抵抗帝國主義，這即是說：無產階級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提出自己的口號，來參加資產階級的反帝行動。托派的武裝隊伍可以和國民黨軍隊共同接洽，規定共同攻守的計劃，無產階級黨影響的工會或任何群眾團體可以和國民黨的黃色工會共同接洽，甚至成立一個臨時的協定，規定共同組織工農，共同募捐，共同罷工、示威、監督物價等實際任務。但聯合的雙方不能干涉他人的工作方法，更不能要求他人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或政治批評。這就是托派所主張的真正聯合戰線。每一個政黨都可以在這個聯合戰線的過程中，自己宣傳鼓動自己的政綱，暴露和批評別人的政綱和行為，這就叫做「分別進軍共同攻打」，目標是一致的，大家都

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但每一個黨由於其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攻打的方法也就不同。群眾將贊成那種方法呢？那最好讓他們在實際鬥爭中去選擇。我們不幻想任何階級會自願放棄自己的利益。誰是真正徹底反帝國主義的，誰的利益就自然得到勝利，階級利益只有階級鬥爭才能決定。

托派這種正確的聯合戰綫主張當然被資產階級仇視，但最奇怪的就是自稱「無產階級先鋒隊」的「共產」黨也對之深惡痛絕起來，他們稱此種主張為「陰謀破壞抗戰」，為漢奸理論。它的意思是明顯的，托派的聯合戰綫是陰謀損害資產階級的，為揭露「共產」黨投降的「毒計」。但不幸幾年來鐵的事實卻一步一步的證明托派主張之正確，暴露「國共合作」之破產。假如說國共合作是消極承認了階級鬥爭，「國共摩擦」與「新四軍」事件卻積極的証實了階級鬥爭的尖銳化了。儘管「共產」黨以「國共合作」為榜樣，忠心幫助國民黨去「調和」(即欺騙和鎮壓)階級鬥爭，但資產階級國民黨現在最後卻要它的工具——「共產」黨償付自己的頭顱來完成資產階級的鬥爭工作了。換句話說，「共產」黨幫助資產階級壓毀群眾的革命力量之後，資產階級便把共產黨當作贅物，當作炸乾了的檸檬來踐踏了。「調和」階級鬥爭自身也成了階級鬥爭的犧牲品。這是千古不移的定律。西歐的社會民主黨一生調和階級，卻不止一次成了法西斯的犧牲品。斯大林——共產黨的收場只不過給我們一個更新鮮的實例吧了。

(五)·托派對抗戰前途的估計

目前全部的局勢是這樣，資產階級反動政策(利用「國共合作」一面壓制民眾，一面投靠英美)已把大半個中國喪失掉，全國的海岸線，主要交通線，工商業大城市和大半富庶沃野通通落入日軍手中，資產階級統治基礎日益狹窄，有一部分資產階級地主明目張膽投降了日帝，形成了一個對抗的南京漢奸政權，在這種情形之下，貪

官污吏、土豪劣紳、地主，軍閥以及整個資產階級及其政府都以更殘酷、更無恥的方法來剝削工農，而非人的經濟剝削又必然的伴以非人的政治迫害，結果「自由中國」充滿了不自由和黑暗的集中營，屠殺和監禁。這一點，甚至一貫充當資產階級工具的斯大林黨也公開承認了，為的這種恐怕已打到它自己的頭上來，資產階級的經濟基礎狹窄，它愈害怕民眾，它就越是明目張膽的投降英美帝國主義，把中國從日本的虎口送入美國的虎口。這就是目前中國及其抗戰的危機。但局勢並非完全無望，中國的命運尚未最後決定。中國究竟從半殖民地的地位變成日本或美國的殖民地，抑或變為蘇維埃的中國，這個問題歷史尚未做出最後的答覆，但近日的日美戰爭，當然是日美兩個強盜爭奪太平洋(主要是中國)霸權。中國的命運無疑的將視這次大戰的後果決定。如果帝國主義戰爭得不到世界革命干涉，則不僅中國就是蘇聯和全世界工農的命運也不堪設想了，但這是最可疑的前途。我們認為在這次大戰中，世界革命爆發的條件比之上一次大戰完備得多了。我們有非常強烈的信念，認為這次大戰爭將會由世界革命的火焰來消滅，中國甚至蘇聯民眾的力量之所以陷於麻痺狀態，主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處境孤立，只要下一階段革命的火焰在地球的任何一個角落蔓延起來，中國和蘇聯民眾的活力就會立即甦生，改變全般局勢。正因為如此，所以今天中國的抗戰雖然在資產階級和斯大林黨的叛變之下，變成奄奄一息，而且表面彷彿無望，但只要這個鬥爭本身尚存在，只要中國尚不完全淪陷為任何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我們還有勝利之希望，我們還沒有任何理由放棄我們的鬥爭陣地。帝國主義大戰臨近太平洋，這就表示中國已臨近最艱難的決鬥時機了。誰要想勝利就不要於危難之中宣佈局勢無望，束手待斃。臨陣逃脫也就是不戰而自動屈服，這實等於一種最可恥的叛賣。

目前損害中國民族的光榮遠景的有兩種傾向，一種認為中國的命運應與英美帝國主義之命運聯繫起來，結成「民主陣綫」來對付日本，英美

戰勝日本，中國就可解放了，甚至如孫科所說：「中國將成為四大強國之一」了，從這種奴才思想出發，人們現在極力在鼓吹所謂 ABCD 運動，把帝國主義強盜戰爭粉飾為「民主反侵略」或「反法西斯」的戰爭。臨近的日美戰爭分明是爭奪中國的戰爭，人們也故意把它說成為美國主持正義或援助中國抗戰的戰爭，甚至還希望這個戰爭儘早爆發。這種傾向以資產階級國民黨為代表，並且欺騙了廣大的群眾，而相信一群以掠奪為生的帝國主義強盜，換一句話說，他們因為害怕民眾而自甘把中國帶到英美帝國主義的屠場中去，並希望中國可以在屠刀之下得到解放。這全是說謊，最無恥的說謊！在日美強盜戰爭中，只有中國民眾的革命力量才能解放中國，否則中國祇會變成日本或美國的殖民地，國民黨和斯大林派的傾向政策正是把中國推向美國殖民地的深淵中去。人們也許只答覆我們說：即使做了美國的殖民地，也比做日本的殖民地好呀！是的，這正是資產階級的結論。當它把中國民眾迫入死巷和絕望中，它就進一步拿這種思想來催眠民眾了。對菲律賓的手段不是比日本統治朝鮮的手段更「文明」麼……總而言之，資產階級認為做一個闊綽的富家奴比較做一個窮的富家奴賺得更多外快，享受更多「文明」「自由」和「民主」。這就是中國資產階級的中心思想。但這不僅是一種毒害的思想，同時還是一種愚蠢的幻想。美帝的「文明」是建築在雄厚的經濟力量和肥厚的利潤上的。但美帝征服全世界的野心，卻迫使她在這次戰爭中要進行龐大的、可怕的消耗戰，即使假定美帝得到最後勝利，她也只能在地球的廢墟之上來慶祝她的勝利。戰爭不僅消耗了她的敵人，甚至消耗了她自己的財富，她將成為窮兇極惡的絕望的勝利者，她將繼續進行無間斷的戰爭和屠殺，來榨取殖民地和征服殖民地民眾的血汗，笑嘻嘻的「民主」將變成猙獰的「獨裁」，「文明」將變成「野蠻」，闊綽將變成可恨的「吝嗇」，中國的美麗的幻想將變成一場惡夢。

另一種傾向則認為抗戰已被或正被資產階

級完全轉變為美國對日作戰的工具了。日美戰爭爆發或甚至現在，在日美戰爭之前夜，中國抗戰的進步性要被帝國主義戰爭的反動性「抵消」了。因此中國實際上已經淪為日美兩種勢力支配的殖民地，蔣介石與汪精衛只各自成為美日的工具，中國的解放只有待於另外創造一個抗戰了。這種理論在德蘇戰爭之前夜，日蘇協定之前後，主要因斯大林——共產黨發揮出來，在革命的隊伍內也開始得到回聲，不過斯大林黨尚未做出應有的確認，就又因為德蘇戰爭回到昨天的立場，趕快宣佈忠誠的支持這個無望的或必然變真的抗戰了，這個應有的結論只好由一些不受蘇聯外交支配的人們做出來，那就是：「反對資產階級及其反動戰爭」，實行「失敗主義」。雖然這種思想已因為德蘇戰爭的爆發和蘇聯外交的轉變，失去了重心了，但這種思想的錯誤和有害，仍值得我們注意和批評。這種思想的根源，一半是由於日蘇協定，因為當時斯大林既然在西方不惜任何代價與希特拉妥協，他在東方也想犧牲中國來買好日本，而中國共產黨也勢必要為蘇聯外交作辯護，結果加深了國共摩擦。共產黨準備應付最後的衝突，遂做成一種不利於國民黨的輿論，把一切抗戰失敗之罪惡諉之於國民黨，並以表面似乎很左的口調宣稱反對參加「帝國主義戰爭」，指國民黨參戰就是把中國抗戰變為「帝國主義戰爭之一部分」，而其實骨子裡這種輿論卻在掩護日蘇協定，掩護共產黨之退出中國抗戰。這種思想卻正與小資產階級的悲觀和幻滅情緒相配合，這也就是它的另一半根源。我們記得在抗戰初期，一般小資產階級份子對抗戰和國共合作均抱了瘋狂的樂觀和幻想，但不幸「國共合作」卻把大半個中國喪失掉，時間還一步一步的給「自由中國」帶來集中營恐怖、經濟破產和沒落。最壞的是世界大戰的可怕雷聲又响到太平洋來了，黑暗又加上黑暗，於是一切都變成悲觀、幻滅了，在絕望之餘就只好哭泣和咀咒，把一切統治者把整個社會都加以口頭上的懲罰，用「術語的恐怖」來安慰不安的靈魂，用「失敗主義」和簡單之否定來

報復自己所幻想過和擁護過的資產階級及其抗戰，一切都無望了，抗戰，哼，什麼抗戰，鬼才曉得這是什麼抗戰！它早已完結了。我們所理解的全不是這種醜惡的現實，假如我們昨天支持它，把中國弄到這個地步，我們就讓用「失敗主義」懲罰一下了，這就是一個絕望的小資產階級的哭泣聲，咒罵聲。他們就這樣從機會主義的幻想，跌入期望的深淵，資產階級的讚美歌突然變為極左，極激烈，極漂亮，零帶淚泣和傷感的呼號。這就是在決鬥之前的狼狽的逃脫和潰退。

中國的工農要想在臨近的決戰中得到勝利，他們首先就要戰勝各種毒害思想，思想的解放是物質解放的前提。

五、托派為建立一個無產階級政黨而鬥爭

托派已貢獻了一個精確的政綱。但是一個政綱還不足以保證革命勝利。我們必需有一個能夠運用這個政綱的黨。所謂黨並不是一個隨便結合的團體，它是由無產階級中最優秀、最聰明、最富戰鬥經驗、最有犧牲精神的先鋒份子構成的。這些份子不僅正確的了解無產階級的歷史任務，而且還以最聰敏的戰略領導每一群眾鬥爭，一直走上奪取政權。她經得起失敗；她能夠從失敗中學習，所以它也能勝利。總而言之，黨就是一支無產階級參謀部，她的黨員就是無產階級的軍官。沒有她，無產階級就等於喪失了一個指南針，就有迷失方向、撞入死巷之虞。但有了一個不勝任的壞參謀部，也同樣招致災難。最近二十餘年來國際革命運動已証明，沒有一個好的領導，沒有一個好的參謀部或黨，無產階級革命是命定要失敗的。第二國際不用說，就是第三國際也以喪失了無產階級參謀部的資格，她的能力只在把革命引向失敗方面去。中國無產階級就是最切身的嘗受過它的「領導」。一九二五——二七年，她把中國工農引導到資產階級的屠刀之下，把國民黨捧上了台。一九二七——三六年，她又用冒險的暴動方法，把無產階級的殘餘精華糟塌完盡，同

時又把農民運動從江西帶到僻遠的陝北，不久就把這個運動慷慨地賣給國民黨，為的是交換一個新的「國共合作」，而這個新的「國共合作」，則把中國抗戰引導到目前這條絕路中。總之，第三國際給中國無產階級的領導只是一個災難又加上一個災難。這件事最雄辯的証明，中國無產階級要想勝利，必需創造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黨。這是中國革命的生死問題。

但是，建立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黨也不是一件輕易的事情。因為一個真正的革命黨除了具備一個革命政綱之外，還必需建立一個健全的黨制——民主集中制。

我們知道，黨的中心任務是領導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為了達到這一步，黨必需有一個正確的領導。要想得到正確的領導，只有充分反映無產階級的利益才有可能，而充分反映無產階級利益的唯一辦法，就是給予每個黨員以發表意見、批評黨政策、撤換和選舉黨領袖的自由，每個黨員都是黨在群眾中的觸鬚或耳目，黨只有經過他們才能了解群眾的真正狀況，亦根據這些來規定、修正或考驗自己的領導，因此黨內民主是可以保證黨得到一個正確的領導，不致墜落。第三國際墮落之第一步就是窒息黨內民主。但黨的社會成份不一，每一黨員反映的意識也未必一律符合於無產階級的利益，有些黨員反映無產階級中的落後見解，有些則甚至反映小資產階級或資產階級的輿論，黨內民主只是受黨外的實際階級鬥爭的尖銳反映，假如我們在每一次實際階級鬥爭中，必須做出結論，我們也不能讓黨成為一所永無了結的俱樂部，我們必須把大多數的意見集中起來作成結論，並把這個結論作為即時行動的指標。推動全黨黨員繼續作戰，並在作戰時，少數必須服從多數，這就是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

一個官僚主義的領導必然取消黨內民主，但取消了黨內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就成了官僚的集中制了，即只是依照上層領袖的意志下命令，而絕對漠視下級黨員與群眾的意見了。但這種官僚的集中制也不是平空而生的。例如斯大林黨就

是這種制度最典型的代表。這種制度也有她的物質基礎。第三國際的官僚集中制建築在蘇聯官僚層的利益上，這猶如第二國際的官僚主義，建築在貴族工人的利益之上一樣。資本主義國家的無產階級中有一部份人受了資本家賄買，享受了一般工人所不能享受的特殊利益，他們為了維護這種非份的利益，便錯誤地使用官僚集中辦法把持了工會，把持了黨，犧牲了廣大下層工人的利益。蘇聯雖是一個工人國家，但因為生產落後，分配不足，負責分配的上層份子，便取得了優越的特權，犧牲廣大民眾的利益而滿足一己之慾望，而保持這種特權之唯一辦法，就是採取官僚集中制，用嚴峻的命令和警察的力量來消滅黨員的不滿和呼聲。官僚集中制是無產階級寄生蟲的自保制度。

官僚集中制培養了一種極端的無政府主義——自由主義思想，這種思想把一切官僚集中制的惡果歸咎於「集中」，因而連帶仇視了布爾什維克的民主集中制，他們甚至認為斯大林的官僚制度是布爾什維克黨的當然結果。其實，仇視「集中」已成為一切沒落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共通特色，他們在資本主義集中的無情規律之下受了托拉斯、辛特加的排擠，而趨於破產和沒落，他們便滿腹牢騷的反對「集中」，在政治領域內，他們又碰到法西斯主義，波拿帕特主義，斯大林主義，這些極度專橫的官僚集中制，他們的脆弱感情受傷更深，對「集中」的仇視也更大，他們不求甚解，不願也不尋求一切事物的真理，只是抓著事物的一些皮毛類似，便覺滿足。他們的理論是什麼？是一種無限制的民主的天國，在這種玄虛的幻想之下，他們仇視紀律、仇視嚴肅的態度、仇視集體的行動、仇視領袖、仇視領導機關、仇視黨，甚至仇視黨的大多數意見，他們把一切都歸於官僚集中的範疇之內。

但社會的發展不是這些吉訶德先生所能攔阻的。資本主義經濟的集中並不因為小資產階級的哭泣而停止。經濟集中使一切社會生活更趨系統化集中化，因而使一切社會的力量也集中化了。

資本主義的集中規律，集中了資本家的力量，同時也集中了無產階級的力量。假如說法西斯主義是資產階級反動力量極度集中的體現物，必須以集中的力量來對抗集中的力量。無產階級黨是無產階級力量集中的最高表現。它經常在鐵的紀律之下作戰，並曾經在俄國表現奪取政權之一幕。在階級鬥爭中，無產階級的集中是一種進步的因素，沒有集中的「民主」，則是一種違反歷史規律的小資產階級反動思想。

「沒有內部的民主——就沒有革命的教育。沒有紀律(集中)，就沒有革命的行動」。沒有真正黨內民主集中制，就沒有一個真正的無產階級黨。托派就根據這種基本的觀念建立第四國際，中國的托派(中國共產主義同盟—第四國際支部)也正根據這同一觀念，進行組織中國無產階級黨的準備工作。



六·勝利終會到來

有人必然發生疑問：托派的人數那麼少，組織那樣薄弱，她所代表的主張具有勝利的希望嗎？這種人根本不懂得歷史的規律，他們以為人類總是受環境支配的，他們就不知道人類也可以支配環境，創造環境。而支配環境創造環境的先決條件，就是認識社會的法則，認識真理。誰把握了真理，誰就是未來的勝利者。大家知道，第一次

大戰時，第二國際的領袖差不多完全投降了環境，只有極少數革命家死守住真理，不肯低頭，結果他們以布爾什維克的名義，奪取了俄國資產階級地主的政權。由此可知，真理雖然一開始只有少數人認識，但她終於得到勝利。問題就在有沒有少數人堅持她，耐心地解釋她，把她傳給廣大群眾。因為人類歷史往往就靠這「少數人」持續下去的！第四國際成立於一九三三年，她的組織遍及全球，就數量講，它當然屬於少數的地位，但無論在數量上，質量上，它比一九二五年的第二國際的左派強大得多。現在沒有一個國家，不把階級鬥爭和托派的名字連系起來的。這無疑是一種偉大的象徵。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初，捷克首都的工人和學生在民族獨立紀念節之日舉行了一個示威，德國的捷克總監牛賴特公開聲明此次示威是托派領導的。後來捷克的亡命總統貝奈斯也在他的機關報上証明這一點。又正當希特拉進攻波蘭之時，法國、丹麥等國報紙遍傳柏林工人區牆上發出「打倒斯大林，托洛茨基萬歲！」的標語。這種事實清楚的表明，第四國際與世界革命密切的結在一起了。關於這一點，我們的階級敵人 also 知道的。

一九三九年八月廿五日，正當德法外交關係行將破裂之前，法國駐德大使古龍德(Corilonilne)報告法國外長波立德(Bonnet)說，他於當天下午五時三十分與希特拉會談一次。

「我(古龍德自稱)說，「雖然我真的想我們將來會勝利，但我也想戰爭結束時，唯一的勝利者是托洛茨基先生。」元首(指希特拉)攔斷我的話，叫起來：「那末，你們為什麼要放任波蘭呢？」」

在法國外交官和希特拉看來，所謂「托洛茨基先生」當然就是指社會主義革命，這個「民主」帝國主義的外交代表戰戰兢兢的對他的敵國元首說：「戰爭將不可避免要引起社會主義的革命的。」那個法西斯的混世魔王也答道：「那末，為什麼你們……」，他們都在害怕戰爭引起革命，同時也害怕托派，但他們既然沒有什麼力量制止

戰爭，他們就更加沒有力量防止革命和托派的勝利。

我們現在又從資本主義的大本營—美帝國主義的統治層中找出一些新事實來。參議院多數派議員的領袖巴克萊(Barkly)於一九四一年八月五日在議院居然說出這樣的話來了：

「當他們(指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的民眾)著手之時，他們曾有一種含糊的妄誕的思想，滿以為他們將要把全世界社會主義化或共產主義化，而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根本分歧，就在這個問題上。據我們所知，托洛茨基是一個世界革命家，而斯大林則採取這種立場：認為俄國政府的第一宗義務是替俄國人著想，托洛茨基與斯大林的鬥爭就圍繞著這個問題：他們應從事於世界革命呢？抑或應集中力量於俄國？斯大林勝利，托洛茨基不得不離開故國」，(見一九四一年八月五日美國國會紀錄)

巴克萊向他們的帝國主義同僚耐心解釋：「斯大林在向我們服務，他不像托洛茨基」。因為托洛茨基是一個危險的革命家呀！

這是敵人口中的第四國際和托派。敵人的話加倍增強了我們的信心，勝利是必然的！這次大戰將無疑招致世界革命的大火災。第四國際的旗幟在世界革命的火焰中飛揚全球，它就是勝利的象徵。托洛茨基，這位自始至終盡忠於無產階級的偉大戰士，在臨終時聲稱：「我確信第四國際終得勝利，前進！前進！」這是他一生鬥爭經驗做出來的總結論

一九四二年初完稿



Examining Xi Jinping's Report Delivered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Zhang Kai

On 19 October 2017, on behalf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Xi Jinping delivered a report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He declared that ‘it is a meeting of great importance taking place during the decisive stage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and at a critical moment a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and “the theme of the Congress is: Remain true to our original aspiration and keep our mission firmly in mind, hold high the banner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ecure a decisive victory in building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strive for the great succes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and work tirelessly to realize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Xi spent more than two hours to present his report, in which the phrase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as repeated many times, as if it were the reality that needs to be maintained. However, according to *A Simplified Dictionary of Political Economy* edited by Xu Dixin, “socialist system is a general term of socialist economic and political system based on the public ownership of production materials”, and “to abolish private property system is to cancel human exploitation”; hence, there is no socialist system in today’s China.

Since Deng Xiaoping advocated the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 door, as well as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to allow a minority of people to get rich first, both the public and the non-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competed to develop. At last, the non-public sector (i.e., the system of private property) bypassed largely the 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The Report disclosed that the CPC exaggerated the role of “socialist” 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which had been implemented for a long time. However, the CPC has not yet changed. It continues to develop the non-public sector of the economy. The Report pledged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prevent the loss of state assets”, but in reality, it was a failure, based on what had happened over the past years.

The Report stated that over the past five years, there were major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rose from 54 trillion to 80 trillion yuan. This kind of fast economic growth included not only the figures of the growth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the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but also the figures of investment capital. It was not merely about the production value.

According to the *Cihai*, a large-scale Chinese dictionary and encyclopedia, published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Gross National Product (GNP) refers to one of the indices of national economic activities in capitalist countries. The total value of all products and services of all sectors of a country within a specific time (quarterly or annual) calculated in terms of currency” (page 27).

This is different from the CPC’s calculation, which made the inputs of investment capital for production calculated as the outputs of production value. Hence, China’s GDP had increased sharply. Now the figure is around 6.5% to 7.8% every year, so China has maintained its position as the world’s second largest economy. This showed that the CPC liked to do grandiose things, but it turned out to be overambitious and unrealistic.

The Report stated that “party leadership is the fundamental guarantee for ensuring that the people run the country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is law-based”. In reality, it is the party which seizes the people’s power of running the country and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by law. Thus, there is merely one-party dictatorship.

The Report showed off the achievements under the CPC's leadership, particularly the boom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China has adopted from the path of socialist economic development to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However, China does not develop as well as other capitalist countries.

The report claimed that “we have taken major steps in developing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We have actively developed socialist democracy and advanced law-based governance. We have stepped up institution building across the board to make integrated advances in Party leadership, the running of the country by the people, and law-based governance; and we have continuously improved the institutions and mechanisms by which the Party exercises leadership. Steady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enhancing socialist democracy; intraparty democracy has been expanded, and 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 is flourishing.”

Actually, the so-called “the running of the country” by “the people and socialist democracy” are false, as all rights of democracy are deprived by the CPC which claims itself to be the law and implements party-based governance. For example, Hong Kong people are supposed to enjoy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and democratic governance. The CPC takes charges of Hong Kong's foreign affairs and diplomacy and sends its liberation army to Hong Kong only if necessary. Unfortunately, in recent year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ficials have claimed to exercise its overall jurisdiction over Hong Kong, that means to abolish its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Xi reiterated that “we have made fresh progress in work related to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We have fully and faithfully implemented the principle of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and ensured tha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exercises its overall jurisdiction over Hong Kong and Macao as mandated by China's Constitution and the basic laws of the two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s.”

How come such a high-ranking party member and official broke the promise? The CPC did it indeed!

In order to address people's discontents, the Report proposed to ensure and improve “living standards through development.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is the fundamental goal of development. We must do more to improve the lives and address the concerns of the people, and use development to strengthen areas of weakness and promote social fairness and justice. We should make steady progress in ensuring people's access to childcare, education, employment, medical services, elderly care, housing, and social assistance. We will intensify poverty alleviation, see that all our people have a greater sense of fulfillment as they contribute to and gain from development...”

The roots of people's poverty are exactly the policy of the CPC: the implementation of capitalist market economy led to social polarization. The poor people are getting poorer and the number of the poor is increasing. A bit of alms is better than none. The state owns a tremendous financial surplus. It can donate billions of money to foreign countries, in contrast, the funding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is only a few hundred millions. A drop in the ocean. Previously, a news report said that due to living in dire poverty, a village family with five members committed suicide together. A tip of iceberg.

Therefore, the claims to improve people's livelihood is a kind of rhetoric. It only show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perfunctory.

In order to create Xi Jinping's individual cult, the central government has recruited a lot of writers who are good at eulogizing the ruler's virtues and achievements. They spent a lot of time to fabricate a masterpiece with more than twenty thousand words. The goal is to carry out dictatorship same as Mao Zedong. This is the ultimate agenda of the Report. A very calculative and remarkable device!

20 December

2017

Hong Kong:

- 2 The Pro-Establishment Camp Revised the Rules of Procedures of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to Avoid Democratic Discussion.....Zhen Yan
- 3 The National Anthem Law and the National Flag Law in Hong Kong.....Lau Shan Ching
- 5 Doctor's Professional Autonomy and Professional Hegemony.....Lau Shan Ching
- 6 To Defy the Authoritative Regime and Carry On Fighting – Letter to My Fellows of the League of Social Democrats (reprint).....Raphael Wong
- 8 The 3rd Anniversary of Umbrella Movement: To Support Political Prisoners and Request Rinsky Yuen to Step Down (reprint)Joshua Wong

China

- 9 Examining Xi Jinping's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Zhang Kai
- 11 The Opening of Xi Jinping's New Era (reprint).....Weipu
- 15 Bitcoin in China.....Lau Shan Ching
- 12 Letter to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PC, the People's Congress,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CPPCC National Committee on the Recent Expulsion of Migrants by the Beijing Municipal A u t h o r i t y (reprint).....Independent Review
- 18 Immediate Release of Xinjiang Human Rights Defender, Zhang Haitao (reprint).....Xilin
- 20 The Death of a Giant – Liu Xiaobo.....Chan Chong Hei
- 21 The Question of Murder.....Murong Xuecun

International**Special Topic on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Russian Revolution**

- 23 Leon Trotsky Was My Grandfather: AN INTERVIEW WITH ESTEBAN VOLKOV.....Wladek Flakin
- 26 O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of October 1917.....Alain Badiou
- 28 The Legac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David Mandel
- 34 What is to be done with 1917?.....IER BESANCENOT INTERVIEWED BY JULIEN SALINGUE
- 37 Iraq Kurdish Independence Faces Threats from Outside and Contradictions from Within.....Joseph Daher
- 42 The Rohingya, the Burmese Regime and the Geopolitical Stakes.....Pierre Rousset
- 45 The Left Currents in the Philippines and the Duterte Presidency.....Pierre Rousset
- 52 Land at the Centre of President Zuma's Radic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Mercia Andrews
- 55 Four theses on the Catalan crisis.....Miguel Manzane
- 59 The Long Struggle of Mexican Teachers.....Dan La Botz
- 70 Testing Trumponomics.....Michael Roberts
- 76 "Ecosocialism is more than a strategy, it's a project for Civilization".....Alexandre Araujo Costa, Daniel Tanuro

History

- 82 What is Trotskyism?.....Liu Ka Leung

Article in English

- 101 Examining Xi Jinping's Report Submitted to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Zhang Kai

十月評論

October Review

第44卷第2/3期 (總第243期)

2017年12月31日出版

- 香港 2 建制派修改立法會《議事規則》阻止民主討論.....振言
3 國歌法與國旗法在香港的實施.....劉山青
5 醫生專業自主與專業專權.....劉山青
6 不畏威權 繼續燃燒——致我的社民連黨友 (轉載).....黃浩銘
8 兩傘三週年 聲援政治犯 袁國強下台 (轉載).....黃之鋒
- 中國 9 檢視習近平向中共十九大提出的工作報告.....張開
11 習近平新時代開啟 (轉載).....未普
15 比特幣在中國.....劉山青
12 知識界人士就近日北京大規模驅趕“外來人口”事件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信 (轉載).....獨立評論
18 立即無條件釋放新疆維權人士張海濤 (轉載).....忻霖
20 巨人之死 - 劉曉波.....陳中禧
21 殺人的問題(一) (轉載).....慕容雪村
- 國際 23 紀念俄國革命100周年專題:
我的祖父萊昂·托洛茨基/採訪厄斯特班·瓦爾科夫(ESTEBAN VOLKOV).....華德·法堅
26 論1917年的俄國十月革命.....阿雷·巴蒂歐
28 十月革命的遺產.....大衛·曼德爾
34 1917年要做什麼? 採訪奧利弗·比散森諾特.....久林·薩林古
37 伊拉克庫爾德獨立面臨外部威脅與內部矛盾.....約瑟夫·達荷
42 羅興亞人、緬甸政權和地緣政治風險.....皮厄爾·羅瑟特
45 菲律賓左派和杜特爾特政權.....皮埃日·羅瑟特
52 處於祖馬總統徹底經濟轉型中心的土地.....梅西雅·安德魯
55 關於加泰羅尼亞危機的四個論題.....米格爾·曼贊
59 墨西哥教師的長期鬥爭.....丹·拉·伯茨
70 特朗普經濟學的考驗.....邁克爾·羅伯茨
76 生態社會主義不僅是一個戰略，還是一個文明規劃亞歷山大·阿勞霍科斯塔、丹尼爾坦諾羅
- 歷史 82 什麼是托派?.....劉家良
- 英譯 101 Examining Xi Jinping's Report Delivered at the 19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Zhang Kai